香港粵語頂硬上

彭志銘
鄭政恆
合編

彭志銘　陳路易　牢騷齋主　朱耀偉
容　若　韓連山　陳樂施　鄧小樺
吳　昊　葉建源　陳仲明　陳　寧
葉　輝　施安娜　趙善軒　區家麟
曾曉華　潘國森　桑　普　黃世澤
湯翠蘭　陳惜姿　木　子　陳心遙
鄧昭祺　陳智德　陶　傑　劉嘉鴻
黃仲鳴　張婉雯　毛孟靜　范　克
鄭政恆　鄧力行　劉天賜　王慧麟
陳　雲　謝西嘉　文潔華

次文化堂

本書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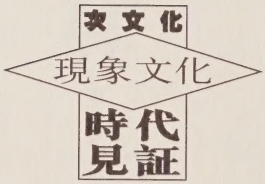
主　牢騷齋
施　陳樂
陳　陳仲明
趙　善軒
桑　普
木　子
陶　傑
毛　孟靜
劉　天賜
文　潔華
朱　耀偉
鄧　小樺
陳　寧
區　家麟
黃　世澤
陳　心遙
劉　嘉鴻
范　克
王　慧麟

容　若
吳　昊
葉　輝
曾　曉華
湯　翠蘭
鄧　昭祺
黃　仲鳴
鄭　政恆
陳　雲
陳　路易
韓　連山
葉　建源
施　安娜
潘　國森
陳　惜姿
陳　智德
張　婉雯
鄧　力行
謝　西嘉

合編
彭　志銘
鄭　政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
見証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4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31761099546020

次文化堂

現象文化叢書 ⑱

香港粵語頂硬上

編者／彭志銘　鄭政恆

RICHARD CHARLES LEE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ies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5S 1A5

——次文化現象文化系列 98

香港粵語頂硬上

編　　者：彭志銘　鄭政恆
社　　長：彭志銘
出版顧問：史亦書
編　　輯：李子翹
封面設計：原秋白
出　　版：次文化有限公司
地　　址：九龍彌敦道612－618號
　　好望角大廈10樓1009室
網　　址：http://www.subculture.com.hk
　　http://次文化.香港
電　　話：27805625
印　　刷：次文化堂
總 經 銷：次文化堂
出版日期：2014年7月初版
書　　號：SCB614
ISBN：978-962-992-352-5
定　　價：HK$128
© 二〇一四年　版權為次文化有限公司所有，嚴禁作全部或局部翻印、複印、轉載或其他用途。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裝釘錯誤，請寄回本公司更換。

《香港話大系》宣言

吳昊

香港俗話，過去的不斷湮沒，現在的又不斷增加，真是浩如煙海，其天地之大、堂奧之深，非要作長時間收集、整理和研究，還動用大量人力物力，才能有顯赫成果。

查香港俗語出處，源廣流闊，簡直百川匯海，絕對字字有所本，可能來自：

①古代漢語；

②廣東地區方言（例如客家話）；

③外省語（例如上海話）；

④外國語（例如英語、日語）；

⑤書面語；

⑥歌謠（例如童謠、民歌）；

⑦背語（即行頭話、術語）；

⑧格言、諺語；

⑨俏皮話（例如歇後語）；

⑩口頭禪；

⑪穢語（俗稱「粗口」）；

⑫江湖切口（例如黑社會暗語）；

⑬佛道真言；

⑭生活文娛詞彙；

⑮地名及人名等。

次文化堂勇敢地踏上第一步，陸續出版一系列研究香港俗語的書籍，更呼籲各界文化友好、前輩老師一起在遼闊的俗話境地上耕耘，群策群力，眾志成城，支持我們，讓《香港話大系》能包羅萬有，對過去的發掘鈎沉，對現在的網羅保留，能一本一本的出版下去，謝謝！

以言入序

彭志銘

語言，除交際溝通外，還是思想表達與傳遞的工具。更重要的，乃係文化載體，智慧累積的投影機。不同地區的語言，呈現不同社群的集體性格、民俗民風和歷史推演，以至反映到不同群族的文化修養、知識水平和思考邏輯。

甚麼人，說甚麼話，就是這基本道理。

嶺南廣東一帶，地熱潮濕瘴氣多，人們易患「濕熱」之症。「濕熱」並非重症，其病徵是頭重肚脹，食慾欠佳，周身唔聚財，這種不舒暢的感覺，特別惹人煩厭，於是，廣東人便將「濕熱」一詞，套用到凡遇上小麻煩，未能即時解決，躁悶難消，便稱為「濕熱」。這是關乎地理文化的例子。

而「潮州音樂」，何故咱們廣東歇後語會解作「自己顧自己」的呢？這由於潮州樂器，以拉二胡為主，演奏時，所發之聲，猶如潮州土語的「自己顧自己」，遂引伸指不理別人，只顧自己也！這關乎地區文藝文化。

還有一句「幡竿燈籠」，意指「照遠唔照近」。舊時廣東民間風俗，相信人死後的靈魂會飄離軀體。死者家屬於初頭七日晚間，在自家屋頂豎起一竹竿，點起燈籠，好讓鬼魂

看見歸家有途。幡竿上的燈籠為了照得遠，便掛得高，後被喻為一些人有好處也不關照自己親友，反而照顧外人。這是地方習俗文化。

本來，上述那些詞彙熟語不用多解，廣東人一聽就明的，現今，卻須要有「語言專家」細說根源，那正是廣東文化衰敗的現象，十分悲哀之餘，更須關注及捍衛，否則，死咗都未知！

中共政府多年力打全國各省方言，以求語文統一，為政治服務，鞏固政權。他們寧願犧牲老祖宗的遺風傳統、不顧國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更不怕反世界潮流核心價值的責難（全球各國皆盡力拯救保護消失中的方言），硬要地球上九百六十萬平方千米大地內的五十六個民族，統統只准學「現代漢語」、講「普通話」，其他各類民族語言，全屬「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

大陸北官的反智不文明「文化政策」，因他們的道德和質素極劣所致，應與譴責，可恨，近年竟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的配合，大開中門迎迓，並先從教育埋手，不是「洗腦」的國民愛國教育課，就係以普通話教中文的所謂「普教中」母語教學，背後動機，不言而喻。

中共政權專橫獨裁，樣樣愛管，以前暴君秦始皇有「車同軌，書同文」啫！家下，大陸「治国者」連人民的鄉音也要理——「語同音」呀！黐咗線！

二〇一〇年，廣州人為捍衛「母語」廣東話而爆發罕有的全城大型示威活動，反對以普通話讀新聞，取得短暫勝利後，現今，廣州電視台咪已採用普通話廣播新聞，廣東話

捍衛者去晒邊？

上海一早淪陷了！新一代上海幼童，大部份不懂上海「母語」，因上課及考試全是以普通話為主。上海風情之流失，隨着活了幾千年的儂言吳語急速死亡，而一併灰飛煙滅！

嚴格來說，除歐美澳紐及東南亞等「外國勢力」外，能仍保存廣東語言風俗文化的地方，只剩香港這片小小傳統反動基地咋！但係，形勢不樂觀矣！所以，趁還有殘餘言論自由、我公司仲未執笠的出版自由，加上一大批「老鬼級」、對粵語文化有認知有感情，兼有責任講個明白的「有心人」，便集結一起出番本巨鑄囉！

自己文化自己救，捍衛先祖遺產，是承擔，也要承傳。

今劑，是很難得的一次「頂硬上」大結集，我敢說是全港頂級文化精英齊出聲，為撐粵語的吶喊呀！計有我最敬重的語言學巨擘容若老師，和辭世的師長吳昊外，鄧昭祺教授的粵音音韻研究、潘國森兄的唐詩宋詞賞析，加埋黃仲鳴教授三及第功力、劉天賜之通識大師注解、文潔華教授的美學觀，即使唔計才子陶傑的尖刻批判，本書已值回票價啦！

仲有文學文藝界的葉輝、鄧小樺、陳寧和陳心遙等重量級人馬，香港幾時有過一本如斯重秤「撐粵語」嘅著作吖？

涉及教育，又怎少得要有學者老師坐鎮，所以，咪有韓連山、施安娜、陳惜姿、陳路易、趙善軒、曾曉華、湯翠蘭、陳智德、張婉雯、牢騷齋主和朱耀偉等最前線的教育

工作者談感受訴衷情，兼議論「普教中」衍生的大問題。

陳惜姿更以家長角度去審視此等影響香港未來下一代成長的教育導向；而陳路易的萬言書更是關心香港教育的朋友不得不看嘅錐心瀝血大傑作，值得抽出來推介。

教育群組中，葉建源更是立法會議員教育界代表，由他來評香港教育政策，怎會不是最佳人選！另一位陳雲老兄，雖身職大學中文系教授，但也是「社會運動家」，讓他講語言社會政治學，誰與爭鋒呢？

論及語文教育政策，本書仲有一位立法會議員，以好英文見稱的毛孟靜，和政黨主席級人馬劉嘉鴻的鴻文，份量十足吧！

免卻被人話我哋盲目狂插政府，最好有中肯理性持平的文化評論人幫拖啦！咁咪找來溫厚的區家麟、桑普、黃世澤、范克及傳媒朋友陳仲明出招囉！

一班長輩嘈嘈閉，總要聽吓當事人、用家或受害者身份的苦主心聲㗎！大學生陳樂施、中學生木子、留洋學生謝西嘉及學生關注組的鄧力行，他們的憤慨直言，不得輕視！

不可不提的，還有潘國森替前輩屈大均的《廣東新語》、陳澧的《廣州音說》和孔仲南的《廣東俗語考》等經典著作作導讀，十分精僻！

臨尾，我死等一條友的稿件，是因為要有「法律觀點」看廣東話是否「不是法定語言」，臨上機印前等到王慧麟大兄的「法政短文」，重要！

說重要，不得不感謝鄭政恆的鼎力協助。查實，本書得以成書，除一眾作者義不容

辭地賜文付梓外，鄭政恆逐一選編和尋找適合稿件，居功至偉！

最後必然再三多謝所有作者們，有部份是我不曾認識的，只是一個電郵一通電話，便二話一說，立即助拳供稿，全無一人托手踭，非常感激！拜謝！

為何我搬出所有作者來曬馬？因本書是全球歷來第一本立場鮮明、毫不客氣的「撐粵語」、「反普教中」的專書，在華人社會當中，本應最啱由廣州出版，奈何，諗都唔好諗，在一個沒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但惡法橫行的專制國家裏，尋釁滋事，罪大惡極，無人受得起！

當一個政權粗暴操控干預教育政策，嚴重破壞國家文化，蹂躪荼毒下一代，以愚民手段穩固專權，禍延後世，更還不敢將「一國之法定語言」定性稱為「國語」，竟騎呢地叫它做「pǔ tōng huà」時，呢個民族何等悲哀？

大家睇完今日香港呢批學者專家知識份子嘅敢言後，應否反思一下咱們自詡偉大的文明古國民族做乜要受啲咁嘅煎熬呢？連講最優美、鏗鏘動聽的天籟之音也有牢獄之險，咁叫「強國」？笑料也！收皮吧！

寫於二〇一四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

目錄

《香港話大系》宣言（吳旻）
以言入序（彭志銘）
一、文化：從隋唐中原之音至粵普之爭……3
粵語從頭說——並追究所謂非法的謬論來源（容若）……5
港式廣府話研究（吳旻）……14
推普機碾不碎粵語的舌頭（葉輝）……34
粵普語言問題小議（曾曉華）……39
省思廣東方言的價值（湯翠蘭）……53
用粵語誦讀古代韻文的好處（鄧昭祺）……60
推粵推普：打通任督二脈（黃仲鳴）……72
講廣東話•粵語書寫•用粵語學（鄭政恆）……78
二、教育：從母語教學到「普教中」……85
普教中，有甚麼可以學的？（陳雲）……87
「普教中」教壞中文（陳雲）……93
教育官僚盲推「普教中」（陳雲）……96

四論普教中（陳路易）……100
為了下一代　堅持「粵教中」（韓連山）……129
「普教中」可取嗎？（葉建源）……135
普教中的迷思（施安娜）……143
摧殘文化「普教中」（潘國森）……152
為「普教中」滅範文（潘國森）……167
普教中（陳惜姿）……175
香港書面語與三次中文運動（陳智德）……180
普教中是行政決定，不是專業決定（張婉雯）……188
普教中犧牲語文學習（鄧力行）……191
我接受了「普教中」之後（謝西嘉）……195
普通話救中文（牢騷齋主）……199
普教中：推普廢粵前奏（陳樂施）……206
普通話教中文所為何事（陳仲明）……212
廣府話　頂硬上（趙善軒）……216
廣東話爭議的核心問題（桑普）……220
為了我們的未來，拒絕普教中（木子）……224
三、語言：從主流語言到法定語言……229
說南蠻●滅粵難（陶傑）……231

捍衛廣東話 • 自己母語自己救（彭志銘）……246
我係香港人（毛孟靜）……257
廣府話（劉天賜）……260
母語為「生命體」（文潔華）……263
此情無計可消除：「粵語授課」有感（朱耀偉）……268
粵語永遠反叛！（鄧小樺）……272
尊重粵語，珍惜粵語（陳寧）……276
方言與槍炮（區家麟）……279
港人捍衛粵語理所當然（黃世澤）……284
可以去到幾盡的粵語（陳心遙）……287
粵音漢字是完整語文（劉嘉鴻）……291
無硝煙的攻伐（范克）……296
廣東話有法定地位？（王慧麟）……300
四、附錄……305
廣東新語 • 文言 • 方言（屈大均）……307
廣州音說（陳澧）……314
《廣東俗語考》自序（孔仲南）……319
參考書目

香港粵語頂硬上

一、文化：從隋唐中原之音至粵普之爭

粵語從頭說

——並追究所謂非法的謬論來源

容若（語言學人）

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的網頁，把粵語說成「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已引起全港輿論劇烈反應。孔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詩，指詩經，是粵語形音最早出處。講粵語歷史，應由詩經談起。

今天粵語一些讀音如「來」讀離、「彌」讀尼、「糾」讀矯……都可以從詩經找到根據。普通話「抱窩」，粵語叫做「孵竇」。這個「孵」字，粵語讀步，而在詩經是寫成「罦」的，正是讀步，可知這個粵字也源於詩經。

眼睛的活動，粵語有「睇」和「睩」，都見於楚辭楚語。

普通話叫鍋的，粵俗寫成「煲」，本字是「釜」。你可能駁我：成語「破釜沉舟」，老師明明教讀斧。不錯，「釜」字今天都讀斧了，但要知道，這是唐代才有的輕唇音。《史記》所載項羽在鉅鹿

一戰「破釜沉舟」，遠在秦代，那時未有輕唇音，只有重唇音。「釜」的重唇音讀保。而「傅」字，是不識原字的人，憑字音造出來。

建築，如是動詞（即建造），粵語叫做「起」，如起屋，起高樓。這樣的用法，漢代已經有了，《漢書》就有不少資料。

粵語有個俗字「佢」，指第三人稱，普通話就是「他」，潮州話則稱為「伊」。這「佢」字原寫作「渠」，三國時已經用了。當時，吳國術數家趙達，不想自己的家傳秘笈被友人取去，對方來借閱時，詭稱「女壻昨來，必是渠所竊」。事見《三國志》。「佢」字，也是不識本字的人憑音而造出來。

我讀唐詩，竟然也發現不少粵字，見於杜甫詩的特別多。普通話的「說」，粵語用「話」字（如話我、我話之類），普通話的「拿」，粵語用「拈」，普通話的「弄」，粵語用「攪」，普通話說「還是」，粵語只用一個「定」字。這些粵俗用法，就見於杜甫詩中。

粵語的雙音詞，同樣有一批見於杜甫詩，我略舉幾個。普通話「隔壁」，粵語用「隔籬」，普通話「客人」，粵語用「人客」，普通話「穿衣」，粵語叫「著衫」，普通話「穩坐」（如「任從風浪起，穩坐釣魚船」），粵語叫「坐穩」。這些粵語叫法，原來是杜甫先用！

由杜甫而想起韓愈，他是比杜甫稍晚的唐代詩人。粵語「得閒」（普通話「有空」），就見於韓愈一首五言詩：「得閒無所作，貴欲辭視聽。」

再要舉例，不僅唐詩還有不少，宋、元、明、清的詞、曲、小說，更有數以百計的粵語詞例。無他，粵語吸收了自周代以後凡三千年的中華文化精華也。

不要以為，上面所舉，都是孤例。每一例都用過多次乃至無數次；粵語就通過它們的「開枝散葉」而「兼收並蓄」，所以才顯得多姿多采。

單以「得閒」為例，就跨過黃河、長江，翻越五嶺。說得明白一些，那是由唐代的韓愈，傳到明代的吳承恩，在《西遊記》應用，再由吳承恩傳到清代的曹雪芹，在《紅樓夢》應用，又由曹雪芹傳給稍後的林則徐，在兩廣總督任上，寫了這副對聯：「坐臥一樓間，因病得閒，如此散材天或恕；結交千載上，過時為學，庶幾炳燭老猶明。」林則徐銷鴉片、反侵略，廣東人耳熟能詳，又知否他愛用「得閒」二字入聯不只一次呢？

誰是《西遊記》、《金瓶梅》、《儒林外史》、《紅樓夢》的讀者，看到這裏都可能恍然而悟：對呀！粵語詞在這幾部小說裏，觸目皆

是，數之不盡呀！

這一點又反映了粵語植根於中華文化之深且厚。

僑居加拿大的葉嘉瑩教授，十年前曾在北京講中國古詩詞，強調「不能用普通話朗誦」。此說一出，那些固執「必須用普通話統一全國語言」的人，自是百般滋味。但她簡單地講出理由：古詩詞平上去入四聲齊全，普通話只有平上去三聲，沒有入聲，朗誦起來，碰到古詩詞的入聲韻，是否音調和意境都失落呢？

葉教授還有令這些人難堪的話。她說：朗誦古詩詞，應該用南方的方言，尤以廣東話最適合。早知如此，六十年代又何必禁止粵語教學呢！

粵語之所以最適合朗誦古詩詞，不但平上去入四聲齊全，而且入聲分陰入、中入、陽入，顯得聲調特別豐富，朗誦起來自是多姿多采。近百年前，胡適早已表示欣賞了。

你宣佈粵語非法，等於乾脆否定中華文化遺產，做個敗家仔！

一部二十四史，沒有一個皇帝曾反對過粵語，當然不會指為非法。反之，尊重粵語、重用粵人的皇帝則有之，在此各舉一例：

尊重粵語——唐太宗李世民，北破突厥，南定嶺表。他把突厥頡利可汗和嶺南當地領袖馮盎，都召到首都長安（今陝西西

安），設御宴款待，向他們宣佈「胡越一家」。這就是說，講突厥語的，講粵語的，從今都是一家人了。

重用粵人——唐太宗的曾孫唐玄宗（即唐明皇）李隆基，世人皆知他與妃子愛吃嶺南荔枝，未必知道他也重用粵人。第一個，高力士，玄宗即位不久，即擢升為右監門大將軍（小說家丑化高力士，不可盡信）；第二個，張九齡，開元年間宰相，所謂「開元之治」，張丞相功不可沒。粵人重用，粵語又怎會歧視呢！指為非法，更不可想像。

然而，要找歧視粵語的皇帝，就要在二十四史之外了。此君是誰？大家都熟知的清朝暴君雍正是也。他是中國歷史上獨一無二要排斥粵語的皇帝。

雍正六年（公元一七二八年），雍正下了一道「上諭」，指出大臣有事啟奏，只有福建、廣東兩省的人「鄉音不可通曉」，這些臣工若到他省去，「宣讀訓諭，審斷詞訟」就無法「使小民共曉」，結果是「百病叢生」，所以福建、廣東這兩省都要設立「正音書院」，教曉官民（考科舉的）以「正音」（官話）代替「鄉音」（閩語、粵語）。

當時「本部十八省」（蒙、疆、青、藏未入本部），何以只有福

建、廣東兩省才要「正音」？只有兩省官員才是「鄉音無改」乎？我查過乾隆六十年（公元一七九五年）大臣戈源奏章指出：山西生童「土音訛字不一而足」，乾隆皇回覆，叫戈源不要大驚小怪，指出「直隸山陝豫東等省往往平仄倒置，土音使然，亦難以逐一苛責」。原來當時河北、山西、陝西、河南、山東五省的人仍是「鄉音無改」，遠在七十多年前的雍正六年，更無論了。這反映了當年雍正只責福建、廣東而放過其他十六省，不但厚此薄彼，而且大有蠱惑。

我查過歷史，清兵入關以後，漢人反抗不止，屢敗屢戰，順治十八年、康熙六十一年一直有大小不同的反抗，尤以福建、廣東兩省為甚，雍正初年，反抗轉入地下活動，那是天地會在福建、廣東兩省的反抗。雍正比其父康熙聰明，知道憑軍事、政治不能消弭閩、粵人反抗情緒，乃改用文化策略。要閩、粵人不講自己的「鄉音」，只講官定的「正音」，可謂「文化辣招」，也是古今中外民族壓迫的軟手段。直到今天，專制政權打壓少數民族，不是懂得以自定之官話取代當地的語言嗎？可以說，今天有人指粵語非法，無異「深追」雍正帝之「遺詔」耳。

滿洲人打壓粵語也曾遭遇反抗。道光末年，廣東人洪秀全在廣

西金田起義，另一廣東人李文茂在廣東佛山起義，前者的文書用粵字，後者的參加者大演粵劇，在某個程度上屬「保衞粵語運動」。咸豐年間，洪秀全自廣西北伐，《奉天討胡檄》力數滿人對漢人的民族壓迫罪行之餘，痛斥滿人「更中國音」。大家試想，這是甚麼一回事呢？

如果你覺得今天仍有一股排斥粵語的力量，那與雍正排斥粵語已無直接關係，只是性質相同。

話說清末民初，有人出於愛國心，但有崇洋思想，他們聽了一些人說，西方國家之所以強盛，由於「語言統一」；又聽了另一些人說，將來世界只剩下一種語言，那是「世界語」，其他語言一概消滅。想強，似乎要「統一語言」吧？就由統一自己的語言做起，於是乎出現了「國語統一運動」。

有誰料到，「統一」往往被專制統治者利用，作為製造內部矛盾，以便加強控制的手段。這一點，八十年前作家茅盾已有先見之明。由一九一三年開始的「國語統一」運動到一九五六年改稱為「推廣普通話」運動，都脫不了加深矛盾，加強控制的性質。「推廣」比之「統一」，字面上似乎寬鬆了，實行起來，更加霸道，就以粵語受打壓為例。

「國語統一」運動曾於三十年代首先對付粵語，只做到禁止拍攝和放映粵語片，其他打壓由於要全民抗戰而作罷。「推普」運動由六十年代開始，全面禁止方言教學，粵語不只不能例外，而且對待最為嚴苛。除了在粵語區一律改用普通話教學，研究粵語，也要為學習普通話服務；粵語原有九聲，訂定拼音只用六種符號；粵省不能出版粵語書籍；廣府人研究粵語也屬「犯禁」（研究者改由潮州人、福建人）。這是造成和諧還是造成矛盾？凡研究粵語的只有投奔香港或到海外去。大陸這種情況，維持到七十年代末。

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大陸研究粵語的儘管恢復過來，粵語教學，仍然被禁。一九八四年，粵省官方發出「廣東必須用普通話統一全省語言」的指示。同年，文字改革權威倪海曙宣佈要實現秦始皇所未能實現的「語同音」，限定二十年內，人人只講普通話。到那時，粵語還不消滅！

消滅粵語之聲傳到香港，是一九九六年「回歸前夕」。這一年，主張「語同音」的許嘉璐，以官方身份駕臨，在香港大學演講，推崇清帝雍正在廣東設立「正音書院」的措施，說是「廣東第一次推廣普通話」。他反對香港一直以來的粵語教學，認為會影響學生的中文水準，理由是粵語教學，令學生由讀到寫，要經過「轉

換」，即「翻譯」；他要香港學大陸採用普通話教學，在十年內全面實現。聽者大多數不以為然，覺得最好笑的是「轉換」或「翻譯」，因為粵語非外語，是我們自己的母語，由讀到寫，十分順利，了無窒礙，絕不會影響中文水準，君不見，近百年來，受粵語教學的出了不少傑出的政治家、經濟學家、法律學家、外交家、科學家、歷史學家、古文字學家、考古學家、建築學家、音樂家乃至其他各種藝術家，中文水準不高，曷克臻此？

有一位朋友說得風趣：不是廣東人認第一，湖南人毛澤東說中國近代有四個人向西方尋找真理，其中三個是廣東人洪秀全、康有為、孫中山，佔四分之三，不知許嘉璐先生讀過毛主席的書否？

值得注意的是，許嘉璐於一九九六年，叫香港十年內全面推行普通話教學，那末，二〇〇六年到期了！而倪海曙早在一九八四年預言二十年內「語同音」，更早在二〇〇四年已到期——全民都講普通話了。今年，倪氏預定目標過了十年，許氏預定目標也過了七年，難怪有人急於跳出來喊「粵語非法」啊！

香港特區教育局網頁所說非法之詞雖已勾銷，要從語言上製造矛盾以供專制統治利用的「人還在，心不死」，這些人數典忘祖，不知中華文化為何物，我相信好戲還在後頭！

港式廣府話研究

吳昊（香港掌故學者）

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

廣東地大物博，方言分三系：粵方言、客家方語和閩方言。研究方言先要分區，然後分點。

一個粵方言，就可分成五個方言區：

一、廣府片或粵海片（省城、澳門、香港）

二、四邑片（台山、新會、開平、恩平）

三、高雷片（陽江、湛江、雷州）

四、莞寶片（東莞、寶安）

五、香山片（中山、珠海）

因為區域分異地方阻隔，族類不同，區與區之間同一方言亦起着變異，由語音、結構到詞匯都有所不同，甚且還互為影響，相輔相成，令到一個方言體系繁瑣凌亂，難以把握。

往昔我們吵架，甲總會爆句：「你講乜話？」乙立刻頂句：「我講廣東話！」唉，嚴格的說，廣東話有時我們自己也未必聽得明白。

一個方言區，又可分成幾個方言（重）點。廣府片因政治形勢關係，在過去百年歷史文化演替間分成兩個重點——廣州區和香港區，前者專稱為「廣州話」或「廣府話」，後者近年來多稱為「香港話」了。

雖同一個方言來源，但命途各異，發展路向分歧，甚至背道而馳，實為妙趣。在過去的日子裏，廣州的粵語一直是主流，引領風騷。香港一八四二年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慢慢躍升為東南亞舉足輕重的商港，更成為南中國重要的大都會，港式粵語吸納大量外來詞和新事物新名詞，更包涵了南來的外省文化，式樣變化多端，生猛活潑，姿彩豐富。而廣州自一九四九年大陸解放，隨着中國政府大力開展所謂「推普運動」（推廣普通話運動），實行全國語言「普化」，廣州粵語便漸漸失去區域特色，外來詞有減沒增；而正好相反，香港粵語不受這「語言一體化」的影響，隨時皆在求變求新，竟能保留更多傳統語詞和特色，也就顯得具個性。打從此時起，香港話領導粵方言潮流，勢不可擋，尤其大陸開放改革走資之後，港式文化由南上北，席捲神州，影響所及，大江南北遍地香港話語詞，蔚為風尚。由此得見，還是讓語言自由發展為最佳。

其實，推行語言統一，打壓地區方言，歷朝歷代都有發生，

只是正統史書記載不多，令大家忽略。例如清雍正六年，世宗每引見大小臣工，凡陳奏履歷之時，惟閩廣兩省官員滿口「鄉音」（方言），不可通曉，於是下諭兩省廣建「正音書院」，教授京話，令不通曉者不可做官。曾幾何時，這些正音書院在潮州稱作「孔子正」，將四書五經「之乎者也」標榜為「正音正字」，一切方言就成「異音異字」了，當中存在着濃厚的文化歧視和政治迫害。

所以，研究粵方言不為正統學界重視，更遑論成果若何。一般研究，大約在一九四九年之前集中於揭示語音面貌，最早流傳民間的粵音著作，表表者有《分韻撮要》（周冠山，清末）、《廣州音說》（陳澧，一八九三）、《兩粵音說》（王力，一九二八）、《廣州音系概述》（岑麒祥，一九四六）、《粵語入門》（趙元仕，一九四七）等。大抵其時的學者離不開「正音正字」的心理負擔，總愛在浩瀚的漢字堆中尋找粵語字源，以證明粵方言如何合乎古音古義，理應歸宗漢語正字系統。隨便俯拾例子，陳澧著《廣州語音本字》指出：

「俶手　廣雅：俶，動也。俶手，即動手也。俗讀俶若毓。」

粵方言很多被認為有音沒字，我們俗寫的「郁手」，陳澧引《廣雅》，認為正寫應該是「俶手」。這起了承先啟後作用，令方言研究增加着尋寶的樂趣。

要知道，最早時期漢字只得三千三百個（漢代《倉頡篇》載），當社會進步，文化複雜，文字愈變愈多，到清《康熙字典》時竟多達四萬二千一百七十四字，很多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現今應用漢語大刀闊斧，削減至常用不足五千字，即是說極大部份已淪為「廢字」了。我們的方言學家也真的任重道遠，白首窮經，在數萬廢字堆中撥開雲霧見彩虹，實在可敬也。

不過，一九五〇年之後，粵方言研究的天地又大為擴濶，重心逐步轉移到詞滙、語句、語法、對比、結構等方面，當然也吸納了西方的研究方法學（例如結構主義之類）。尤其給詞語格式定制，生動活潑，前所未見，例如甚麼——

- AA式（「啱啱」、「睇睇」）
- AAB式（「沙沙滾」、「爹爹吊」）
- ABB式（「傻更更」、「矇查查」）
- AABB式（「神神化化」、「埕埕塔塔」）
- ABCC式（「大隻騾騾」、「老友鬼鬼」）
- ABAC式（「啱時啱候」、「大癲大肺」）

這種研究方法結合分析與創意，相當突破性。又例如研究外來語如何溶入香港話，甚麼「大出血」、「今晚打老虎」、「龍潭老鼠」

等；又或者香港話如何利用外國人和物借題發揮，甚麼「日本郵船」、「法國大餐」、「摩囉差拜神」等，作跨文化探索之餘，更將生活與學問互為配合，達妙趣橫生之境界。

語言是發展的，在變化的，而發展最快變化最大者往往是詞匯。語言的詞匯和社會掛鈎緊密，時代的瞬息萬變也意味着詞匯的醞釀劇變，兩者猶如鏡子，互相反映，互為因果。亦正因如此，近年來社會學、文化學、人類學、民俗學等大舉進軍方語研究的範疇，好不熱鬧。舉例以闡明，往昔鮮有提及香港話深具時代、社會、文化意義，如今學者諸君努力發掘香港話所蘊藏着的：

- 特殊生活方式（「騎牛搵馬」、「魚翅撈飯」、「枕筩箕，瞓草皮」）
- 特殊經濟面貌（「炒樓」、「托水龍」、「孖展」）
- 特殊社會面貌（「大牌檔」、「騎樓底」、「大耳窿」）
- 特殊賭博方式（「叮噹馬頭」、「大熱倒灶」、「游乾水」）
- 特殊飲食方式（「飛沙走石」、「咬柴」、「食西北風」）
- 特殊忌憚心理（「吉屋」、「通勝」、「豬紅」）
- 特殊宗教信仰（「講耶穌」、「打齋鶴」、「搵山拜」、「黃大仙」）

- 特殊的性行為（「叫雞」、「打茄輪」、「玩SM」）
- 特殊行業職位（「茶博士」、「打厘」、「三柴」、「師爺」）
- 特殊色彩效果（「黑腳」、「籮柚有白印」、「滾紅滾綠」）

簡直林林總總數之不盡，而這些詞匯亦反映了香港社會人生百態，甜酸苦辣。還有，詞匯是緊隨時代洪流演變，有者沖落大西洋永不超生，有者逆流而變——新的變舊，舊又變新。例如上世紀五十年代，香港人最興講個「嚟」字（音近「鋸」），相等於「條氣順晒」或「好soft」，源自喝「沙士」汽水，氣體驀然間在胃裏上沖喉嚨打噎的現象——作順氣狀，而男女相悅溫馨時刻，亦以「好嚟」作喻，甚時小舞廳的黑燈貼面舞叫做「跳嚟舞」。但六十年代之後沒人再講「嚟」字，改用「秣」字，發展到「軟秣秣」、「秣舞」、「秣客」等。這「秣」就成為「嚟」的第二代了。過了好一陣子，「秣」又演變出第三代。語氣誇張化，甚至帶着貶意（八十年代香港精神興玩到盡，態度戲謔），便有「秣之之」、「秣到震」、「秣到痹」的冒起。現在，「秣」字已趨沒落，它還有機會翻生嗎？還是找別一隻字借屍還魂呢？且留待語言文化學家們探討好了。

導言的話似乎說的太多，不過，我還有三句話要說：

- 「語言是一種出色的文化現象。」（田中春美編著《語言漫

步》）

• 「面對大量粵語俚詞俗語『登堂入室』，大搖大擺地在報紙上出現的情景，你可能會不禁拍案叫絕，這才是方言的本色！」（鄭定歐編《廣州話研究與教學》）

兩句是人家的話，而最後一句是我心底話：我們（次文化堂諸君）決定編輯古今香港話文化現象大辭典，這將會是次文化堂的巨著。

「粵人鳥語」或語言奇觀

還記得TVB無厘頭節目霸主《超級無敵獎門人》其中名句嗎？

「人人都揸住支蘇格蘭場非工業用國際線路自動溶雪十六嘩咗風油吙垂直升降連鐳射彩色洗衣乾衣氣墊毛筆。」

總共四十六個字，洋洋壯觀，卻毫無意義，但出自口技專家般陰陽怪氣的獎門人口中，立刻全城爭誦，老幼學語，所以論「語言之奇觀」（verbal spectacle），香港人確實創意無窮也。

相信這四十六個字一出了香港，沒有任何一個華人區域會明白（其實連香港人也不會明白），定必招來衞道者（保衞語言道統者）

的怒罵：「他媽的，講甚麼鳥語？」

沒錯，就從偉大的傳統「粵人鳥語」說起吧。

古人說：「南蠻鴃舌之人。」

粵人被稱為「鳥音人」，說的是鳥語。地域和種族的說，粵就是古之百越（古文「粵」與「越」相通），有「百」種民族聚居，被統治者稱為「蠻夷」之地，古書所謂的「狼」、「僮」、「獠」、「俚」、「蛋」等都是對他們的蔑稱。那些居於嶺南山野的部族更被視作結巢而居的「鳥人」。試幻想一下，當（多種族）百鳥歸巢，（多語言）吱吱喳喳，鳩同鵲講，無厘頭呱呱嘈，又是相當妙趣奇觀。

無可否認，用「鳥語」來稱謂粵語，是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有人說，粵語不是漢語的分支，而是另外一種獨立的語言；更有人感嘆，外人聽粵語學粵語比聽外語學外語還難。」①

此種神秘主義反映在粵語大量創造諧音字諧音詞，對語音相諧隱性含義（例如「3388」就是「生生發發」）永遠情有獨鍾，對禁忌語永遠避諱（例如「通書」會變「通勝」），對委婉語（例如「死

① 康健、李高峰（主編）：《家庭●方言風俗史》（北京：京華出版社，一九九五），頁二三九。

咗」改稱「歸西」）永遠受落，對吉利語（例如「生菜」就是「生財」）永遠迷信，其心理與行為被認為是出於鳥人對語言的巫術崇拜。民俗學家認為語言可以溝通天地鬼神，趨吉避凶。使用諧音，除了出於戲謔，更是力量的表現。「語言，就是巫的一種法術、法力，具有賜福或避禍的魔力，這樣，巫的語言便有了至高無上的威望。」②至今我們香港人仍然迷信這種「語言魔法」。

聽不懂的語言最是可怕，因為背後可能隱藏蠱惑、異端、陰謀、叛逆，所以歷代政府都要推行「雅言」運動或者「正字（音）」運動，目的打壓方言鳥語，進行文化征服。孔子首倡要用正統漢語，認為大方得體，所以稱之為「雅言」，身體力行，捨棄祖家方言齊魯音，而歷代尊崇儒學，也就是尊崇雅言正音。治國之道，先要管治好語言，規定為官者必諳雅言，講好「官話」，否則不容出任要職。

清朝時代流行這樣一句話：「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廣東人說官話。」大抵粵人講普通話最難聽，所以上京做官者不多，尤其科舉及第，殿試對應，滿口鳥語，簡直嚇壞皇帝。而明清兩代五百多年政權，只容五個廣東人中狀元，就是皇帝怕聽廣東人說官話吧（另類陰謀論）。據清俞正燮撰《癸巳存稿卷九●官話》：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廣東人多不諳官話，着地方官訓導。廷臣議以八年為限，舉人、生員、貢監、童生不諳官話者，不准送試。福建省城四門設立正音書館。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嘉慶十一年，奉旨：上書房行走者，粵東口音於授讀不甚相宜。」③

可以看到從雍正王朝開始，廣東知識界慘受嚴苛打壓，被強迫到「正音書館」糾正語言，如果不諳官話就被取消應試資格。似乎政策並無預期的收效，唯有展限四年。嘉慶皇帝更變本加厲，認為學問就算怎樣的超卓，但滿口粵東口音者，不適宜「上書房行走」（做皇帝的侍讀）。廣東人從來得不到皇帝的歡心，官途無望，索性把心一橫，淡泊政治，對外開放，努力從商，與外國人交往，做就了講求經濟實效（不談政治）的粵（港）人性格。當語言一旦掉棄沉重的「道統包袱」，立刻變得大膽放任，反智反「雅」，混雜（國際）文化，不以常規出牌，愈顯得趣怪奇觀，也就更加無厘頭了。

這種語言奇觀現象，可見於其時粵人知識分子皆愛用粵語入

② 張廷興（著）：《諧音民俗》（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二〇〇〇），頁二。

③ 俞正燮（著）：《俞正燮全集二●癸巳存稿》（安徽：黃山書社），頁三六九至三七〇。

詩，鳥語混雜着雅言，妙趣橫生，例如倫文敘、何淡如、胡漢民、廖鳳舒等都是此方面好手。香港名流伍廷芳（清末粵公費留學生第一人，獲美國林肯大學博士，回國任外交官）留下一首語言奇觀代表作的詩，曾傳誦一時，那年是民國六年，袁世凱稱帝，伍氏隨孫中山護法南下廣東，無奈軍閥阻撓局勢，難有作為，便苦悶題詩：

倉皇撲被返「間當」，
深悔此行「土依郎」，
護法問題真「索利」，
捫心何以對「婆桑」。

此詩奇觀性在於每句混雜了英文字，正寫應如下：

倉皇撲被返Canton（廣州），
深悔此行Two Years Long（兩年），
護法問題真Sorry（抱歉），
捫心何以對Person（諸君百姓）。

用混雜的語言製造無厘頭式戲謔，是出於對政治的挫敗感，對社會前途的失望，當年港粵知識界最喜運用，例如廖鳳舒（革命元老廖仲凱之弟，早年出使古巴）目睹廣州經濟混亂，貪污舞弊，兵賊難分，簡直哭笑不得，於是用混合語撰詩《廣州即景》：

鹽都賣到咁多錢，
難怪鹹龍跳上天，
官府也收來路貨，
賊公專劫落鄉船，
剃刀刮耐門眉爛，
賭棍扒多席面穿，
禾米食完麻雀散，
留番光塔伴紅棉。

此詩雖非千古絕響，但一點不俗氣，更婉而多諷，活現亂世之情，非雅言正音可以如此傳神也。後來，廖鳳書在港把自己的粵語詩編成《嬉笑集》出版，學界名人簡又文先生（太平天國史和華人基督教史專家）序中論粵語入詩：「何胡兩位是先鋒，番話夾埋有伍翁……中國詩壇起怪風，可惜老嵩唔會睇，冬冬也野芫荽葱。」哈，哈，一樣無厘頭好搞笑，詩中「何胡」是指何淡如和胡漢民，「伍翁」就是伍廷芳，更指他連英語（「番話」）也夾雜詩中，令中國詩壇吹起奇趣之風，簡直激死「老嵩」（北人）。笑聲中隱藏着多少淚影，不是因為國家紛亂，知識分子無所適從，明知呱呱嘈起不到甚麼作用，唯有寄情製造無厘頭語言奇觀，轉折而弔詭地對政治社

會抗議。不難想像其處境正如過渡後十年的香港，無厘頭政治漫畫政治笑話此起彼落，正如莎士比亞《馬克伯》名句：

「一個白癡講述的故事，充滿聲音與憤怒，但顯示不到甚麼。」

最難得者，粵人的語言奇觀是不分等級的，能精神上下相通，身體力行，知識界如此，勞工界一樣。

香港開埠的港人成功傳奇之一，洋商某日巡貨倉，發現很多貨物損壞，非常震怒，人人害怕，其中一個小工大起膽子開聲：「Too Much 咄咄，No Get 咬咬！」洋人立刻明白，是因為太多老鼠（「咄咄」），沒有貓兒（「咬咬」），於是立刻在貨倉養貓，抑止了鼠患，而那名工人因敢於與洋人溝通，很快便當「買辦」致富。語言奇觀使他走向成功之路。

傳奇之二，港口風雲變色，洋船長不滿船上工人敲木搥釘發起的噪音，找人責難，一名木工答得趣怪：「雷公靈林叻，Fire 過天劃，Wood Man 逼逼拍拍！」洋船長立刻明白天上行雷閃電，木匠緊急搶工防漏，認為此人能幹敢言，便推介他到洋行做買辦。又是語言奇觀使人成功。

正是：「成功之道，語言放縱，那怕無厘頭，但求口爽爽。」

這樣的態度與慎言的儒家思想截然背道而馳，亦令到粵（港）

的語言奇觀綻發異彩，五色迷人。試閉目幻想一下，語言帶給我們生猛妙趣的情景：

- 武林奇觀（神經刀、耍太極、拆祠堂）
- 烹飪奇觀（煲老藕、燉冬菇、濕柴炆老鴨）
- 動物奇觀（胭脂馬、白鴿眼、豬嗰咬螺殼、哦企水魚）
- 植物奇觀（茅根竹、碌冬瓜、拋生藕）
- 數字奇觀（二打六、又一又七、五五波、九出十三歸）
- 人體奇觀（一眼關七、大耳窿、膝頭大過脾、口大吞泡）
- 種族奇觀（摩囉差拜神、法蘭西皇帝、非洲和尚）
- 土佬奇觀（三水佬食麵、潮州婆電髮、沙井佬摸蠔）
- 傷健奇觀（盲公打老婆、阿崩咬狗虱、阿聾燒砲）
- 行業奇觀（抬棺材甩褲、阿茂整餅、星架坡賣蔗）
- 飲食奇觀（二四雞粥、食檸檬、食死貓）
- 雙併奇觀（食Tea、K仔、Down機、Call輪）
- 特區奇觀（八萬八、沙士、老懵董、掃把頭）
- 色慾奇觀（三點不露、高佬森晒太陽，食咗過期春藥）
- 戰爭奇觀（原子彈炸烏蠅、打飛機、七國咁亂）
- 鬼怪奇觀（閻羅王揸攤、鬼搵腳、吣鬼食豆腐）

請張開眼睛看看，影像仍然活形活現，隻字片詞後面呈現生動活潑的故事，而且呼之欲出，就像電影那樣帶給我們壯觀感、奇觀感、樂趣感……

粵人鳥語本來就是貶意，正因如此亦毋須背負上甚麼政治包袱和文化正統的擔子（所謂「語言治國」、「語言衞道」），立刻輕鬆如意，竟變成一個全然開放的系統，創造力豐富，士農工商人人都可作出貢獻，胸襟自由民主，包容量度深不可測。

普通話南下，香港話北上

廿一世紀是中國語言大變化的開始，二〇〇〇年暨南大學出版了《廣東地區社會語言文字應用問題調查研究》一書，肯定的指出廣東話正佔着史無前例的優勢，已影響着全個中國：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廣東走在全國之前，首先對外開了大門，外來投資紛紛湧入，尤其是珠江三角洲，成為外資垂青的熱土……經濟發展日新月異。隨着經濟的發展，外地人士湧進珠三角尋找個人發展的機會。為克服方言的隔閡，方便工作的開展，學習方言竟成一股不小的勢頭；同時，以香港為代表的粵語通俗文化，通過電影、電視劇、廣告、漫畫、小說等，在全國風行一

時。再加上廣貨的魅力，廣東對外省市投資的擴大，無形中提高了粵方言的地位，擴大了粵方言的社會交際功能。全國各地如北京、上海、南京、武漢、長沙、廈門等重要商業城市，都開設了粵語講習班，出版社出版多種粵語教科書。這便形成了所謂的『普通話南下，粵方言北上』的局面……」④

我放下書，在怔怔的想：今日的喜，昨日的悲。

一九四九年解放大陸，中共政權推行全國普通話化運動（正式是「普通話南下」），以配合集體主義治國之道，廣東方言在所有媒介（報刊、電台、廣告、電影）中消失，除了日常交談還用粵語之外，學校授課和政府機關一律「普化」。這年代吃的是大鑊飯，着的是解放裝（藍色和灰色），個人給發配到公社及生產大隊，工餘時間要開會學習正確的政治思想，所以語言統一是非常重要，因為國家整體就是一切。如此下去，一點都不樂觀，粵方言遲早淪為Dead language。

香港便開啟了粵方言的「文化孤島」時期，在英語（殖民地官

④ 詹伯慧（主編）：《廣東地區社會語言文字應用問題調查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頁十三。

方語言）和國語（中共官方語言）的隙縫間徘徊，雖無所適從，但又自得其樂。我輩長於港學於港者，都會感到自己在混雜的語言文化中翻滾，在學校裏，你未必要學國語，但經常要聽讀講寫英語（尤其當年港人群起入讀英文書院），但學校和教育制度卻要求大家寫最標準漢語，不容簡草錯別字，更遑論粵語入文。電台播放大量解放後南來的上海歌手所唱的國語時代曲，還有歐西流行的慢歌快歌，但人人琅琅上口的卻又是「擔番口大雪茄，充生晒做經理」或者「飛哥跌落坑渠，飛女睇見流淚」。香港的中小型報紙依然堅持着廣州報業獨特的「三及第」（文體結合文言、白話和粵語）文化，甚且變本加厲去到有「四及第」（即是加入洋文）。我們既愛荷里活電影，也愛國語片，卻又念念不忘吳楚帆沉重的一句「食碗面，反碗底」、鄧寄塵和新馬仔的兩傻拍檔、關師傅的黃飛鴻、鄧碧雲銷雲柳「阿嘅」口音、「落花滿天蔽月光」式古雅劇。甚難得的放任自由，而從另一角度看，語言不統一，人心就不團結，正符合港英政府分化華人的管治手段。總之，寄隅南天海角，粵語方言能有機會生存繁殖，已心滿意足，而且因緣際遇，不停面對新事物及外來文化的衝擊，竟意外地發展神速，更一日三變，每天變出新語新詞，目不暇給，蔚為奇觀。

無可否認，一九六七年的大暴動（史稱「香港的內戰」，大量青少年參與反英）標示着香港新一代本土意識的興起和本土文化身份的成長，而無巧不成話，香港在當年十一月出現首個「唔駛錢任睇」的無線電視台，正好配合着新世代（解放後成長的第一代）擺脫傳統，出發找尋一個全新的媒體去表達自我、去呼喚社群、去建立身份。其實，暴動（反殖）之後，很多大學生突然醒覺，不願意操洋文做官，更討厭看洋人面色做洋行買辦，而另一方面卻又質疑傳統中國文化（亦有自號「新文化人」者），開始轉投電視台，追求創意，追求夢想。最重要者，所開展的創意工業卻是清一色廣東語言，不論是大笪地表演式的《歡樂今宵》、西洋搞笑派的《雙星報喜》、史詩式的金庸武俠劇、通俗煽情的翡翠長劇等，為了與市民共同呼吸，全部「土話」上陣，親切動人，讓大家能享受着同一種文化氣氛。電視又直接帶動粵語片的復甦，更令新興的廣告業欣欣向榮（那些「點止汽水咁簡單」、「唔出奇吖」、「平霸喇」等宣傳語變成港人的口頭禪）。跟着粵語電視劇主題歌曲瘋魔全城，刺激起整個唱片工業（而副產品包括演唱會和形形色色的唱片頒獎禮），用自己的語言，唱自己的心聲，所謂「詩（歌）言志（智）」，天下間最重要不過了。結果更出人意料，廣東流行歌竟唱遍東南亞、

臺灣和後來開放改革的祖國，甚且近年出版的英文字典還收錄了Canto-pop（Cantonese popular song）這樣的新語詞。

誰說孤島難鳴？我們正在大鳴大放。

且容許我妄自尊大的說，經我們這麼的一鬧，廣東話不但有救，而且比以前更強大更生猛，這點誰也始料不及吧。

七十年代末期，香港邁向富裕繁榮，港人為自己的奮鬥引以自豪，反映在文化價值觀上：「香港人用香港貨」、「香港人講香港話」、「香港人睇香港電視」、「香港人睇香港電影」、「香港人唱香港歌」、「香港係得嘅」、「香港是天堂」（包括「美食天堂」、「購物天堂」）。

再加上文革十年神州浩劫，淒風苦雨，廣東沿海一帶居民紛紛逃亡，越境尋找「天堂」（短短幾年間令香港人口增加一百萬），在陌生環境下求存便要急於找尋文化認同（因文革破壞教育，知識水平低落），盡速融入社群，唯有投港人所好，看港片港劇唱港歌，學港人衣着生活言談嗜好，努力做一個「翻版香港人」，當站穩陣腳後「衣錦榮歸」，托着大小電器回鄉探親，一句走音香港話「我喺香港返嚟啦」，簡直全村震動，人人羨慕。這便開展了一個新時代，大陸人對香港文化的全面接收。

八十年代中國開放改革走資，形勢大好，香港文化北上，先是「東西南北中，發達在廣東」，登陸第一站當然是同聲同氣的廣東，電視劇《霍元甲》、《上海灘》、《陳真》等，率先引領風騷，繼而「浪奔浪流」港歌滿天飛，一路順風順水，浩浩蕩蕩北上，竟遍達全國。你或許認為區區幾句香港話北上算不了甚麼，根本毋須大驚小怪，但你有所不知了，語言背後還帶動着一大堆文化模式、文化生產、創意工業、生活方式、公眾面譜，甚至意識形態。

想到這裏，我再拿起書，引述廣東話（和香港話）的文化北上，如何引發翻天覆地的震撼：

「廣東成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綜合試驗區，廣東文化更具創造性和超前性。新的經濟模式、管理體制、經營方式、新的思維方法、價值觀念、道德觀念、文化觀念，以及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時效觀、人才觀、信息觀、競爭意識等，形成一股強大的衝擊波，迅速向內地輻射開去。」⑤

所以，再經此一鬧，我們的香港話史竟無前例的能量大增，絕對有機會活多二百年呢。

⑤ 同註④，頁十。

推普機碾不碎粵語的舌頭

葉輝（文化人、傳媒人、作家）

二〇一〇年五月底與陶傑、潘國靈到廣州為香港書展路演，開講前徵詢「民意」，講者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發言？全場大呼「粵語」，我們三人的舌頭自由了，便用粵語暢所欲言——當時只聽聞廣州電視台正醞釀以普通話取代粵語廣播，「煲冬瓜（普通話）收皮」大抵尚未喊得那麼響亮，當然也想不到，此場路演竟然變相聲援了波瀾壯闊的「撐粵語」運動。

其後在電視新聞、報刊、網絡看見了連場集會，得悉群眾高唱《海闊天空》：「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那是對解除束縛的渴求；也高唱《半斤八両》：「我哋呢班打工仔，一生一世為錢幣做奴隸……」那是對生活煎熬的嘻笑怒罵；他們不願意見到粵語被普通話「滅聲」，選擇了如此這般的兩首昔日港產流行歌，正是因為有壓迫就有反抗。抗爭場面曝光了，全世界都看見了，那只是 i-See，還有不可迴避的問題尚待解答：這場抗爭究竟有何深層意義？

真粵人：蜑人與鮫人

粵語版圖覆蓋兩廣，自漢代以降，一直奉行一地雙語制，相安無事——朝廷派來的交趾刺史、來自五湖四海的商賈與「墾卒」都以「雅言」（官話）溝通，而百越土著都說方言，雙語沿嶺南江河交匯，相互滲透，粵語及其「次方言」（四種廣府話以及兩陽話、四邑話）由是逐漸形成，其後「雅言」式微，倒在粵語保留了「雅言」的痕迹。企圖強行給方言裝上各種「滅聲器」的共產黨官員都是外省人，他們既不懂得粵語的文化源流，也顯然不懂語言史及其規律——所有官話（包括普通話）都是政治權力的產物，以普及為大前提，本質上有無可避免的粗疏，反之，方言源遠流長，必然厚積了一個地方的生命力及創造力。

「撐粵語」集會有一條標語寫道：「推普機出沒注意」，自創「食字」新詞兼借用日語，甚有「吉士」，對，「推普機」永遠不可能碾平粵語（或任何方言）的舌頭。這教我想起，林語堂在《吾國與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譯《中國人》）稱廣東人為「另一種中國人」：「他們充滿了種族的活力，人人都是男子漢，吃飯、工作都是男子漢的風格。他們有事業心，無憂無慮，揮霍浪費，好鬥，好冒險，圖進取，脾氣急躁，在表面的中國文化之下是吃蛇的土著居民的傳統，這顯然是中國古代南方粵人血統的強烈混

合物。」這說法不失聰明與幽默感，然而，古代南方粵人其實不止一種，或者可以說，至少有兩種：一為屈大均在《廣東新語》所說的「真粵人」，一為反抗中原政權的南來移民。

「真粵人」是古代南海的蜑人或鮫人——《清稗類鈔》說：「蜑人蓋即古之所謂鮫人者」，也就是相傳居於大澳的盧亭（又稱盧亭魚人），東龍島「石壁畫龍」的龍刻像（他們自命龍戶），綜合古籍所載，他們「文身斷髮，以避蛟龍之害」、「點涅其面，畫體為鱗采」（即紋面、紋身），「以舟為室、視水如陸」，亦即「廣東采珠之人，懸綆於腰，沉入海中得珠」，據此，極可能就是《禮記》所載的「雕題交趾」、《山海經》所載的「雕題國」（也有一說指雕題國是台灣）子民，「雕題者，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這些紋身的「真粵人」與魚鱉同處，「莫肯為秦虜」，他們反抗，是因為不甘同化於中原文化。

胡適以粵語寫詩

反抗中原政權的南來移民有漢代的趙佗，在兩廣建南越國，南方稱王，歷五代凡九十三年；也有東晉的盧循（及孫恩），屢敗屢戰，浮海南下而破番禺（今廣州），自稱平南將軍，其後表面上接受朝廷所封廣州刺史等官號，暗裏派親黨攻佔據始興（今韶關以

南），還伐木造船，伺機北伐，最終兵敗自殺。這些南來移民剛勇不屈，與好鬥、好冒險的粵人如洪秀全、孫中山一氣相通，儼然就是林語堂說的「另一種中國人」。

南來者對粵語的態度也至少有兩種，一種是魯迅的，一種是胡適的。

魯迅的心態是過客心態，他有一篇《在鐘樓上》，對粵語有此看法：「而最大的阻礙則是言語。直到我離開廣州的時候止，我所知道的言語，除一二三四等數目外，只有一句凡有『外江佬』幾乎無不因為特別而記住的 Hanbaran（統統）和一句凡有學習異地言語者幾乎無不最容易學得而記住的罵人話 Tiu-na-ma 而已。」Hanbaran 是「冚唪呤」的譯音，Tiu-na-ma 則是「丟那媽」的譯音。

胡適的心態倒是文化交流的心態，他曾於一九三五年南遊廣東，在《南遊雜憶》寫道：「我在船上無事，讀了但怒剛先生送我的一冊《粵謳》，一時高興，就用我從《粵謳》裏學來的廣州話寫了一首詩。」此詩題為《黃花崗》：「黃花崗上自由神，手揸火把照乜人？咪話火把唔夠猛，睇佢嚇倒大將軍。」其後補記，第三句原作「咪話火把唔夠亮」，參考了汪精衛的意見，將「亮」字改為「猛」字。以粵語入詩，「猛」顯然比「亮」傳神得多。

丟那媽的命令！

魯迅其寶也像「消滅」袁崇煥像下面那句「掉那媽（原文，「丟」似乎較通用），頂硬上」的官員，對「丟那媽」顯然是一知半解，按照吳開斌所編《簡明香港方言詞典》的釋義，「丟那媽」被戲稱為廣東省「省罵」，義近國罵「他媽的」，並隨廣東人越出省境：「但在通常情況下，罵人意味已大大淡化，而用之於表憤恨、不滿、驚奇、失望等感情，某些人更乾脆用作講話的開場白。」據此，這「省罵」其實沒甚麼大不了。

上世紀三十年代「民族主義文藝運動」主將之一黃震遐是廣東南海人，他在《大上海的毀滅》這本被評為失敗之作的長篇小說卻活用了「丟那媽」：

「喂，排長，我們到底上那裏去喲？」——其中的一個問。

「走吧。我也不曉得。」

「丟那媽，死光就算了，走甚麼！」

「不要吵，服從命令！」

「丟那媽的命令！」

這段對話曾被魯迅引用，因而廣為流傳，一個叫喊「不要吵，服從命令！」另一個則叫喊「丟那媽的命令！」驟耳聽來，彷彿就是「撐粵語」運動的寫照。

粵普語言問題小議

曾曉華（劍橋大學英文系哲學碩士、香港科技大學講師）

二〇一〇年，廣州發起「撐粵語運動」，市民無懼打壓，挺身捍衞本地語言，使得當局讓步，擱置電視頻道轉用普通話作廣播。風波看似平息，卻在珠江三角另一隅的香港悄然再起。先是有教育界中人，聲稱以普通話教學，可令學生中文能力有長足進步。政府資助製作的普通話科教育電視，把講廣東話的人，塑造成「要用粵語一統天下、最恨普通話」的魔俠。就連教育當局，在官方文件中，竟指廣東話乃「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凡此種種，不免讓人對廣東話的前景產生憂慮。

觀乎香港和中國內地，不少人對普通話有所誤解，以為其乃中文之正宗，或地位較崇高。筆者以語言教學及研究為業，自然希望能書管見。茲以語言學角度略談粵普的語言性質問題，拋磚引玉，就正於高明。

方言論與主從說

傳統文人研究語言，往往把廣東話和普通話，定性為「方言」和「共同語」，認為兩種語言處於「主從」的關係。這種層級分類（hierarchical classification）遺下不少問題。它意味着兩種語言屬母子關係（parental relationship），即粵語由普通話衍生出來；或兩種語言的地位有高下之分，即普通話較粵語優越。

其實，「粵語方言論」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當中有一前提（presupposition）。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說廣東話的人既身處國境之內，粵語自是「地『方』之『言』」。這種史地觀念可謂名副其實的「中國模式」，論者常站在中央皇朝的權力台階來看天下，自覺或不自覺地把語言問題政治化。語言學家相信「實例無欺」（Let data speak），對這等帶有主觀情感的論點，恐怕不能苟同。

先談語系分類。世界上的語言多如恆河沙數，語言學家按語言的特徵加以比較、推敲、歸納，得出若干語系。當中為人熟悉的，包括約佔全球人口一半的「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以及約佔四分之一人口的「漢藏語系」（Sino-Tibetan family）。印歐語系又有不同的分支，如德語語系（Germanic）

及羅馬語系（Romance）等。英語屬德語語系；羅馬語系則包括法語（French）、意大利語（Italian）、西班牙語（Spanish）和羅馬利亞語（Romanian），這組語言是平行（parallel）的。漢藏語系可劃做兩大分支，即「漢語語系」（Sinitic）及「藏緬語系」（Tibeto-Burman）。漢語語系下有七位成員，包括粵語、北方話（Mandarin）、吳語、閩語、湘語、客家話和贛語（參附錄一：漢語語言分佈圖）；同樣，這組語言都是平行關係。從以上分類可見，粵語和北方話處於同一層級，絕對不是「主從」的關係。若說粵語或吳語是種方言，邏輯上等同說，法語是意大利語的方言，或者德語是荷蘭語的方言。

方言與區域變化

再談方言（dialect）。一般而言，社會語言學家先確定一種語言，然後着手調查該語言在不同區域的變化（regional variation）。要測試兩種語言是否系屬方言，語言學家有一條重要的原則，名為「互懂程度」（mutual intelligibility）：究竟說那些語言的人，溝通能否無阻？在美國，說北方英語如波士頓英語的白人，聽南部黑人 rap 歌，縱然兩種英語的口音和詞彙存在顯著的差

異，彼此理解卻沒有困難；而在英國，倫敦人聽蘇格蘭人說話不成大問題，雖然後者保留大量保守的中古英語發音。因此，說美國和英國有不同的方言，毫無疑問是成立的。把同一問題放到漢語來，堅持中國境內有「七大方言」的朋友，不妨問問自己：假設沒有這兩種語言的背景，你能聽懂客家話或上海話嗎？

方言調查的範圍，可以小至一個省，例如廣東省內的粵語；可以是一個國家，例如英國的英語；甚至是跨國，例如俄羅斯（Russia）、白俄羅斯（Belarus）、哈薩克（Kazakhstan）之間的俄語比較。調查區域變化，主要體驗在語音上，即大家常關注的口音（accent）問題，也有語法上的調查。英國學者 Peter Trudgill 在《英倫方言》（*The Dialects of England*）一書，從語音和語法兩方面着手，調查英格蘭各地的說話方式。例如「long」一字，英國南部一般讀 /lŋ/，但北部如德林（Durham）和紐卡索（Newcastle）卻把該字的元音讀成 [a]，發音接近「lang」。標準英文說「I haven't got any」，個別地方會說成「I ain't got none」，又以「I done it」代替標準英文的「I did it」，「a man what I know」代替「a man that I know」。

筆者認為粵語不是普通話之下的方言，卻認為漢語系的確有

方言。該如何理解這種說法呢？漢語語系中的各語言是獨立的（雖然個別語言之間有相似的特徵，而且中國語言都採用同一文字系統），但每種語言均存在區域的變化，因此，每種漢語語言皆有其方言。以電影《唐山大地震》為例，地震後方達的奶奶專程到唐山把孫兒接到濟南，兩婆媳在屋裏為這事談了一晚上，觀眾如果細心點，便能發現二人的口音（主要在聲調上）是不一樣的，因為李元妮徹頭徹尾說有唐山口音的北方話，奶奶是濟南人，說的是濟南的北方話。這就是北方話之間的語音差異。

在香港，我們會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你唔識死呀？」。筆者曾經在湛江聽人說過：「佢真係冇有識死。」雖然筆者不會這樣說話，也從沒聽過香港的人這麼說過，卻無礙筆者理解湛江人的意思。句法上，「唔識死」跟「冇有識死」，分別是「否定詞—動語—動語補語」與「否定詞—動詞—名詞」結構，兩者不相同。這就是廣東話方言之間的語法差異。因此，我們可以把唐山北方話和濟南北方話理解為北方話的方言，把香港粵語和湛江粵語理解為廣東話的方言。

方言與口音

對一般人來說，「方言」與「口音」，普遍帶有貶意。筆者在網上隨便找些例子都能印證這說法：

- 一項普通話水平測試顯示，港人的普通話水平正在逐步提升。負責測試的機構發言人表示，在普通話水準上，香港方言區比起內地其他方言區已毫不遜色。（《三聯生活週刊》）
- 廣州方言區更易患鼻咽癌？（《南方日報》）
- 北方方言以外的所有方言統稱南方方言。沒有一種南方方言曾形成自己的方言文字。因此，南方方言也稱為「不完全的語言」。在書寫體系上，只好牽就使用北方話為基礎的白話文。這就是漢語上的「牽南就北」現象。粵語、吳語和閩南語等方言雖然也有一些各自特有的漢字，但這些漢字只限於俚語等民間文藝用語的範疇，如民歌、地方戲等。（Baidu百科）

內地學者喜歡強調「方言區」的說法，把「七大方言」的每個地域視為一「方言區」。「區」之下，再設「片」、「小片」和「點」。即使以此做標準，廣東才可稱得上是一「區」，是為「粵方言區」，下設粵海、四邑、高雷、桂南、莞寶和香山等「片」。香港和廣州俱屬「粵海片」。

筆者相信上述例子，不是出自專家之手，但「香港方言區」和「廣州方言區」等說法，當可反映部份社會人士，即使受過良好教育，對方言的認識着實有頗大的偏差。而運用語意分析（semantic analysis）的方法，綜合數例，能看出方言相對於普通話，是次一等的語言，處附庸地位；應用範圍也只限於民間，是一種「次文化」，難登大雅之堂。更甚者，與病毒有所牽連。上述的標籤，任擇其一，都不是好東西。同理，「口音」的涵意（connotation）也是負面的。試想像，若有人講一句，「他說話有口音」，你會聯想到的是甚麼呢？就此我問過一些不是主修語言的朋友，大家的答案不外乎是「說話帶鄉音」或「發音不正」。

對此，筆者想引用 Peter Trudgill 在《英倫方言》談論方言與口音的一段話，跟讀者分享：

這本談論英倫方言的書，記錄我們講英文的方式。它記錄我們所有英格蘭人講母語的方式。我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所有人說話都帶一種口音，而所有人的說話都是一種方言。你的口音就是你講英文時發音的方式；因為我們說話時得發音，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有一種口音。

誠然，有些口音，較之其他，具濃厚的地域色彩。有些人的口

音，帶很強烈的地方特色；如果你對分辨口音有夠敏感，能準確講出說話者來自何方。有些人的口音，少一點地方色彩，你只能約略把他們歸類：「你來自英格蘭的西部，但我不知是哪個城市」。然有些人的口音只有極少的地方特色，你只能講得更含糊了，像「你是南方人吧」。甚至有更少的人——約佔全國人口的百分之三至五——口音完全不帶地方特色。這些人一般都是公學（按：英國貴族學校）畢業，或希望以這形象示人。這種口音，有時被稱為「BBC口音」，因為廣播國家新聞的電視和電台，其讀者一般來自這個人口的少數。

同樣地，每個人都在講一種方言。「方言」的涵意不單在於口音。我們指的不只發音，也包括詞彙和語法。正常情況下，一種方言和其口音會一起出現。如果你講蘭開夏郡（Lancashire）方言，很明顯你會用蘭開夏郡口音講。

我們值得先為口音和方言定個界限，因為接着我們要討論那個稱之為「標準英語」的重要方言。標準英語是一種常用於寫作的方言。說標準英語的人，是英國裏受過最好的教育和社會上最有權勢的人。以標準英語為母語的人，該不超過英格蘭人口的百分之十二至十五，一般人不把標準英語視為方言，但這種英語在語法上與其

他的有所不同，故明顯與其他英語方言無異。

Peter Trudgill 是英國方言研究的大師，從他這段語重心長的文字，可以歸納出幾點：一、方言和口音是中性的概念；二、任一個人的語文能力再高，他都有口音，他說的也是一種方言；三、標準英語自然是方言的一種。

走進中文的語境，即使一個人說得一口漂亮的北京音，在普通話水平測試拿一級甲等，現代漢語運用嫻熟，甚至擔任央視新聞主播；在語言學家眼中，此人講的仍然是一種方言、操一種口音；而這並不帶貶意。

普通話的本質

根據官方的定義，普通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這段話說得很清楚，普通話主要是由北方話構成的，並且以北京話為基準。但須留意的是，普通話與北京話並非全同。我們論證了北方話有不同的方言，北京話應為其一。普通話的詞彙量，並不等同北京話的詞彙量；普通話的發音，也不全同於北京話發音。好些老北京話的語音特色，並沒有納入普通話之內。例如「波浪」，普通話讀

作 bō làng，北京話卻有人讀為 pō làng；「比較」，普通話讀作 bǐ jiào，北京則有一讀法為 bǐ jiǎo。何況今天的普通話，已經融入很多其他漢語語言（如把「美女」說成 liàng nǚ，即粵語的「靚女」）以及外來語言元素。因此，筆者認為普通話已是一種以北方話為主、並揉合了其他漢語語言特色的混合語言（a hybridised Sinitic language）。

普通話在官方看來，是「現代漢民族用來交際的語言」。這段陳述本身就不具主觀價值的判斷。部份學者把它看成是「方言」跟「民族共同語」的二元對立，那是後話。把普通話界定為「漢民族」的語言，足見大陸的政治考慮：普通話時至今天通行全國，學的豈止是漢人？少數民族不說，至少還包括滿、蒙、回、藏等種族。正因如此，普通話在功能上扮演了「通用語」（lingua franca）的角色。綜觀世界的語言現象，通用語的作用，是為兩個或更多操不同母語的語言群體，提供一個溝通的媒界。通用語可以是強勢語言，例如遠古時代羅馬帝國在歐洲南征北戰、用以維繫歐洲眾邦土的拉丁文，或者十九世紀因奉行殖民主義在非洲大陸流通的德語和法語，或者在二戰後崛起、藉經濟和文化強勢帶動的美國英語。通用語也可以是凡人眼中不入流的語言，例如鴉片戰爭前省城商人跟西

方進行貿易的洋涇濱英語（當時雙方用一些今天看來頗爛的英語來溝通，如「口花臣口夭米其干打」代表「How fashion you makee conta」，意即「How do you calculate?」），或者今天在太平洋島國巴布亞新畿內亞（Papua New Guinea）有一種名為 Tok Pisin 的洋涇濱英語。成為通用語的重點在於，語言社群之間有接納該語言作為交際語言的共識。

因此，我們不妨把普通話理解成一種以北京話為主調的通用語。從功能來看，它成為中國境內不同地域的人的溝通途徑。僅此而已。北方話和廣東話，兩種處於同一語系的平行語言，語法雖然相似，但語音、句法和詞彙各有特色。此中或容客觀語言特徵的比較，卻不應存優劣、高下、主從的標籤。

對等的自覺與尊重

以上論證相當顯淺，相信可解開坊間對廣東話和普通話的不少迷思。只是，何故不少人對兩種語言的對等關係缺乏一份自覺？說穿了，不過是民族意識隱隱作祟。強行把普通話和粵語兩種本無母子關係的語言分層，情形如同在東南亞地區，跟說不同語系的人如馬來人說，他們的語言較之已通行亞洲的普通話，只屬一小地

區人所用，因此也不妨同時把泰語、馬來語（Malay）、泰米爾語（Tamil）、印尼語（Bahasa Indonesian）等也列為「方言」。但筆者想，即便是再大北京、大漢族的沙文主義者（Chauvinist），也不敢訴之於口。畢竟這番話，頗有「共榮圈」的味兒。那麼，相同的邏輯，不同的待遇，是不是只因為前者鎖上一道叫國疆的大門？

從中國走到世界，再從世界走回中國，抽離國族和疆界，用理性的邏輯來重新思考和審視現狀，筆者相信能有更多良性的辯論空間。屆時，好些謎團自能迎刃而解，如「為甚麼美英日德法等強國就有統一的語言，人民不會雞同鴨講，咱們中國人就得各說各話，讓鄉談成為束縛國家發展的繩子，讓方言成為中國一盤散沙的沙子」。有些看似有浩然之氣的大道理，如「保衛廣州話不應與普通話對立起來」，實在不值一哂。今時今日，不論在廣州還是香港，民間發聲捍衛母語，非為製造社會矛盾，只為珍惜牙牙學語時父母教會自己的第一語言，也為承傳急劇變遷的城市留下來的無形文化遺產。

縱觀英國歷史，英格蘭人在威爾斯也曾積極地「推普」，埋下至今仍理不清的恩怨。在威爾斯只能講本土語的人口，由一八九一年的百分之三十，在四十年間驟降至百分之一；講雙語（威爾斯

語和英語）的人口，也由一八九一年的百分之五十四，下降至一九九一年的百分之十八點七（參附錄二：威爾斯語言人口的比例變化）。強勢推行英文，直接導致威爾斯的後代喪失承繼本土語言的能力，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殖民地時代的一些政策，為後世所批評和詬病。縱然如此，港英政府——至少在語言政策上——沒有以「威爾斯模式」處理遠東事務，港督沒有下令以英文取締華文報章和電台，中文和英文總算能「和平共處」。這跟日本統治臺灣時實施的皇民教育，實不可同日而語。

筆者承認普通話在當今中國以至全球華人社群間的重要性，也一直認同香港的新一代有需要掌握好這種語言——相信即使是反對普教中的人，也會認同以上兩點。但這不代表推廣普通話的同時，就要刻意貶低廣東話和其他漢語語言的地位，甚或通過教育資源和媒體攻勢等手段，來妖魔化廣東話和抹黑捍衛粵語的人。雞蛋的一方，訴求其實很卑微。他們懇求權力的一方，推己及人，給予一點基本的尊重。他們現在所做的，不過是對着高牆吶喊：「俾條路嚟行下，得唔得呀？」

（本文原載於二〇一〇年八月十四日，《明報》副刊「世紀版」，現作增刪修訂。）

附錄一：漢語語言分佈圖

附錄二：威爾斯語言人口的比例變化

年份	單語人口（威爾斯語）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雙語人口（威爾斯語及英語）佔總人口的百分比
1891	30%	54%
1931	4%	37%
1961	1%	26%
1981	0.8%	18.7%

資料來源： David Crystal（2003）.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省思廣東方言的價值

湯翠蘭（澳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
澳門粵方言學會理事長）

語言是一種具系統性的符號，是人類用來溝通、交際、思考最常用的工具。雖說是工具，語言所承載的，卻是對周遭環境乃至世界的萬事萬物的認知。當使用同一種語言的族群人口增多，社會的階層漸趨複雜，所居住的範圍有所擴展，語言就會變異：由於年齡、性別、職業、教育水平、社會地位等因素而形成的語言變體稱為社會變體，而由於所處地域不同而產生的變體則稱為地域變體，也就是一般人所謂的方言。俗語所云「一方水土養一方人」，這說明了外在環境的不同，靠山還是近海，物產有所不同，所認知的世界就會有所區別，形成不同的文化。不同民族、不同族群的各種認知角度、思維習慣，通過語言形式表達呈現。因此，我們常說的「語言是文化的載體」，就包含了這層涵義。

中華民族擁有悠長的歷史，人民所使用的漢語，在各地形成不同的變體，各自擁有自身的歷史發展過程，形成一個個既有歷史傳

承又各具地方特色的方言，承載着各地人民獨特的文化傳統。包括香港、澳門在內的廣東地區，地處國土南陲，面向南海，既遠離政治中心，又不常受中原戰火直接波及，因而成為歷朝歷代人民南下避禍的容身之所；與此同時，由於廣東面朝南海，河流繁多，沿海地區就成為閩粵兩省以江海謀生的族群停居和通商之地。近數百年來，更有洋人到廣東聚居，或傳教，或做買賣。這些來自鄰近南洋，以至更遠如歐洲地區的各個族群在廣東這個地方共存，互相接觸、互相碰撞、互相影響，形成了廣東獨有的多元文化共生的現狀。

單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廣東地區就分別有粵、閩、客三大漢語方言，還有同屬漢語方言的水上話，以及這塊土地原居民的少數民族語言；如單以粵語為例，不同鄉鎮亦存在着不同的變體，如順德、中山、四邑、東莞、肇慶等地都是各具特色，與廣州話有一定的差異。潮汕地區亦有相同的現象。可見，廣東地區方言數量之多是很多北方省份望塵莫及的。

不同的方言變體所承載的文化各有千秋。廣東的粵、閩、客三種方言都比北方方言保留了更多古代漢語的音韻、用語。我們如用粵、閩、客其中一種方言去吟誦古代韻文，都可以立即感受到當中的平仄及抑揚頓挫之美。而古代漢語，如意表「看」的「睇」、意

表「怎麼」的「安」、意表「煮沸」的「沸」等用詞，都分別仍是粵、閩、客這三種方言中的日常用詞。

因為多個方言族群在廣東這塊土地有頻繁的互動和接觸，形成區域特徵，反映了地域風土人情的文化特色，如廣東大戲、潮劇、地水南音、客家山歌、鹹水歌，乃至粵語時代流行曲。有些城市鄉鎮還吸收了一些非漢語的元素。二十世紀的香港，報刊文章就流行着文言文、白話文和粵方言混合使用的三及第文體，其中不乏一些音譯英語的洋涇濱用語；港式連環圖（漫畫）中從上官小強的《壽星仔》起奠定了大量使用廣府話入文寫作的基石。這些看似市井不入流的作品都呈現出廣東的地方語言文化既多源多元又豐富多彩的事實。

人人都有權利以母語受教育

生物物種需要多樣性才可穩定地延續，而人類的語言亦應保有它的多元多樣。語言是人類重要的共同資產，包蘊了解人類不同民族不同族群歷史發展過程的重要的線索。語言作為承載文化主要工具，一旦消失死亡，亦代表一種文化就此消失，人類的歷史就永遠缺頁。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除了推動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的

保存外，還積極推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育，以蘇州話唱作的崑曲就是其中一項受關注的人類遺產。此外，該組織在一九九九年的一輪商議後，自二〇〇〇年起，將每年二月二十一日訂為世界母語日（或稱國際母語日），以語言的多樣性為前提，尊重每個人說母語、以母語受教育的權利，進一步推行到世界各地，推動和落實這主張。這些都是多元思維下的種種舉措。

然而，中華民族於兩千多年前首度出現統一政權、使用統一文字，歷年來在形成向心的民族和國族的認同之餘，還有一種定於一尊的思維模式，越接近政治中心或越以正統自居的，就越偏向於把自己視為唯一的標準；多數人也就有找標準靠的傾向，如國家的標準、省內的標準、地域的標準，認為那是尊貴、高尚、身份的標記和象徵。因此，當我們國家推行國語、普通話作為各地人民溝通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又稱通行語）時，這種二元對立思維也如影隨形地緊貼着國語普通話的推廣而到處狐假虎威，這時，國語普通話就不是通用語，而是標準語（standard language）了。

中國國土廣袤，漢語歷史悠久，演變至今，位於南北東西的各個漢語方言因為各有歷史、各自變化而形成現在千差萬別的面貌，有些甚至到了難以聽懂難以溝通的地步，這情況尤以南方方言如吳

方言、閩方言、粵方言等為甚。因此，在眾多方言中挑選一種訂定為大家賴以溝通的通用語絕對有其必要。然而，如果把通用語視作唯一標準，不夠字正腔圓、不合乎標準的就視為錯誤、不合規範，這樣的風氣勢必會使那些母語為其他方言的族群或主動或被迫放棄自己的母語，改用標準語，而這些方言就會不斷萎縮，甚至消亡。標準化的觀念越大、勢力越強，其他方言萎縮消亡的速度就越快。

在二元對立思維下，標準只有一個。符合標準就對，不符合的就錯；用標準語的是高級、高尚的，其他就是低等、鄙粗的；再引申開，就變成社會各階層把不同方言、語言的人分等分級，也就自然會出現凡是北方用語都是標準、凡是地方語都錯的觀念和心態。於是，就出現了唯標準語是從的情況，例如，因為意表「舌頭」的「腩」是方言詞而把專用地名「鴨腩洲」硬改為「鴨舌洲」，把北方口語詞「遛狗」空降到南方地區組成「遛狗公園」為一般市民服務，又或在幼兒教育中出現用廣府話講「呢隻係眼睛，呢個係鼻子」的教學情境。

其實，港澳地區以往的情況亦是二元思維的產物。在社會觀感、教育措施、大眾媒體的推波助瀾下，華人視廣府話為標準，更甚者以英文為尊，而母語教育的真面目其實是廣府話教育，不管學

生的母語原來是中山話、四邑話、圍頭話、客家話、潮州話、福建話、水上話、上海話還是其他語言。澳門土生葡人的圈子中情況相同，學校裏所學的是里斯本口音的所謂正規葡語，而大部份人本身的母語——土生土語（Patuá），則被視為不正統，只能退居家庭，難登正式的場合。所以，無論中外語言，二元的思維已使不少珍貴的語言就此消失，或已屆瀕危。

如果站在多元的角度去思考，我們則承認各地方言、語言及其文化與通用語一樣都有其存在的價值及受使用的權利，「語語平等」，我們都應該尊重。通用語只是為了方便來自各族群的人溝通的一種工具，不分對錯，不分高低。「遲到」與「晚來」、「樓梯」與「台階」、「質素」與「素質」、「中樂」與「民樂」，沒有錯對之分，「農曆新年」與「春節」同樣標準，「巷」、「弄」、「胡同」就讓它們各自在不同的地域中發揮它們的作用，不必統一。

事實上，各地華人除了對大中華民族認同外，他們同時對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亦有一份認同感。這份認同要遠遠比國族認同來得真實來得親切，當地的語言文化成為他們感情的依歸。當一個外來文化以高姿態進入，要當地人視他們為標準，等於要他們否定自己的根。輕則心靈備受創傷，重則起而捍衞本土的語言文化。

方言是源，通用語是流

我們應謹記，通用語是奠基於某一地區的方言，方言是源，通用語是流。通用語需要從方言中汲取養份，加強其表達力。如果只一味地要求標準、純正、規範，便會失去活力，以至僵化。當初文言文不就是因此而被唾棄的嗎？所謂的典範白話文如魯迅的著作不都是帶有紹興方言用語嗎？著名的作家如沈從文、莫言等人的文學作品，乃至著名的世界文學作品，不都是用帶有地方色彩的語言描述故鄉故土的故事嗎？

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應該要改變了！從多元思維出發，通過學習他人的語言去了解、欣賞別人的文化和思維。社會要創造既平等又多元的環境，各族群互相尊重，和諧共存，而不是想着最終要合而為一。例如，將地方語言習慣納入通用語中在地方使用，推行真正意義的母語教學，加強社會各族群的相互了解、相互學習。標準化只會窒礙文化傳承，也不利各方面的創新。外語可以讓人放眼世界，普通話可以讓人放眼大中華，而它們的立足點都應該是自身的母語及其文化。母語的缺席讓人讓城鎮既失其根又毫無特點可言，終將輕易被取代。正所謂有容乃大，我們應秉持多元寬容的態度處世，這才是民族、國家，以至人類的福祉。

用粵語誦讀古代韻文的好處

鄧昭祺（明德學院教授兼中國研究課程統籌主任）

據宋蔡絛《西清詩話》記載，北宋大詩人梅堯臣曾經到汝陰探望著名詞人晏殊，暢談古今詩歌體裁。分手時，晏殊在潁河上擺設酒宴為梅堯臣餞行。宴席間，晏殊盛讚古詩中全用平聲字寫成而又用字穩妥的詩句，例如漢代樂府古辭〈飲馬長城窟行〉的「枯桑知天風」一句，但他同時又因為未曾見到全用仄聲字寫成的詩句而感到遺憾。梅堯臣乘船離開後，作了一首五仄體的詩寄給晏殊，題目是〈舟中夜與家人飲〉，詩云：

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如果用粵語誦讀這首押十一隊韻的詩，就會發覺全篇四十個字都是仄聲，沒有例外。但是如果用普通話讀出來，全詩共有九個字屬平聲。在普通話中：

「出」字是陰平聲，

「別」字是陽平聲，
「獨」字是陽平聲，
「頗」字是陰平聲，
「俗」字是陽平聲，
「席」字是陽平聲，
「暝」字是陽平聲，
「稍」字是陰平聲，
「燭」字是陽平聲。

這九個陰平聲和陽平聲字，都不屬仄聲，所以只操普通話的人，可能無法理解為甚麼梅堯臣說這首詩全用仄聲字寫成。

唐代詩人陸龜蒙和皮日休曾經寫過多首互相唱和的四聲詩，以下迻錄皮日休其中一首題為〈苦雨中又作四聲詩寄魯望●平入聲〉的詩：

羈棲愁霖中，缺宅屋木惡。
荷傾還驚魚，竹滴復觸鶴。
閒僧千聲琴，宿客一笈藥。
悠然思夫君，忽憶蠟屐著。

這首詩每個字的普通話聲調如下（平[1]是代表陰平聲，平[2]是代表

陽平聲）：

平¹平¹平²平²平¹，平¹平²平¹去去。
平²平¹平²平¹平²，平²平¹去去去。
平²平¹平¹平¹平²，去去平¹平²去。
平¹平²平¹平¹平¹，平¹去去平¹平²。

我們除了看到此詩的單句全用平聲字，以及全詩只用平聲和去聲而不用上聲字外，實在看不到其他刻意安排的平仄四聲模式。但是如果我們用粵語誦讀此詩，就馬上發現一個隔句使用平聲字和入聲字的模式：

平平平平平，入入入入入。
平平平平平，入入入入入。
平平平平平，入入入入入。
平平平平平，入入入入入。

皮日休這首詩的題目註明「平入聲」，指的就是這種單句全用平聲字而雙句全用入聲字的特別安排。由於粵語語音系統近似中古語音系統，所以全詩四十個字的現代粵語聲調，與唐代皮日休所用的聲調，若合符節。用粵語誦讀此詩，很容易欣賞到詩人工巧獨特的藝術構思。

或者有人說，以上所舉兩首，都不是我們常見的古代詩歌，不能作準，但是如果我們用普通話誦讀常見的唐代近體詩，也會經常遇到不符合詩歌平仄格律的情況。例如王維的〈相思〉，是一首五言律絕，其平仄格式是：

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
□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
願君多採擷，此物最相思。
平平平□仄，仄仄仄平平。

詩句的字外加□表示該字可平可仄。我們用粵語誦讀，每個字的平仄都符合格式，但是如果用普通話來誦讀，此詩的平仄格式就會變成：

平仄平平平，平平平仄平。
仄平平仄平，仄仄仄平平。

這樣一來，全詩的平仄安排並不符合近體詩格律。第一句詩的最末三字都是平聲，即所謂「三平調」或「三平腳」，這種格式是古體詩一個重要標誌，卻是近體詩其中一個大忌。而且，每句詩的最末一字都是平聲，這種情況是不會在近體詩中出現的。

由此可見，古人那些嚴守平仄格律的近體詩，如果用普通話來

誦讀，可能都變得不合律。但是近體詩的平仄格律是詩歌發展過程中經過長期醞釀的結果，是詩人在創作實踐中根據藝術上的需要而逐漸總結出來的，它講究字聲的平仄交互相錯，使句子唸起來時產生抑揚頓挫、高低起伏的節奏美及和諧美。正如暨南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朱承平所說：「唐宋詩詞的極大魅力，是與它那嚴謹不苟而又富於變化的格律形式分不開的。」①如果我們因為語言的語音系統問題，在誦讀講究平仄格律的近體詩時，不能準確表達這種我國詩詞獨有的音樂美感，是十分可惜的。南開大學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長葉嘉瑩教授，在她的講座中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我們讀古人的詩詞，一定要按古人的平仄來讀，如果按照普通話的平仄來讀，就把詩詞原來的音樂美感完全破壞了。

用普通話唸近體詩給人不合律的感覺，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普通話聲調中沒有入聲。古代四聲是平、上、去、入，普通話四聲則是陰平、陽平、上、去。古代的入聲字在語音演變的過程中都已歸入普通話的陰平、陽平、上聲和去聲，而粵語和一些其他方言則保留了入聲，所以用粵語誦讀古代詩詞，更容易領略它們的韻味。下面我們以柳宗元的押入聲韻的〈江雪〉為例，簡單解釋用粵語誦讀勝過用普通話的原因：

千山鳥飛絕，萬逕人蹤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古典文學研究家兼詞人龍榆生在《詞曲概論》裏說：「入聲短促，沒有含蓄的餘地，所以宜於表達激越峭拔的思想感情。」② 入聲韻短促急收，不能延長，並以塞音韻尾「p」、「t」或「k」作結，使音節聽起來有一種頓挫感。柳宗元這首五絕，應該是他貶官永州之後所寫的，「絕」、「滅」、「雪」三個韻腳都屬於詩韻中入聲的「九屑」韻，是以「t」收尾的入聲字，一發即收，戛然而止，恰好表達作者那種孤獨無伴、悲憤抑鬱的心態。粵語保留了古代的入聲，因此用粵語唸此詩，仍然可以體味作者當時的心情。普通話的聲調沒有入聲，在普通話裏，「絕」唸「jué」，是平聲字，「滅」唸「miè」，是去聲字，「雪」唸「xuě」，是上聲字。三個韻腳的聲調全不相同，也沒有以塞音韻尾作結，無法顯示入聲那種急促壓抑的感覺。因此用普通話誦讀此詩，或者很難完全理解作者那種強烈的情緒。

如果讀者覺得上述解說過於抽象，難以理解，那麼只要用粵語

① 朱承平：《詩詞格律教程》（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頁。

② 龍榆生：《詞曲概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〇年），第一七三頁。

和普通話分別誦讀李白〈宣城見杜鵑花〉，就會較容易明白入聲在一些古代詩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蜀國曾聞子規鳥，宣城還見杜鵑花。
一叫一回腸一斷，三春三月憶三巴。

「一叫一回腸一斷」一句，如果用粵語誦讀出來，就不難令人產生子規鳥一聲一聲地叫、聞者柔腸一寸一寸地斷的感覺。「一」字在七字句中用了三次，在音韻上產生了強烈的回蕩反復，而且「一」字是收「t」尾的入聲字，唸起來短促急收，形成短暫的停頓，這些短暫的停頓，使這句詩給人一種斷斷續續的感覺，活靈活現地刻畫出子規鳥叫一聲令人腸斷一次的情景。不過因為普通話的「一」字唸平聲，聲音可以拖長，所以如果用普通話誦讀這句詩，就不會出現那種時而中斷、時而繼續的效果。

用普通話誦讀古代詩歌，除了因為不合平仄規律而減弱了近體詩聲調的鏗鏘悅耳外，有時還由於無法滿足押韻這種詩歌藝術最基本要求而破壞了聲音回環往復的音樂美感。例如，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

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
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此詩的「親」和「人」兩個韻腳，在古代韻書裏都屬於上平聲「十一真」韻。「親」的粵語拼音是「tsan1」，「人」是「jan4」，兩字的韻母都是「an」，完全相同，所以用粵語誦讀此詩，就同唐代的人用當時的語音誦讀一樣，絕對押韻。可是「親」的漢語拼音是「qīn」，「人」是「rén」，韻腹並不相同，所以用普通話誦讀此詩，並不押韻。

又如杜甫的〈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
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此詩的四個韻腳是「樓」、「浮」、「舟」、「流」，在古代韻書裏都屬於下平聲「十一尤」韻。「樓」的粵語拼音是「lau4」，「浮」是「fau4」，「舟」是「dzau1」，「流」是「lau4」，四個字的韻母都是「au」，因而用粵語誦讀此詩，是絕對押韻的。然而，「樓」的漢語拼音是「lóu」，「浮」是「fú」，「舟」是「zhōu」，「流」是「liú」。用普通話誦讀此詩，只有「樓」字與「舟」字押韻，「浮」字和「流」字則不押韻，無法滿足詩歌押韻的基本要求。

粵語不但適宜於吟詠古代詩詞，而且也適宜於誦讀押韻的古代散文。下面我們以漢末文人王粲的〈登樓賦〉為例，簡略說明。〈登樓賦〉全文分三大段，雙句押韻。第一段十四句，用平聲「尤」韻；第二段十八句，用平聲「侵」韻；第三段二十句，用入聲「職」韻。

第一段首先點出「銷憂」這個登樓目的，接着寫登樓「四望」所見美景，繼而指出作者之「憂」是源於對故土的思念。第二段集中寫思歸不得的憂愁心情，並說明思歸是人之常情。第三段寫懷才不遇、壯志未酬的悲憤與怨恨，作者想藉登樓銷憂卻達不到目的，反而感到更加悲傷憤慨。作者在這一段所表現的情緒比前二段強烈得多，而景色描寫也由前面富饒壯美的「華實蔽野，黍稷盈疇」，一變而為蕭條荒涼的「風蕭瑟」、「天慘慘」、白日西匿和獸奔鳥飛。文章第一、二段用平聲韻，到了第三段則改用入聲韻，恰如其份地表達了作者的內心，從懷鄉思歸的憂愁發展到壯志未酬的悲憤過程。入聲「職」韻以塞音「k」收尾，語音短促急收，形成一種壓迫頓挫的感覺，最足以表達作者內心悲憤煩亂、焦急迫切的激越之情。下面迻錄〈登樓賦〉第三段：

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
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
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
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慘而無色。
獸狂顧以求群兮，鳥相鳴而舉翼。
原野闃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心悽愴以感發兮，意忉怛而慘惻。
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
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這段賦文的韻腳是「極」、「力」、「食」、「匿」、「色」、「翼」、「息」、「惻」、「臆」和「側」等十個入聲字。

在普通話裏：

「極」字是陽平聲，
「力」字是去聲，
「食」字是陽平聲，
「匿」字是去聲，
「色」字是去聲，
「翼」字是去聲，

「息」字是陰平聲，
「惻」字是去聲，
「臆」字是去聲，
「側」字是去聲。

這些漢末的入聲字，在普通話裏變為不同聲調的字，誦讀起來，音韻不太協調，而且普通話聲調裏沒有入聲，所以只操普通話的讀者，可能無法理解作者如何巧妙地利用韻腳聲調的轉變來增強作品的藝術感染力。在粵語語音系統裏，這段賦文的十個韻腳都是入聲，正好與漢末聲調相同。

我們欣賞古代韻文，僅僅理解詞句的意思是不足夠的，還應該通過誦讀去體會作品的音律美，畢竟韻文是富有音樂美感的語言藝術。語言在漫長的演化過程中，語音發生了不少變化，因此我們用現代普通話語音去誦讀古代韻文，往往出現聲韻不諧和的現象。我們誦讀古代韻文，最理想的方法，就是用古代語音來讀，可是這種做法目前無法實現，因為古音構擬工作還有很多重大問題尚未解決。雖然早前復旦大學學者嚴實在網絡上推出了《唐詩三百首》中古漢語朗誦版，但是這個朗誦版擬音的準確性，並未得到學術界普遍承認。幸好千百年來，粵語一直都是在一個相當固定的地域、相

對封閉的環境內使用，「粵語的詞匯中保存了大量古漢語的語詞」，③而且語音的變化，非常緩慢。清代著名經學家和音韻學家陳澧曾經指出，廣州方音最接近隋唐時期中原人的語音：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

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④

因此，如果我們想原汁原味欣賞古代韻文，最好還是用粵語來誦讀。

③ 侯精一：《現代漢語方言概論》（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八八頁。

④ 陳澧：《東塾集》（清光緒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卷一，第二十七至二十九頁。

推粵推普：打通任督二脈

黃仲鳴（香港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廈門大學有位教授名易中天者，藉登央視「百家講壇」、大講《品三國》而聲名暴響；在此之前，他寫了一部《讀城記》的書。「讀」和「品」，都是他的「專長」。可是他「讀」的廣州城，卻令我大為反感。

易中天的大中原心態

他說：「廣州話聽不懂，廣州字也看不懂。」跟着慨嘆：「我還在中國嗎？」於是認為廣州是個「怪異的城市」、「化外之地」。他所列舉的不懂辭彙，有不少是內地改革開放後，由香港北傳上去的。易教授來到香港，必定更加「看」不起香港，指為「蠻夷之地」。

這是「大中原心態」，非常不要得。此間有很多外省人，大半世居於香港，迄是不學粵語，不講粵語，認為廣府話是「蠻子語

言」；其實，不僅香港，廣州有不少移民客，吃的是廣州的飯，飲的是廣州的水，內心卻是「煲冬瓜」。假如這些人一旦做了領導，怎會尊重廣州話和廣州文化！

易中天這類人比比皆是。廣州一位政協「建議」在亞運期間，廣州電視台要用普通話，這塊石頭頓激起千層浪，撩起廣州人「快閃」集會，抗議聲不絕。可憐的抗議頭頭，還要戴着面具，怕秋後算帳。在那種政治氛圍裏，表達訴求也心驚膽顫。

向非粵語地區的滲透

幾年前書展，廣州新世紀出版社來港搞了個座談會：「看粵語如何影響中國這三十年」，我忝為講者之一。題目雖是「影響」，但骨子裏，卻是要捍衞廣州日漸衰頹的粵語。來自廣州的主持人饒原生明確對我說，他已感到粵語在廣州已「衰吃」，學生由幼稚園開始，即接受普通話教育，回到家裏，年輕爸媽也講普通話，粵語如何能傳承下去？一代傳一代，不用百年，粵語就如滿洲話一樣，識者寥寥可數了。

粵語確有威水的時候，改革大門一開，香港挾着經濟強勢，語言文化攻陷了內地，不少本地辭彙成了內地人的口語，最後更被收

進詞典裏，二〇〇五年出版的、最新的《現代漢語詞典》，一口氣收了「打的」（「搭」的音轉），「埋單」、「炒更」、「養眼」、「生猛」、「搞笑」等上百個港式粵語。國家在「規範語境」下，居然持開放態度，願意接納這批粵語，實是出人意表。

一九九四年，中國社科院有個粵語調查研究，提到香港粵語對內地辭彙的影響，其中有個統計，政治用語是香港辭彙的有四十三條，經濟七十條，商業七十條，科技四十四條，教育十二條，交通二十條，日常食用品四十一條，文化娛樂四十六條，婚戀與家庭問題十八條，性事十九條，稱呼七十一條，現代意識七十五條。這個數字，在在證明粵語的威力！但隨着各地都市冒起來後，粵港經濟再沒有雷轟電閃的聲勢，生龍活虎的詞彙被「大中原」的吸星大法吸盡後，所以要「打壓」了？一個地方有一個地方的文化，文化是根，文化是寶，老廣州已漸去，已漸「複製」成所有現代化都市的同一臉孔，這還是記憶中的廣州嗎？保留粵語、保衞粵語，正是保衞粵文化的一條根。

有很多易中天同志，他們不去細讀、甚至讀破一個城市，只是走馬看花，誣指粵語是粗俗文化，那些粗口、那些怪字如「嘅」、「咩」、「咁」、「冇」、「啲」嚇窒了他們。其實，粵語保留了大量的

古漢語、中原漢語，比普通話來得更「雅」。例如「相與」一詞，便常掛在粵人口上，「好相與」、「唔好相與」、「難相與」等等，這「相與」是相當有古風的，見《易傳》：「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又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又如「得閒」，出自《楚辭》：「怨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得閒」變了現代漢語，即是「有空」；諸如此類，舉之不盡。誰敢說粵語是粗俗？

還有「飲茶」、「尚未」、「請勿」這些古雅辭彙，一到了普通話人口中，成了「喝茶」、「還沒有」、「請不要」，試問：是不是粵語更為雅馴？

大師的「們毒」

現代漢語中，不少「規範」是豈有此理的，如「們」，連一些大文學家、大歷史家都濫用個不停，簡直到了不通的地步。且看唐德剛的《梅蘭花傳稿》：

一、你可看到那些老人們昏花的眼角內湧出絲絲的熱淚。

二、他更是這批老人家們的心頭肉、掌上珠。

三、觀眾們這時更買來了花。

「那些」、「這批」已經是眾數，而「觀眾」根本就是眾數，何須

再來畫蛇添足一個「們」字？「們」是複量助詞，本放在人稱代詞之後，一些帶有表示單數和複數的名詞，也「們」個不休，如魯迅的《夜頌》，便有「夫婦們」；吳組湘的《差船》，便有「市民們」。這種「們毒」，粵語可有嗎？

普通話脫離文言已久，「我手寫我口」的結果，詞句都顯得很累贅，「們」是一例，還有「的」，彷彿沒有「的」，便不合規範，余光中慨嘆：「的的不休，便成喋喋不休了。」陳雲說，「請小心月台空隙」，到了規範漢語，便成「請小心月台的空隙」，真的無「的」不成文。又如我所住的鄉村，常見「內有惡犬，不得擅進」的牌子，如改成現代漢語：「裏面有惡狗，不得胡亂闖進去」。可見粵語無論在口頭上，書面上都是十分十分「雅」的。保留中華文化，粵語功不可沒。

梁啟超的窘態

八十多年前，香港有個作家羅澧銘（塘西舊侶），在文言白話之爭上，說過：「白話之短處，在乎不用文言；文言之長處，又在乎能用白話。」粵語的長處一樣，擅於吸收變化，不排外，不斷求新求變，適應時代需求，於是有了一個時代的粵語。潮

語不斷應時適勢而生。但基本上，它的底子甚厚，有中華道統，有古漢語的風範。反之，普通話縛得太死，規範得太嚴，以致窒息了生機，失去靈活。至今我還想不通，廣州話的「論盡」，普通話怎說？怎譯？粵語雖然「局處一隅」，難與「大中原」的普通話對抗，但如強硬推普而廢粵，那真是中國文化的悲哀。

粵語這個「穴」，決不能給點中而廢了武功。在歷史巨輪下，粵語區的同胞，保衞粵語的同時，也應熟習普通話。推粵推普，打通任督二脈，為個人裝備更上層樓。否則淪落到梁啟超的地步，那就大出洋相了。據說，梁啟超獲光緒召見時，一口拗口難懂的廣東白話，光緒聽得雲裏霧裏。梁啟超急得抓耳撓腮，愈急愈亂，愈難表白。最後，光緒起身揮手而去，只賞了他一個小小的六品官銜。

話說回頭，易中天在「讀」了廣州後，忽然覺得自己是「蜀犬吠日」，於是有《大話方言》一書，為自己補鑊。他說：「粵語也是漢語」，「粵語的源頭比閩語還久遠」。又說：「粵語有一套完整的文白讀音系統，可以很自然地和普通話對換，所以，和閩語相比，它還是更現代的漢語。」他還說，粵語是「拿來主義」。不錯，正如上文所說，粵語的包容，確比普通話強得多。

粵語在廣州，在強制教育下，勢難成母語，慶幸還有香港。

講廣東話・粵語書寫・用粵語學

鄭政恆（影評人、樂評人、書評人）

中港之間的矛盾，不單單在尖沙嘴。兩地的衝突，早已釀成文化戰爭，長長的戰線不單在深圳河或者廣東道，而是在日常的每一個空間，在生活裏、在商店裏、在車廂裏（等多班車！）、在學校裏（不論是大中小學），連騰訊網都刊登出〈大陸人的「恩主心態」從何來〉的反思文章（可惜網頁版把文章刪除），看來只有香港特區的官僚仲唔知發生咩事。

教育界自吳克儉上台後即刻多事，教書先生格外留神。強推國民教育科引起多方反對，至於用普通話教中文科，課程發展議會和語常會自回歸以後，已蠢蠢欲動——從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文運動的反殖，到董建華時代母語教學的解殖，今時今日忽然以「普教中」再殖，令人心寒。今天「普教中」，隨時明天普通話教中史、普通話教數學、普通話教英文外的所有學科，甚至像國民黨在台灣的白色恐怖統治，說母語會被他人告發。

早前教育局網頁諸多奇怪變更（廣東話被定性為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刪去普教中令學生「甚或表現更差」的研究發現），立時引來各方人馬和老師對「普教中」同聲討伐。

不如看看書。李婉薇的《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一書，資料翔實，涉獵面廣，筆者已在幾年前看過，如今值得再拿出一讀。

廣東人與廣東話

從國家統治者的角度看，國家的政策當然是方便統治，因此移民實邊，殖民管治，統一語言，打壓少數民族，削平文化差異，以單一意識形態和語言建構身份共同體，勢在必行。

廣東一帶，地處邊陲，遠離國家權力中心，對外來思想文化又早佔先機，而邊緣文化又充滿活力，時時挑戰故步自封的中央——太平天國首領洪秀全和洪仁玕、主力變法維新的康有為與梁啟超、提倡用革命推翻滿清的孫中山先生及楊衢雲，都是廣東人士，而且大多跟香港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由此看來，廣東的思想文化，實在不拘一格。

廣東話合於中古漢語，又具有吸收外來語的活力，絕大部份香港人都用廣東話溝通，但講到粵語書寫的源流與發展，卻未必十

分清楚。《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指出，自從明末，廣東民間已流行唱木魚書，而且有印刷品如《花箋記》出版，其後清道光年間的《粵謳》刻印，形成了粵語書寫的傳統。

傳教士也幫了粵語書寫一把。他們因着傳揚基督福音的熱誠，學習中文和官話，甚至以粵語寫作，以便接觸廣東一帶的普羅大眾。又因為要學習粵語，傳教士和廣東人編了字典和讀本，令粵語的字型和字音有個標準，甚至乎「十九世紀末，很多傳教士相信粵語不是方言（dialect），而是一種歷史悠久的語言（language）」，似乎這些洋教士相當尊重廣東話，真係識貨！（順便一提，上世紀二十年代的港督金文泰通曉粵語，英譯《粵謳》，時至今日，美國駐港總領事夏千福識得廣東話，反而未見中聯辦主任講過……）

陳子褒的粵語教科書

《清末民初的粵語書寫》共有五章，分別牽涉五種粵語書寫作品：

第一是以清末革命派報刊為主要平台的粵語寫作群體，鄭貫公和黃世仲是當時的兩個代表報人，可互參楊國雄的《香港戰前報業》一書。

第二是廖恩燾（即廖鳳舒、珠海夢餘生、懺綺龕主人）的粵謳及粵語格律詩。天地圖書在幾年前就重印《新粵謳解心》，除了收錄佳作和梁羽生序文外，更配有高寶女士插圖。

第三是粵劇，以梁啟超的《班定遠平西域》為代表。

第四是《俗話傾談》和《天路歷程》兩部粵語小說，其中日人魚返善雄校點的《廣東語小說集（俗語傾談）》一書，校點者在序言中稱許廣東話「實在係語言學上具有偉大嘅價值」。而循道會傳教士俾士（George Piercy）翻譯的《天路歷程土話》，刻印於同治十年，受到廣州的讀者歡迎。

最後是粵語教科書，本文以下就集中談談這一方面。

時維晚清，陳子褒（即陳榮袞）乃康有為在萬木草堂的學生，戊戌政變後流亡日本時，考察了日人的小學教育。回到中國後，他在澳門和香港興學辦教，一生編著課本讀物四十多種，他更成為基督徒，在香港創設學塾、女校、工讀義學，作育英才，最後在香港離世。李婉薇在書中指出陳子褒教育思想的兩根支柱，「一是他非常強調婦孺作為基層國民的重要性，二是他非常清楚母語在兒童教育方面的價值。」

陳子褒為晚清時人，學習文言古語是中文教育的重心（如今同

樣重要），他理解學生用粵語學習古文難度最小，而粵語和古語接近，正音（官話）和古語差異更大，所以「古語粵語，串成尚易。若古語、粵語、正音三者合為之，難之又難，故歌語惟以粵語古語為準。」（《幼雅》例言）

《幼雅》（一八九七）仿《爾雅》、《廣雅》，為釋字辭書，其後陳子褒編《婦孺釋詞》（一九〇二），則仿《經傳釋詞》，他自敘中說此書「以粗俚之方言，解微妙之語氣」。《婦孺釋詞》使講廣東話的孩子掌握古文虛字詞義，身在港澳的孩子理應好好活用自身的優勢：「事實上，粵語的句末語氣詞和文言的虛字，頗能在語氣神韻相通相合，對學生理解文言虛字，應該很有幫助。」例如《婦孺釋詞》釋「而」字即粵語「但係也、又也、嚟也」，「矣」字即「咯也、嘢也」，「耳」字即「口遮也」。非常貼切，於今亦然。陳子褒的著述，對今時今日香港的中文教育，仍然有深刻意義。

廣東話教中文不能妥協

據說香港的高中中文科重設範文，只要選出適合的文言經典作品，不失為一件好事。畢竟人的思想進階，不能單靠閱讀現當代文學作品和日常報章，特別是香港的青少年學子，需要好的老師，老

師用廣東話教授經典，學生反思吸收，結合文本與生活，華夏的傳統正宗和哲學思想就永不衰微，社會就朝着正途走。

試想想一個人善用現代中文書寫，但思想已被人洗腦，寫出來的東西都是廢話；另一個人即使中文書寫平平，但不乏見解想法，寫出來的文章自有可觀之處。因此，重點在思想，而思想的育成精進，需要從古代經典出發（例如先秦諸子之書和歷代政論），沒有其他捷徑。

普教中對香港的中文教育和莘莘學子來說，只會是學習的災難，切割了古典世界和日常生活，人就無根，變得虛浮。為了下一代的民智民心，用廣東話教中文萬萬不能妥協。

二、教育：從母語教學到「普教中」

普教中，有甚麼可以學的？

陳雲（曾任港府民政局研究總監、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用普通話教中文，究竟在處理着甚麼的教學問題？要達到甚麼樣的語言教學效果？這些教學效果，真的可以用普通話教中文來達到嗎？這是好基本的政策思考。

普通話教中文的教學政策假設，是認為普通話與現代的中文白話文的言文距離較小，學好普通話，有助提高學生的寫作能力。來吧，我們看一下要教導學生寫甚麼樣的語文，是公事用的應用文，還是抒情寫意的文學寫作。在香港，當然是訓練學生寫公事中文為先，旁及散文、詩歌及小說之類的文藝創作。

粵語有助公事中文教學

公事中文用的甚麼風格？學普通話有幫助嗎？用一個希特拉也無法叫停的電視月費訂閱計劃做例子吧。你會這樣用北方口語，直接寫投訴信嗎：「我打了幾十次電話，也沒人接聽，你們公司是

幹甚麼的？我也用電郵寫了，想停了訂閱計劃，你們只是給我一個自動機器的電子回覆，到了這個月又扣我的錢。這信我是親自拿來你們辦公室的，你們這次不要再忽悠我了，信不信我就請律師告你們？」

普通話講到這種地步，神氣了，但這樣的話，能入文嗎？能用來寫信嗎？不能啊。這樣寫信，不得體，不像話。起碼你要這樣寫：「本人致電數十次查詢，貴公司無人接聽。於本年一月五日以電郵告知終止訂閱計劃，只收到自動電子回覆，然而本年二月銀行帳戶依然被扣除月費。為此，我親臨貴公司辦公室呈交信函，敦促貴公司慎重處理，不容有失，否則本人將訴諸法律。」寫出這樣的公函，跟學普通話有關係嗎？沒有關係。

口語與書寫，是兩個語言系統。口語有聲調輕重、語態緩急，文字卻無。上面的口語版本，字數很多，但用普通話念起來，甚麼、了、的、這個、這次、就，這些虛詞，念得輕快，不礙事，但寫下來，就礙眼。寫的時候，若是公文，就要將這些顯示精微情態的虛詞去掉，剩下語文的骨幹，盡量剩下實在的詞（實詞）。這些語文的骨幹是甚麼？是古文、文言文，至少是精煉的白話文。

寫好這些公文，來自閱讀和寫作，是書面語的一套訓練。如果

你真要跟口語拉上關係，講普通話的人，寫這些公文，反而比講粵語的人吃虧。原因是粵語的聲母、韻母和聲調遠比普通話要多，同音詞少，有助辨義，故此粵語仍用單詞，這些單詞也是文雅的書面語，例如粵語說頭，不叫腦袋，頭可以入公文，腦袋不可以。北方話講的眼睛、杯子、石頭、膀子，粵語口語只說眼、杯、石、臂，文書也寫眼、杯、石、臂，一如古文。粵語由於有很大成分來自中古漢語（唐朝時代），它的古語、成語的傳承，也遠比普通話要多。再退一步說，廣東口語雖然源自古遠，但畢竟時代變了，詞彙變了，你不能寫「我蒞」，這是周朝的用語，現在公文只能寫到、臨、來，客套就要寫「蒞臨」。這樣，粵語由於與現代的書面語有一段距離，粵語人寫文章格外注重修辭，可以寫出典雅莊重的公文來。

寫好白話文，要讀白話文學

抒情寫意的文學創作，是白話文了吧？懂普通話能佔優嗎？以下我舉兩個課堂例子，都是大學的文學創作班的同學練習作品。

（1a）我有一年暑假回鄉下，居住在姨婆家中。姨婆養了小雞，我便在旁觀看和學習。小雞除了吃米糧蔬菜之外，也吃水果。當然

不是真的給牠們水果吃，而是夏日炎炎，吃剩的西瓜皮拿來餵飼牠們。姨婆說，雞吃西瓜皮可以消暑以防止生病。

(2a)自小我就認為自己頗大膽的，天不怕地不怕，即使去郊外露營，晚上漆黑一片，我也不會害怕，有需要到村中士多購物，我也自告奮勇前往。

作品一是接受過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大陸學生，作品二是接受過用粵語教中文的香港學生。兩個作品的風格有分辨嗎？沒有。都是學院語文(school language)，不是生活語文。版本一原是要寫回鄉的生活散文，結果變成《養雞指南》之類的農學著作(「餵飼」、「防止生病」)。版本二原是要寫驚嚇小說，結果變了成語教學課本。讀的白話文學不夠，學生講甚麼口語，不論是廣東話、普通話，都會寫出這些官樣文章來。

用文學散文風格，如此改寫版本一：

(1b)有一年的暑假，我回鄉下，在姨婆家裏住着。姨婆養了小雞，我在旁觀看，也學着玩。小雞除了吃米屑、菜葉之外，也吃一點水果。當然，鄉下人不會給牠們水果吃的。炎炎夏日，我們吃剩的西瓜皮，就拿來給牠們吃。姨婆說，雞吃西瓜皮可以消暑，這就不會熱病了。

用文學小說風格，如此改寫版本二：

（2b）我自小沒給甚麼嚇着，膽子也算大的，即使在郊外露營，晚上漆黑一片，寒風吹得嗚嗚響，同伴要找人到村中士多買些宵夜食物、應急物品之類的，我也一口答應，說去就去。

改寫的版本，裏面的「給…吃」的語法結構、「學着」的「着」、「也算大的」的「的」、以至那些、這個、甚麼、讓我來的「讓」（動詞語綴），這些都不是源自漢語，而是來自阿爾泰語系的胡語（匈奴語、蒙古語之類），故此在東漢以前的古書沒有這些用法，在廣東話也沒有這些用法。然而，北方官話（國語、普通話的前身）吸收了這些外來語的因素而成為白話的虛詞，大大增強了白話文的抒情能力，也增強了白話文的音調和諧。

普通話的虛詞，有助白話小說寫作

粵語口語的「住」，文言文的「住」、「居住」，都不能表達「住着」那種委屈、臨時、隨便的複雜意思，而這些精微情緒（nuance），是明清小說、民國小說的市井文學之必須。膽子也算大的，那個「的」字，也必須加上去，形成委婉的意涵。否則就是真的膽子大，而不是自以為的膽子大。

看官，要命的地方在這兒了。那個「的」字，用普通話的明清漢音來念，是輕聲字，用粵語那種中古漢音來念，是實實在在的、發音刺耳的入聲字，在聲音上，虛詞變了實詞。「膽子也算大的」，那個「子」、「的」，都是半個拍子，「膽」、「算」是一個拍子，「也」字是一個半的拍子，合起來念，整句話就有了節拍（beat），也略帶旋律（melody）。用粵語來念，幾乎全是一個拍子，讀不出節奏感來。

這種白話文的語言感應，是不是從普通話來的呢？不是，是從《三言兩拍》、《紅樓夢》和張愛玲小說來的，從文學閱讀和創作來的。然而，目前香港教白話中文，卻不用文學來教，而是用報紙雜誌那些枯淡文章來教。

在香港，中文要教得好，明清以前的古典文學，用粵語來教；明清以後的白話文學，條件許可的話，用普通話來輔助着教。這種精細入微的中文教學，要甚麼時候才可以實現呢？

（原載於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明報》「世紀版」）

「普教中」教壞中文

陳雲

香港用普通話教中文，課文用漢語拉丁拼音注音，語彙用北方土話，語法用現代漢語。往日香港用的正楷漢字教學、粵語漢音教學及文雅詞彙教學的傳統，灰飛煙滅，保存王朝時代傳統中文教學的基地，從此消失。華夏的廣闊天下沉沒，新中國的狹隘共和國冒起。

傳統中文教學，以正楷漢字及書面語（文雅語言）為本，用何種漢語的語種（方言）來教學，甚至用越南話、朝鮮話的發音來教學，也不妨礙中文教學。中文成為東亞及南洋的天下通語，華夏文化流布亞洲，是因為傳統中文教學以字形和文言為本，不以當代語音和語法為本，根基在歷史傳統，而不在地域差異。

漢字文書首先是用來看的，其次才是用來讀的。漢字文書語言簡潔，句子要短，虛詞要少。中文教學依附於普通話之後，我手寫我口，普通話的聲韻偏偏又以輕清居多，虛詞尤其讀得輕，例如甚

麼、怎樣、可、不，都是輕讀，平日講慣了，寫文章如果不加刪削，就變得囉囉唆唆。寫愛情小說、電視劇本還可，寫實用文書、公務文章，卻變得虛文一大堆，不忍卒讀。粵語由於傳承隋唐古音，虛詞多是重讀的，例如可、何、怎、的，都是重濁或尖銳的音，聽來「梗耳」，故此廣東人寫公文，虛詞可免則免，文書變得簡潔通順。

在香港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最令人心寒的地方，是這套教學法排擠了廣東話的傳統中文詞彙和中文語法。普教中的課本，將廣東話的面善、一世、每日、人客、衫褲、晾衫等詞，稱為方言詞，而要改成：面熟、一輩子、每天、客人、衣服、曬晾衣服等詞。天可憐見！這些根本不是粵語的地域詞彙，不是所謂「方言詞」，這些其實是古老的中文詞彙，遠自唐宋，是「古今詞」。普通話教中文，就將粵語的古語淘汰，以今代古，劣幣驅逐良幣，斬斷了中文在各省各地的歷史養分輸送，令中文變成成於一九四九年的、貧乏的「現代漢語」。

普教中用北方的土語鄉談，取代文雅語彙。例如香港的普通話課本不許學生講番薯，要講地瓜，不許講薯仔，要講土豆，炸薯餅變成「炸土豆餅」。論歷史，閩粵一帶接通西洋，番薯是廣東引入

的，番薯比地瓜的名詞要早出，命名也比地瓜合理，番薯是薯類，不是瓜類！而最離譜的，是地瓜根本是華北的土話，並非見於文獻的雅言。番薯的雅言是「甘薯」，明朝《本草綱目》寫為「甘藷」。

我讀小學的時候，上世紀六十年代，老師教寫文章，不寫薯仔，寫馬鈴薯。我們香港人就有這種大氣度。當時，我們客家村莊叫薯仔做荷蘭薯！明末清初，很多南美洲的食物，都經過荷蘭人傳入廣東，故此有荷蘭薯（馬鈴薯、薯仔）、荷蘭豆（豌豆）之名。當時荷蘭人在台灣、南洋一帶有殖民地。

普教中的課本不服氣，不隨廣東人講「番薯」，沒所謂，可講「甘薯」，但這群北方人卻要迫香港學生講「地瓜」。古今南北匯聚的天下，變成華北獨大的中國。

（原載於二〇一四年三月三日《am730》「小歇版」《轉角》專欄）

教育官僚盲推「普教中」

陳雲

普教中違反語言教學效益，為何學術界、教育界（如教協）不大力反對？香港學童即使依靠普教中而獲得高強普通話能力，不見得有利於中港貿易或服務，投入巨額師資培養並締造人工語言環境，並不符合商界利益，為何商界不反對？中共在大陸推普，但它無意將香港的中文習慣變成大陸一樣，這是不利於中共的，這可以從中資機構（工會、國貨公司等）、中聯辦刻意使用正體字及古雅中文得見。

一般家長基於蒙昧，迷信普通話教中文可以增強中文寫作能力，而當小學或學前教育的普通話及漢語拼音班，是多元智能的一部分，與奧林匹克數、公文式、兒童讀經班、西班牙話等教育增值課程無異。由於教育局及語常會則供應大量資金推動普教中，很多家長只是被動享用公共服務的一群愚民。

香港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課，逐漸過渡到所有科目（英文科之

外）用普通話教學，與殖民地時代用英語教學，其目的同出一轍：挫折香港兒童的理性思維及感性表達，令其脫離本土環境，空出香港主體，接受境外的權威領導及知識灌輸，造就愚民，方便臣服。只是英國殖民者留有餘地，英文教學只是限於精英學校，也是限於術科，英文學校也刻意保存中文科及國史科，其餘學校則任由雙語夾雜或中文教學。殖民地的華人精英，在理性上崇尚英國，但感情卻保留王朝傳統的華夏文化，折衷中西，這正是殖民政府需要的管理人員。英國在香港推動寬鬆雙語教育，用意在此。

九七之初，董建華政府忽然推動「教育改革」，將寬鬆的雙語教學傳統轉為兩文三語，引入普通話這種不必要在政府語言政策言明的口語，隨後推出強制性的母語教學與英語教學的學校分流。之後，暗中用資助方式，推出小學及初中的普教中。

普教中將香港兒童的語言理性發展，從家庭及生活現實之中抽離，放在官僚控制的學校之內，其中衍生的教師培訓及證書取得，教育產業的繁衍，乃至兒童教育失效之後衍生的補救，全部令香港的教育人員得益，造就教育產業，於是教師明知政策戇居，也無意反抗。

兒童要學的是第一秩序（primary order）的自然真實世界，

面向天、地、人的世界，多變而靈動的世界，而不是二次秩序（secondary order）的程式操縱世界，可以預期和計算的死板世界，否則兒童長大了，對一切不是程式操縱的事物，一切在他們控制慾以外的事物，會感到焦慮、無奈、恐懼和暴躁。

普通話來自受到中共極權統治的華北，語彙備受惡劣政治污染，語法受到共黨中文干擾，用普通話教中文是用一種令本土兒童震懾的境外權威語言來教語文課，只會令兒童挫敗，或者付出無謂的努力來迎合，從而生出賤視本土語言的驕慢心。普教中的結果，不論是兒童可以克服障礙或遭受挫敗，都是教育的失敗，只是低級失敗（無法學習）與高級失敗（賤視本土）之別。

香港教育官僚刻意地、過分地媚共，中共無法抗拒，於是中下層的官僚及學界人員與港官結成非神聖同盟的關係。香港教育官僚用普教中來繁衍教育職位及產業，例如教師讀文憑、考中國國家普通話試、學校運用語常會的撥款來舉辦活動、補習班教兒童講普通話等，然而，官僚最要保有的權威，港官卻雙手奉予大陸。香港教育官僚乃英國殖民地留下之庸才，不識得掌握教育權威，只會盲從大陸的普教中標準，甚至矯枉過正。於是，教育權威（例如課程編審）旁落，教學職位流失到大陸，香港的教育官僚跳腳了。

粵語在歷史、語音、語彙及語法上，遠比普通話古老、複雜而多變，粵語是嶺南創新地區的語言，也是美加僑社的語言，是匯通中西的語言，放棄粵語教中文，是華夏文化的莫大損失，也是香港兒童智力培養的莫大損失。英國殖民政府撤離之後，香港應維持粵語教中文，先秦至明清文學，包括以文言為骨架的明清白話小說，都用粵語誦讀及粵語講解，但教授五四時代的新文學，可用普通話輔助誦讀，粵語講解，令香港學生掌握現代白話文的語調和語感，這就可以令到香港教師的普通話訓練不會白費。香港中小學教的普通話，用的語彙是通用白話、古雅文句，棄用北方土語，語音則可寬鬆，容許略帶廣東口音，毋須跟隨北京語音標準。如此，香港可有獨一無二的中文教學：古今兼備，南北匯通，兼且接通西洋。

普教中，是華夏正統之爭、香港本土之爭、文化權利（國際人權公約）之爭。不論你是堅持華夏文化、本土文化還是普世價值，都要反普教中，將錯誤的政策撥亂反正，將普通話安放在恰當的教學位置，令香港的中文教育返回中道，締造香港的華夏文化領導地位，培養具備優秀語文能力的下一代。

（原載於二〇一四年四月七及十四日《am730》「轉角」專欄，刊登之後合併）

四論普教中

陳路易（教師）

一、我教普通話，但我反對普教中

本土意識抬頭，無論在經濟方面、政治方面、文化方面都提出了要捍衛自己天賦應有的權利。在語言文字方面，教育局早前竟敢違反《基本法》一國兩制，寫道廣東話非香港官方語言，這種行徑，令香港人感到香港政府為討好中共政權，欲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之心更熾熱。

對於廣東話之由來、演變等等，早在筆者寫此文前已有各位鴻儒如陳雲博士、羅康寧、王亭之等等闡述過，亦從有政治、民生、文化等方面指出普教中之影響。其內容之詳盡細緻，筆者無意重複再述。

筆者是一名任教普通話的教師，但反對在香港以普通話作為中文教學的語言，故只以教育界前線教師身份，尤其以任教普通話教師之身份，指出筆者反對之因由而不作他述。

普通話在香港這以說廣東話為主的地方是一種外來的語言。這是無可爭辯的事實。

學習中國語文最重要的是識字識詞，學習行文技巧，理解文章內容主旨，進而感受作者之意，明白作者深意，擇善而從之。要容易閱讀，理解文章，那有捨棄自己慣用語言而用一種外來語言去學習的道理？捨近求遠，有習慣的、易用的語言不用，反而用須要重新學習的外語去理解文章內容？這就如叫學生使用日語學習中文一樣荒謬。

有一說法，說教育界的學生出現了語文能力下降的情況。行文不暢，錯漏字連篇，全因口語與手寫白話文不一致的緣故，故此以「我手寫我口」的普通話教中文有助提升學生中文能力水平。但清朝末年詩人黃遵憲是因為受到國際局勢、西學傳入的影響，才提出「我手寫我口」的。而五四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如胡適、陳獨秀等人倡導的新文化運動，除了標榜科學與民主外，因鑑於文言文有礙於表情達意，積極提倡以近口語的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亦強調「我手寫我口」，並競相出版刊物，如《新青年》等，令白話文流行全國，全面取代文言文的地位。故此「我手寫我口」是針對文言文而來，為的是文言文不易明白理解，決不是由於使用語言與文本不同引致

語文水平低落而來，以此作為理由而強推普通話教中文，以便更容易理解明白中國語文文本內容是完全錯誤的理據。

又有一說，說以普通話教中文可使學生寫作書面語能力提升。這又是錯誤理解。

事實上，普通話並不等同書面語，其中最明顯的就在普通話中的「一不變調」、「兒化韻」、「北京方言詞語」三方面。

「一」在普通話中原調為第一聲 yī，但在其後的字為第一、二、三聲聲調時，則變調為第四聲，遇第四聲時變為第二聲，這種音調之轉變造成一字多音卻無法在寫作上表現出不同之處，因為「一」的意思沒有轉變。其次，當「一」要連讀時要變為「yāo」，「一一一」叫「yāo yāo yāo」以分隔各個一字，這「一」字意思亦無改變，而在寫作時也是表達不出來。

「三聲變調」亦復如是，「展覽館」讀「zhǎn lǎn guǎn」，但說出來卻是「zhán lán guǎn」，「紙老虎」本讀「zhǐ lǎo hǔ」，在口語表達卻是「zhí láo hǔ」，這只是北京方言習慣，但普通話就是以此作基本標準。

香港人普遍是以一音一字一詞一義為寫作基礎，那些口語的變調不但不能提升寫作水平，更容易使本身習慣說粵語的小朋友混淆。

「兒化韻」更是普通話中常說，但在寫作書面語時，不到特定用語是不會用的詞語，例如普通話說「起風兒了」，寫在文章上很少連兒字也寫出來，又如普通話口語說「好玩兒的玩意兒」，但在文本中只會寫成「好玩的玩意」。而且有些詞語，有兒沒兒往往變為另一種意思，例如「早點」是早餐，「早點兒」是提早；「捎信」是指帶一封信，「捎信兒」是帶消息；「一點」是名詞指時間，「一點兒」是量詞指少量少許，以上數例都表明了書面語言上是不宜用兒化韻。

另外，標準普通話中有很多與香港人習慣說的詞語在詞素轉換、詞語意義上有很大的分別，如強以普教中，不但令教學者施教困難，更令學生無所適從。如「返工」，粵普具有此詞，粵語是指上班，但普通話中卻是產品出現問題要重新加工的意思；「醒目」，粵語指聰明伶俐，但普通話卻指形象鮮明，教人一眼就看見；「發達」，粵語指發財，普通話只應用在工農商科技國防等領域水平甚高的國家或地方；而當說「要飯」，粵語指的是要添飯，普通話卻是忌諱，指的是乞丐；「班房」，粵語指的是課室，但普通話卻指牢房。其實這裏只列舉了五個較常用的例子，還有很多很多詞同義異的詞語，諸如「禿子」、「過節」、「小氣」、「密實」、「得意」、「人

工」、「熱氣」……真是不勝枚舉。

語文是須要理解的，在香港這個習慣以廣東話溝通、閱讀、理解的地區，卻欲以須要翻譯的語言來教中文，這種捨本逐末的政策是有益於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小朋友嗎？我持相反意見。

當然，還有輕聲，只舉一例，普通話中，「舌頭」的頭是輕聲，「蛇頭」的頭是第二聲，在漢語拼音中，除輕聲外，餘皆相同，也就是說「蛇」「舌」同聲母韻母聲調，都是「shé」，「頭」分別只有輕不輕聲而已。香港小朋友能在這種難以分辨的微小差異來提升他們中國語文水平嗎？我確信是不能的。

普通話在香港是須要特別學習的外來語言，並非教育官員或無知家長想當然地以為將廣東話說歪一點就是。

普教中的施行只是某些教育局官員或學者想當然可行，以為很容易的事。教局以北望神州，大勢所趨，施行了再檢討，甚至利誘添資源，最後現在說在十數年內全部中小學都要遵行普教中政策，這全是沒經正式諮詢下強行要學校執行的命令。學校則因各類理由如不能得失教局、不實行最後也得實行、可獲多些資源等等便參加普教中行列，把普教中當作提升中文水平的利刃。誰不知此舉在北京行得通，在天津行得通，在四川行得通，但在以廣東話為母語，

普通話為外語的地方就不通行，而強迫推行唯一結果就是廣東話滅絕。從幼兒開始只說普通話，那在耳濡目染下，普通話就會成了香港的第一語言，但這是香港人樂見的事嗎？

雖然筆者是一名任教普通話的教師，但對這種沒道理，捨近求遠，逐末棄本，只靠想當然又不肯作公平測試，巧言令色又不願作調查諮詢的普教中政策是絕對反對的。

重申，普通話在香港是外來語言，其地位該與各地語文相同，如日語，德語，英語，韓語等等。普教中，筆者雖為普通話教師但斷言拒絕。

二、「普教中」這念頭從甚麼時候開始？

一九八一年四月，當時的香港政府應「經濟合作發展組織」的建議，宣佈委任呂衞倫為一個國際顧問團的主席，負責全盤檢討香港的教育制度。

國際顧問團在一九八二年十一月正式發表外界稱之為《呂衞倫報告書》的《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對香港的整體教育政策、考試制度、高等教育、中小學、幼稚園、持續教育、特殊教育、教師組織和人力需求等各方面均作出分析和提出意見。

其中，報告書認為「在其他因素沒有分別的情況下，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並建議香港推動雙語政策，具體方法是讓小學完全採用母語（即廣東話）教學，至中一開始逐步採用兩種語言的課程，最後達至中三一半課程以中文教授、另一半則以英文教授。

後來，教統會分別於一九八四、一九八六、一九九〇及一九九六年發表的第一、二、四及六號報告書中，都建議政府積極推動母語教學。教統會更在第六號報告書中，敦促政府加大力度，具體地公佈個別學校應採用的教學語言，並清楚說明如何執行有關政策。自此，推動母語教育成為港府在教育政策方面的一大方針。

一九九七年九月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全文並無述及本港學校須用普通話教中文。

而同一時間，即同為一九九七年九月，教局反而發表《中學教學語言指引》鼓勵母語教學，並於一九九八年開始落實執行。

至一九九九年十月「課程發展議會」發表《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於「學校課程改變，學習範疇芻議」中提出長遠考慮：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

然而奇怪的是，在二〇〇〇年「教育改革」開始。「教育統籌委

員會」在第一次提出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全文中卻並無一詞提及教學語言須改革為普通話，就連普通話一詞也並未提及。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隨後在二〇〇一年施政報告表示「推廣兩文三語，是我們的既定政策」。

翌年，在《教育改革進展匯報會二〇〇二》中只提及語常會在檢討本港語文教育的同時，一併研究應否為教學語言政策訂定長遠策略。並沒提及須將中國語文教學語言全盤改為普通話。

其後，《教育改革進展匯報會二〇〇三》時則表明語常會支持採用學生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同時指出語常會認為，現階段不宜為全面轉用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教學語言訂定明確的政策和時間表。語常會建議進一步研究學校成功轉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所須具備的條件，亦鼓勵認為本身具備足夠條件的學校嘗試採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然而有關的中文科教師必須符合普通話教師口試及課堂語言運用的語文能力要求。

而在《教育改革進展匯報會二〇〇四》當中亦只是建議「制定一套可適用於本地學生和在職人士共同參照的普通話能力等級架構，並極力爭取與國家語言及文字工作委員會所訂之國家測試的水平等級接軌。制定架構及相關考試的工作預計於二〇〇七年底前完

成，以讓自一九九八年開始在學校學習普通話，並於該年完成中三普通話課程的學生（或其他人士）作參照及報考相關考試」而已。

其後教統會更於二〇〇五年發表《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在第一章引言1.7寫出「亦有人認為香港既然是中國的一部分，所謂『母語』應該是普通話。我們認為『母語』是學生和教師最能自然流暢地表達意見及思考的日常用語。對香港大部分人而言，他們最有效與人溝通和表達意見的口語是廣州話，書面語是中文。」

在二〇〇六年，第二任行政長官曾蔭權的施政報告中重申「必須提高市民兩文三語的能力」。

但弔詭的是在兩年後《教育改革進展匯報會二〇〇六》中卻報告「為提升中國語文科教師的普通話能力，語常會資助在職中國語文科教師於暑期前往內地，修讀為期四星期的普通話沉浸課程。截至二〇〇六年底，已有約一千一百名教師獲得資助，資助金額合共超過七百一十萬元。」同時又指出「語常會於二〇〇七年完成就學校成功轉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條件的研究，並推行措施，支援有意作出這項轉變的學校。」

語常會其後於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日宣佈，撥款港幣兩億元，

從二〇〇八年九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四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以呼應「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的建議。

二〇〇八年一月港九街坊婦女會孫方中書院、景嶺書院、香港拼音優化教學促進會、香港普通話研習社、香港普通話研習社科技創意小學、香港普通話專業學會、香港中國語文學會共七間機構建議教局於十年內全面起動用普通話教中文，並於二十五年內全面落實用普通話教中文，幸好此建議未被完全接納。

教局至今仍沒有正式頒佈相關的政策文件，而是以校本自決是否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但在教局校本語言服務大力支援，各大辦學團體又習慣順應教局意思，有些學校想到現在不做將來也得要做的情勢下，很多學校在這幾年間已轉為普教中了。

由上述歷史看，以普通話教中國語文很明顯是中國接收香港後才訂下來的政策，在本來的香港教育制度中是不存在的。

而且普教中在教育改革文件中本亦是一項「芻議」而已，亦即不成熟，可行可不行的建議，甚至直到二〇〇六年之前，教統局仍是主張以廣東話教學，只是對某些有特殊須要的學校以普通話教學持不反對態度。

但在二〇〇七年後普通話教中文竟由芻議變為非如此不可，視

之為當然的默認政策，甚至被奉為金科玉律。現教局更堂而皇之於二〇一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在官方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中指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其欲為普通話定獨尊之心路人皆見，幸得「港語學」發現才急急刪除。

然而此事已引起香港市民的警覺，並發覺全面普教中之勢如箭在弦，故群起捍衞。教局亦暗地裏以認為部份內容有更新需要而刪去其網頁中的「問與答」一欄中：「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一頁。

由此可見，香港市民如有心保衞粵語，肯不平則鳴，以眾人之力確可望挽狂瀾。

至於「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下文分解。

三、語文政策自相矛盾：普教中之陽謀

根據《幫助內地來港學童學習中文教學指引／建議》（一九九六）指明香港是一個以廣東話為教學語言的環境，「內地來港學生盡快

掌握本港日常應用的詞匯」，「從而加強他們運用廣東話與人溝通能力，另一方面，也幫助他們認識和書寫繁體字，以提高學習能力。」

及至《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三）》（二〇〇二）的概論：「（2）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在基礎教育階段，學生已從日常生活中積累一定的語匯和語言經驗，語文學習必須在這基礎上發展。」

到《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二〇〇四）的「基本理念及發展方向」亦表明：「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他們自小已從日常生活的語言環境中，積累一定的語匯和語言經驗。」而中國語文「作為學習母語的科目」，「重視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並發揮全人教育的功能。在基礎教育階段，語文學習必須從學生已積累的語文知識和已掌握的語文能力入手。」

而教統會隨後在二〇〇五年十二月發表的《檢討中學教學語言及中一派位機制報告》引言中強調「亦有人認為香港既然是中國的一部分，所謂『母語』應該是普通話。我們認為『母語』是學生和教師最能自然流暢地表達意見及思考的日常用語。對香港大部分人而言，他們最有效與人溝通和表達意見的口語是廣州話，書面語是中文」。

而較新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初中及高中）》二〇一一第二章

「課程取向」中亦明確表示「中文是香港大多數學生的母語。學生已從日常生活中積累一定的語匯和語言經驗，本課程是在這基礎上發展的」。

從以上由一九九六至二〇一一年五份有關香港境內中國語文教育的重要文件看來，教局對使用教授中國語文的教學語言由此至終都是香港人日常用語，我們的母語——「廣東話」。

既然如此，此五份文件是甚麼文件？是不是無關重要的垃圾文件？當然不是！它們被全港小學中學奉為中國語文教學的圭臬（粵音「歸熱」），所有中文科課程必須依照此四份課程指引及一份教學語言報告來設計，甚至有教育督學，外評隊伍以課程指引所記述來檢視學校在教授中國語文方面有否違逆或做得到位與否，可見這五份文件的重要性，如說它們是教授中國語文的「聖旨」也實不為過。

然而，在各份中國語文科課程指引中指明是要用母語（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下，教局竟然在《香港課程發展議會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中學習範疇芻議一項寫出長遠考慮：「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並指此乃初步建議，須在一連串公開論壇和不同的諮詢場合中具體探討。但教育當局真有廣泛諮詢嗎？語常會指

初步諮詢曾於二〇〇七年九月進行，諮詢對象為十一所中、小學校長。而全面諮詢亦在二〇〇七年十月時進行，共有二十三個學校議會及辦學團體代表出席了由語常會舉辦的兩場諮詢會。兩場諮詢會二十三間機構等同「一連串公開論壇和不同的諮詢場合」？筆者於一九九八年已任教普通話科，但〇七及〇八年卻從未接收過上述初步諮詢及兩場諮詢會的消息。連普通話科教師也不得參與其事，只容教育團體高層人士參加，這種算全面諮詢現職教學人員的意見？在筆者看來只是為實行政策而作的假諮詢而已。

及至語常會在二〇〇三年發表《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總結報告」），其中第三章「如何達至所定的語文水平」指出：「語常會於二〇〇二年三月曾委託過香港政策研究所調查學生、家長及教師對學習動機的看法。而調查中明確表示學習普通話的動機『強』或『非常強』的學生則只有百分之二十五。」此調查結果顯示有百分之七十五的學生本身對學習普通話興趣不大。另外，在此「檢討總結報告」中又指出「要加強香港學生學習語文的動機，特別是提高他們學習有關語文科目的興趣，至為重要」。調查最後結果亦只是提出「學校應營造適當的環境，提供更多運用英文和普通話的機會」而已，並非更改存在已久，行之有效的廣東話母語教學。

在論及教學語言部份，此份報告亦指出「為了達到教育的整體目的，我們相信學生應使用一種不會對學習過程構成障礙的語言作為教學語言」。對大多數學生而言，這是指他們的母語。因此，語常會贊成，採用學生的母語作為教學語言。

由此報告這部份的內容，以正常人類的邏輯推論，「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即等同「以學生不太感興趣的語言教授中國語文」，這能加強香港學生學習語文的動機麼？答案顯然是不能的。

然而在同一份報告，一論及以普通話教授中文一項即改口風，指出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有下列益處：

（a）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較佳；

（b）特別是學生的中文寫作，將會較少受廣東話的影響；以及

（c）學生的普通話能力將有所改善。

而報告中雖明確指出根據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曾資助的三項有關研究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他們在中文寫作方面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然而，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

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研究明顯地將語常會自己提出的（a）及（b）理由推翻，只餘（c）一項，但語常會的結論卻是「因此，我們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的長遠展望，就是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

由以上《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檢討總結報告」）中可見其語文政策明顯矛盾，一方面說贊成以母語廣東話作為教學語言，一方面贊成不是母語的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一方面提倡以學生感興趣學習的語言教學，一方面又要以學生不感興趣學習的語言教學。如此前言不對後語的報告竟是語常會及教局向立法局解釋撥款二億以作「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的強大理由。而荒謬的是立法會竟不問情由，只求語常會教局交代一下，便輕輕放過對語常會問責及接納語常會做法，更離譜的是教局及語常會主席們（卸任或現任）常高調查問學校推普教中的進程，同時不斷從不同途徑如傳媒、研討會等信誓旦旦地對學校家長灌輸「普教中能提昇學生中文語文能力」此一經過多年多次研究驗證卻是無從證實的「好處」。

如要跟從芻議以普教中，則課程指引的母語教學一項應該已被教育當局取消；如跟從課程指引的母語教學，則芻議不應存在。此

兩項不能共存的語文教學政策竟同一時間出現在教授中國語文的教學語言項目上，自相矛盾至極。

再深入一點想想，如課程指引的基本原則是必須跟從，那現行普教中的中小學將是違反了四份由教局訂下的中國語文科課程指引，令全港學生中國語文水平不斷下降的幫兇正是各間普教中的學校！

語常會與教局，你們是精神分裂了，還是當香港人是羊牯？也許香港的學校及辦學團體真的很好欺騙，故此，此種嚴重矛盾的語言教學政策竟得學校及家長青睞，至今已有約百分之八十以上小學（以筆者統計新界七區共二百二十四間小學一百八十二間有普教中計算）與約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中學（以筆者統計新界七區共二百零八間中學五十二間有普教中計算）墮入此矛盾混帳的陷阱政策中了。

香港政府那麼堅決將本來中國語文的教學語言更換，除了說是為討好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迎合財大氣粗的自由行外，實在沒有教育上的理由及必須在香港此地強迫推行普通話來教授中國語文。除非香港政府的本來的目的就是要推倒本來閱讀能力非凡的香港學生（以母語）的語文水平能力①，以便將來港府之語言偽術無人得悉，又或為方便二〇四七年後中共以一國之名完全接收香港為「中國城市」，又或以滅絕華夏文化根源為政治任務，否則此種矛盾的

①「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PIRLS) 由「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 (IEA) 主辦，研究各參與國家／地區九至十歲小學四年級學童使用母語閱讀的能力，每五年進行一次。PIRLS 2011 的研究結果顯示香港小四學生在教改、課改提倡「從閱讀中學習」下成績的縱向轉變，以及他們在完成第一學習階段時與世界各地學生比較的相對程度。參與研究的學生和家長分別有四千一百多人及三千六百人，教師及校長亦分別超過一百三十人，他們均以抽樣方式選出。第四年級學生閱讀表現的一至十排名：

	PIRLS 2006			PIRLS 2011	
排名	國家／地區	平均分	排名	國家／地區	平均分
1	俄羅斯	565	1	香港	571
2	香港	564	2	俄羅斯	568
3	加拿大（艾伯塔省）	560	2	芬蘭	568
4	新加坡	558	4	新加坡	567
4	加拿大（卑詩省）	558	5	北愛爾蘭	558
6	盧森堡	557	6	美國	556
7	加拿大（安大略省）	555	7	丹麥	554
8	意大利	551	8	克羅地亞	553
8	匈牙利	551	8	中華臺北	553
10	瑞典	549	10	愛爾蘭	552
			10	英格蘭	552

政策怎能出籠，怎能得到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注資？

二〇一三年語常會更獲五十億，又不知有多少資金會用在「普教中」的計劃中了。更甚者語常會前任主席及現任主席都不約而同在不同的場合大談「必須普教中」，是事在必行，甚至叫香港人連日常生活都改用普通話，完全忘記教局自己訂下，在各本中國語文課程綱要指引內白紙黑字寫明的母語教學既定政策。如此荒唐荒謬互相違逆的事竟日日上演！別忘了，自一九九八年始，獨立的普通話科已是本港初中及小學的核心課程，目的是培養學生運用普通話的能力，特別是口頭交際能力。如只是要達到與人溝通目的，普通話科的設立已極足夠。「推普滅粵」此陽謀欲以「普教中」手段達之，不是顯而易見嗎？

四、普教中提升語文水平？謊話連篇！

《姨媽姑爹論盡教改》序言中，蔡寶瓊和黃家鳴寫道：「Project的謊言在香港學校中俯拾即是的，至於教育界領導人所說的大話，在這幾年『翻天覆地慨而慷』的教育改革洪流中也就更多了。」同時在序末說：「社會上的『語言暴力』，並不止粗言惡語而已，這類語言的傷害並不太深，真正的、深入的『語言暴力』，是通過扭曲了真

理的話來規限，模塑人的思想，而這正正是今天香港的統治階層所喜用的手段。」而書中最後一章由全方位學者寫的標題更是至今仍未過時的現世教育界寫照：「In The Name of Education（奉教育之名）：樂於假諮詢，善於搞抹黑，勇於出口術，敢於說了算。」

教局在官方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中指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來各方責難，其後又刪去其網頁中指：「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一頁。

而語常會前主席田北辰更認為，本港中文老師未能掌握地道普通話，只會犧牲港生中文水平，不再用廣東話授課是其最終目標，並指語常會有長期研究，但無實質證明普教中可幫助學好中文，不過透過普教中一定可以學好普通話。以上如此前後矛盾的說話竟由曾主掌全港學校語言學習策略的人說出，可想而知以「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為理由來強推普教中，根本就是連教局自己都知道的謊話。

筆者在前文「普教中這念頭從甚麼時候開始？」一節整理過整個「普教中」出現的時序，發現「普教中」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是子虛烏有的事，直至教改出場，課程發展議會（一九九九）提出芻議指

「普教中」是該議會的長遠目標；其後語常會（二〇〇三）附議「非常贊成課程發展議會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長遠展望」（段3.2.14）。

自此，不少學校因而施行「普教中」。直至現今，已超過百分之六十的小學和約百分之三十中學了。

其中，教局推普教中的理由有三：

第一是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

第二是普通話是中國法定的溝通語言，並且與標準書面語一致，說和寫的表達方式分別不大。（筆者曾撰文《我的女兒接受普教中》，已指出說和寫是兩回事）

第三是由於香港的成功是依仗中國長久以來的虛弱而取得的（程介明，二〇〇二）。隨着中國經濟起飛，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將受威脅，提升普通話水平是提高香港競爭力的方法。（這點其他學者自有評論）

其中以第一點是教局推普教中的主要理由。而語常會為了證明此理由是正確的，普教中能帶出提升學生中文水平的效果，由二〇〇〇至二〇〇九年間共做了兩次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研究。

然而弔詭的是，這些研究報告指出的卻不是語常會跟教育局官員幻想中那一回事。

自二〇〇〇年起，花了兩年時間做的研究——《比較以普通話和以廣東話教授中文科對小學生中文能力的影響》——在其最終報告寫「就中國語文能力而言，兩個年度小六學生的語文能力表現保持一貫水平，既未見增強，亦未見低落。兩年度小六學生的語文水平，可說是既穩定，又一致的」。又寫「研究結果顯示，字詞運用和閱讀理解方面，普教中低年級樣本成績較評量研究②的高，高年級則較評量研究的低。寫作方面，除一年級外，普教中各級樣本的成績都略低於評量研究」。

很明顯，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嗎？除一年級因學懂的字詞增多而成績稍高外，其他各級中文寫作水平都是下跌的。語常會

② 研究採用由語常會《香港小學中國語文能力的評量及發展過程的研究》（評量研究）發展出來的一套小學生中國語文能力的測試工具，量度本港接受普通話為中國語文科教學語言的學生的中文能力，即以評量研究訂定的刻度（Scale）為基礎，從字詞運用（卷二）、閱讀理解（卷三）和寫作（卷四）三方面量度普教中小學生的語文能力。測試工具：卷二及卷三共一小時、卷四一小時。運用四教節，其中小息十五分鐘。

卻將此扭曲解讀成為：

這項研究結果對於「以普通話學習中文科的低年級學生在字詞運用和閱讀理解兩方面的能力，是否高於以廣東話學習的同級學生」這一命題，仍是難以論定的。（報告頁6-4）並指研究的結果，充其量只可以作為「學校使用普通話為中文科教學語言對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暫未發現有明顯幫助」的一項研究數據。（報告頁7-2）

明知普教中不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但語常會仍死心不息，於二〇〇四年開展為期兩年的「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的研究。故意找來香港二十間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中、小學，檢視這些學校推行普教中所須具備的條件，以供有意推行普教中的學校和有興趣的人士參考和借鑑。此次研究不再提及「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而是直接跳到有學校進行，要求其他學校要參考這些學校推行普教中的方法，繼而進行以普通話教中國語文。

翌年，報告尚未完成，語常會便馬上宣佈，撥款港幣兩億元，從二〇〇八年九月起，在中小學推行為期四年的「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一方面仍以「普教中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為原因，另一方面以增撥資源為誘，吸引中小學進行其「換語」大計。

在二〇〇八年之前，有些學者及學校亦有為普教中進行問卷調查及多方面的研究。然而這些問卷調查或研究的解讀，老實說，筆者認為是故意利用「語言偽術」將真象掩蓋。

例如一九九九年時，筆者老師何偉傑與李藹兒小姐對十四間小學一百零六位教師進行了一次問卷調查。問卷中提及老師對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所具有的好處的同意程度及次序、以普教中會造成的問題同意程度及次序、以哪個年級教授普通話最恰當和是否贊成普教中及不贊成原因等。結果發現中文老師對採用普通話作為教學語言的個人取向贊成的只有百分之十一，不贊成的高達百分之八十九。問卷亦調查出中文老師不贊成的原因是老師未具充足能力，學生的普通話跟不上和影響師生溝通三大項。然而何教授最後的結論是老師雖然不贊成推行，因缺乏信心及實踐，但只要積極進修普通話，就能進行普教中！更說中文老師肯定轉變教學語言的好處！

這種結論給予筆者的感覺就像你問我歡喜吃糞便否？我說不喜歡。你追問原因，發現我不吃糞的原因是「感覺核突、臭、不衞生」。結果你認為只要有足夠訓練，練到「不覺核突、臭、不衞生」的時候就可以吃糞了一樣。

另外，二〇〇〇年時，香港教育學院亦進行為期兩年的《在

香港小學及初中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可行性研究及普通話作為課堂教學語言課程的設計》研究。結果發現中國語文科成績方面，有學校的普教中班成績未見提高，甚至略遜於廣教中班。六所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初步試驗結果，更有一所不太成功（中學）。而該研究結語最令筆者震撼的是這句：「我們還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用普通話教中文一定優於用粵語。因此，我們必須繼續進行跟進研究，查明學生用普通話學習語文的實際優勢和效用。」這種不肯承認普教中在香港以廣東話為母語是無大效用，不就是非在香港普教中不可的輸打贏要態度嗎？

又，香港中文大學於二〇〇二年秋季發表《用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對中學生學習中國語文的影響研究》報告。指出兩所普教中中學（實驗組）和兩所廣教中中學（控制組）共六百九十九名由中一升至中三（初中）的學生（追蹤三學年）用「語文能力測驗卷」（自行設計）測考下，只有普教中的中三學生在句子改寫和作文方面的成績明顯高於廣教中學生，其他兩級成績卻不提及比較，而在詞彙、句式、交際用語、稱謂語、歎詞、閱讀理解六方面，就以「普教中的效果並不顯著」作結，連比較也欠奉。最後竟說「研究印證了採用 PMI 教學，有利於學生書面語表達能力的發展，PMI 學校的學

生，也越來越接受 PMI 教學語言政策」。以這種以偏蓋全、令人摸不着頭腦的結論作結。

至於劉筱玲校長用五年時間進行的《香港地區用普通話講授小學中國語文課的實驗與研究》得出來最重要的結果是在「超經驗的閱讀能力」上普教中組與廣教中組的差異不大。甚麼是超經驗的閱讀能力？就是指通過對超越小學生直接經驗的內容的閱讀，考察對語言作品閱讀與感受的敏銳性，測試內容完全脫離所學的課文，試題組合完全脫離原有的考試模式。這意味些甚麼？如果普教中真的能提升學生中國語文水平，為甚麼在這種完全沒有考試範圍的模式中，表現出來的成績竟不是比廣教中高出許多而是「差異不大」？

另，何國祥主編的《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二〇〇二）第二十一題問題問：採用普通話學中文，學生的中文成績又如何？

筆者照文筆錄：「中文水平方面，大家（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意見）都覺得這會對語文學習有幫助。一半以上的學校表示學生的『作文明顯進步，行文流暢、通順，也較少方言、口語』。培道林老師更感到 PMI 班學生的作文比用粵語的五年級好。但事實是，中文科成績未見提高，與傳統用粵語作教學媒介語的班級比較，甚至有略遜的感覺。

「根據培道小學的學生考試成績，上學期完結時，用普通話學中文的小三班的普通話科有進步，考試成績比用粵語學中文的小三班進步了一點八二分；但是中文科成績則差了一點四九分。下學期考試成績的比較進一步說明此現象：PMI 班的普通話科成績比 CMI 班高出五點零一分，但中文科則低了二點三六分。」

但此問題最後竟寫：「培道小學不按學生成績分班，這些比較也具一定的參考價值。」比較如此明顯，卻只說「也具一定的參考價值」而已，可見「普教中」不可不行之勢乃由上而下壓至，不得不無奈百般維護。

當然還有其他研究，但都證明不了普通話教中文比用廣東話優勝。教局推普換粵實在是沒足夠理由，而是用行政手段迫使學校遵行。

我以前教育學院副院長陸鴻基在《姨媽姑爹論盡教改》中〈怎樣學好「兩文三語」——母語、廣用語文和語文教育〉一文中的話作一總結。

他說：「所謂國語本身也只是一種方言」，並指出某種方言成為國語是「憑藉政治和軍事霸權，攀上『國語』的寶座」（頁一六六至一六七），並「利用法律、傳媒、教育等手段，壓抑排擠其『方言』，貶斥它們為鄙俗的『俚語』」。（頁一六七）

又說從語言使用者的立場來說，粵語是香港大多數人的第一語言，即家庭和社會生活以粵語為主（頁一六八），以此作為學習語言最合理，反之，如果學校語言和家庭語言和社區語言不一樣，學生就會產生適應問題（頁一七七）。

他更警告說：「從語言角度看，任何的國語統一運動，都是讓一種方言獨佔強勢語言的地位，把其他方言在其他地域原來享有的強勢地位剝奪，貶成弱勢語言，削減它們的功能，限制它們在莊嚴或公開場合的使用權和教育權與傳媒權。這侵犯了『國語』以外各方言使用者的基本權利，面臨被逼變啞巴的人是難免要反抗的！」

普通話教中文能提升學生中文水平是一則謊言，如果我們只是要提昇普通話水平，只須要在故有的普通話科中好好學習就行，學懂怎樣說，懂得利用普通話與人溝通，學多一種語言，與使用它來學習中國語文，提升自己的語文能力③基本上是無關的。

這種騙盡全港人，以行政主導，強迫轉換教學語言的政策，大家認清了沒有？

---

③語文能力包括語言能力：一、組織能力——語法知識、語篇能力；二、語用能力——語言施為能力。社會語言學能力和策略能力：一、認知策略——理解、儲存、提取、使用；二、元認知策略——即自我評鑑。

參考書目

① 蔡寶瓊、黃家鳴（二〇〇二），《姨媽姑爹論盡教改》，香港：進一步多媒體有限公司。

② 課程發展議會（一九九九），《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香港課程發展議會。

③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二〇〇三），《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諮詢文件》，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④ 程介明（二〇〇二），〈從母語到普通話〉，載於《中文教育》第三期，香港中國語文學會。

⑤ 何偉傑、李藹兒（一九九九），《中文老師的取捨　普通話與方言教學》，香港：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

⑥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二〇〇九）綜述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研究報告，香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

⑦ 張連航、張國松、鄭崇楷、梁莉莉、吳麗萍和李正榮（著），何國祥（主編）（二〇〇二），《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香港：香港教育學院。

為了下一代　堅持「粵教中」

韓連山（退休教師）

「普教中」的辯論又因教育局一篇有關《語文學習支援》文章內的荒唐說法熾熱起來，該文把廣東話定性為「一種不是本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惹來各界抨擊，怒批教育局混淆視聽，並有貶低廣東話之嫌。教育局見勢色不對，刪除了文章，並於（二〇一四年）二月二日以另一篇文章《兩文三語正面睇》試圖為局方說項，稱「根據《基本法》第九條，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法定語文條例》第三條則訂明，在政府或公職人員與公眾人士之間的事務往來上以及在法院程序上，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

這份澄清並未釋除公眾疑慮，在今天特區這個亂局中，市民大眾早已對政府信心大失，眼看梁振英上場後的謊言治港策略、對中共唯命是從的取態、四大任務（推行洗腦教育、整治傳媒、操控政改和重推二十三條惡法）逐一出場的險境，又怎怪得市民心中有數，對政府欲推的政策必須虎視眈眈，不容他們或粗暴施政、或妖

言惑眾、或暗渡陳倉式的禍港殃民？二〇一二年市民群起反對教育局欲借推行國民教育染紅特區的一役，正正顯示市民的警覺性已被喚醒，這一回的貶粵揚普的舉措，大家更高度關注。

特區教育局官員從來都只是一批「重行政輕專業」的政務官，由李國章和羅范椒芬主政年代以營商心態所強推的種種罔顧專業禍害學子的政策，至吳克儉和謝凌潔貞變本加厲地欲推「國民教育」向中共拋媚眼的例子來看，這一回的欲借矮化廣東話從而毀滅本土文化之企圖昭然若揭，教育界朋友又焉能坐視不理？

令人惋惜的是我們教育界選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都未能清晰地、硬淨地「撐粵語」，為下一代的語文教育政策說應說的話。我們的前任代議士張文光在其文章《盡早為普通話教學定位》這樣說：「香港學校的普通話教學，還在發展階段，定位還不清楚，但普通話對香港非常重要，因為香港是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人要和中國人溝通，無論是生活，還是經濟的理由，也要加強普通話的教學。」曖昧的立場、「擦鞋」的意圖盡現：說的雖然是普通話教學，但卻隱伏着宣揚普通話之重要性必須進一步正視之理念，當然有為「普教中」鳴鑼開道之嫌。直至被人批評後才作出澄清，曰「關於教協會在普教中的立場，我們不同意當局用行政手段強制推行普教中，認為應基於專業知識和學校的實際情況由專業決定」。這完全是教

協會被人批評「步伐緩慢」未能顯示錚錚風骨的例證之一；亦是教協作為教育專業工會而未能從專業角度把話說清楚的「和稀泥」取態。而這種看風駛　不敢定位的取態又怎不被人詬病！也許張文光空有教育界代表之名而無多少實際教學經驗導致他對語文教育的無知，但他也應知道，他自己由小學至中學至大學期間是用甚麼語言來學習的吧？

現屆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在此項爭議中就只稱教育局自行將廣東話列為「非本港法定語言」的做法「非常不恰當」，又認為長遠而言，政府有需要進一步「釐清」廣東話是否屬於本港口語上的官方語言云云，卻沒有以教育界應有的專業知識「撐粵語」，還依賴教育局去「釐清」，是椽木求魚？簡直是不負責任。在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的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會議上，當民建聯李慧琼議員詢問政府為何遲遲未能在中小學落實執行普教中政策時，葉建源指出學好兩文一語，普教中「非必要手段」，還稱「在某些情況下，用普通話教中文有其好處」云云。「非必要」、「非必不可少」、「非缺一不可」等語言偽術我們太耳熟能詳了，說這種話的人我們自然心裏有數，此等人的背後意圖也不言而喻。雖然葉建源也提及「在更多情況下，（普教中）會使學生喪失對學中文的興趣，因為學生是用一種陌生的語言學習和進行溝通。如果溝通失效，其實在幼童的

階段，如果語境等等都未能配合的話，是會有影響的」。暗示着有足夠「語境」又脫離「幼童階段」便可推行「普教中」？這種曖昧言詞，猶抱琵琶半掩面的說法，令人更覺偽善。左右逢源也許是最安全的做法，但作為教育界代議士，不有理有據、堅定地反對「普教中」，我們對這些代議士還可有期望嗎？而特區有多少禍害學子的教育政策就在我們的代議士「面面俱圓」或「小罵大幫忙」的取態下通過了？再看看教育局的回覆：「要有足夠條件學校才能嘗試普教中」，完全與張文光和葉建源的倡議如出一轍，大家便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從專業角度看，「普教中」真的能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嗎？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教授清楚說明他「贊成學普通話」，但指出「用普通話教中文是另一回事」。首先，他認為懂普通話不等於懂閱讀和寫作，他亦曾以自己一個具代表性的調查為例，鏗鏘有力地指出「普教中」的弊端。他的調查發現內地閱讀能力最好成績的是江南，中文最好成績的是常州，全是說方言的地區，指出了不是普通話好的學生閱讀能力便高，否定了學普通話能提高中文能力的說法。而特區教育局可有深入調查「普教中」是否較「粵教中」更能提升學生中文能力？在沒有實質數據前亂推政策，不又是教育高官不負責任的明證。

前線教師最清楚，在中文課用普通話作教學語言，花了大部份時間學習字詞的讀音，聽講讀寫四種不能偏廢的語文能力便犧牲了閱讀和寫作兩大重要範籌。教師更沒有足夠時間較深入地討論文章的旨意、鋪陳的理由、作者用字遣詞的書寫技巧等。一言以蔽之，「普教中」是顛倒了學習的優次問題，學好了講普通話，不代表着中文閱讀和寫作能力的提高。其實，要提高讀寫能力，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一九八八）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

特區的語文教育政策在一群官員手中每況愈下，語文教育（包括中英文）政策一團糟，不懂教育的高官，先把學生語文水平下降的原因歸罪語文教師，強推一個英文和普通話教師必須重新考牌的「語文基準政策」，撕裂了教育界、害死了教師，又不見當局做一個調查跟進「語文基準政策」的成效，不負責任如斯，枉為教育界領導人！母語教學爭議不斷，教育局弄出一個EMI（以英語為教學語言）和CMI（以中文為教學語言）的學校區分，再來一個「語言微調」政策，把學生的校外標籤引到校內標籤，港爸港媽哭完再哭，

為甚麼總要「搞我哋啲仔女」？學生在畸型教育制度下受教，叫苦連天；一群又一群的白老鼠任教育局玩弄，教師工會又無力挽狂瀾，怎怪有能力的父母盡把孩子送往外地受教？

不容置疑，粵語就是學生的母語，棄母語而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帶來的是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語文能力不進則退，肯定是不利學生的語文學習的。當局若不懸崖勒馬，還要借種種藉口欲大力推行「普教中」，不認同一向行之有效的粵語教中文策略，就肯定有其背後動機，是繼「洗腦教育」被市民看穿詭計推行失敗後的另一新猷？是借「普教中」清洗本土文化向中共獻媚？二〇一〇年廣州的「撐粵語運動」歷歷在目，當年廣州的市民認為是中共政府繼西藏、新疆後，肆意打壓本土文化，要消滅粵語從而毀滅本土文化的承傳。香港市民感同身受，加入捍衞廣東話的行動，在八月一日與廣州市民異地同步進行了抗議行動。今天，我們必須同心協力，即使高官如何無知和無能，即使議員如何曖昧和偽善，教育界的同工，我們必須以專業的角度、學生的福祉為依歸，加上市民的支持，為我們的下一代堅持「粵教中」的政策。

「普教中」可取嗎？

葉建源（立法會議員（教育界））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二〇〇七；二〇一四）一向大力主張有質素的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 EFA），其語言政策研究指出，不同年齡的人，尤其是幼童，接受以母語為基礎的多語言教育，對學習過程和學習成果方面均有正面影響。

受歷史和地緣政治使然，掌握「兩文三語」成為香港獨特的語文現象，而「兩文三語」的能力也被視為香港的一項競爭優勢（語常會，二〇〇三）。香港人普遍都是「雙語人」或「多語人」。但須注意兩點，正如 UNESCO 的語言政策強調，第一，「多語人」掌握非母語的能力應包括對該等語言有聽講能力，並明白溝通內容；第二，掌握多種語言的能力並沒有排除使用母語的能力。

對於用普通話教中文科（普教中），部份研究指在中文科的某些環節，例如詞彙和句式運用方面，學生的表現有所提高，但在其他環節，例如使用書面語方面，學生表現一般，甚至遜於用廣東話學習。那麼學生應該如何學習，才能得到最大的效果？

「普教中」可有不同模式

雖然，語常會（二〇一〇／二〇一一）的文件對參加「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的一百六十所學校，並不規定學校以「普通話作為中國語文科的唯一教學語言」，但根據目前社會和家長對普教中的理解，普教中是指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的所有環節。

以筆者親身的經驗為例，我在中一的時候（一九七三年），中文科是以普通話（國語）授課的。儘管母校是一所英文中學，但因為中文科老師留學台灣，國語流利，加以校方認為我們應學一點國語，故在沒有獨立的普通話科的情況下，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當時整個中文科都變成了語音訓練，我們學會了一點普通話，但同時失去了閱讀課文的樂趣，是有得有失。值得一提的是，這位老師教授文言文時會轉用廣東話。換言之，她和校方作了一項重要的專業判斷：因應不同環節的不同目的而選用不同的授課語言。對校方而言，這一年的中文科主要就是學會普通話的語音，以及讀懂文言文，倘以其定下的目標來衡量，是相當成功的。但如果目的是激發學習中文的興趣，則是失敗的。當然，多年之後，我會質疑倘當時另設普通話（國語）科，而用粵語講授中文科，效果會否更佳？但當年學校要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是極難的，殖民地政府在上

世紀六十年代取消中學會考的國語科，國語（普通話）幾乎絕迹於學校制度之內，使香港與海峽兩岸的當代現實進一步疏遠，要求個別學校設立獨立的普通話科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對多數學生來說，於某些環節，例如學習文言文、參與討論、運用高階思維、表達意見和複雜的情感時，以母語（廣東話）學習無疑比用較陌生的語言（普通話）優勝。上述只是筆者的個人經驗，學術研究亦肯定了以廣東話授課的正面效果，更明確指出教師在解釋複雜概念、教授更深更廣的知識時，都會使用廣東話（謝錫金等，二〇〇四）。如果普教中只能提昇學生某方面的語文能力，卻犧牲了他們用母語學習中文的其他好處，結果是得不償失。

「普教中」的成敗得失

有一些研究指出，「普教中」是有正面成效的，例如何國祥（二〇〇二）在六所學校進行研究後指出：「中文水平方面，大家（校長、教師、家長及學生的意見）都覺得這會對語文學習有幫助。一半以上的學校表示學生的『作文明顯進步，行文流暢、通順，也較少方言、口語』。」劉筱玲（二〇〇五）的實驗研究發現，「普教中」班級的詞彙和句式的積累和辨誤能力較強，理解力較佳。而香港中

文大學二〇〇二年的研究（轉引自高寶玉，二〇一二）也指出，接受「普教中」的學生在句子改寫和作文方面普遍比「粵教中」的班級為佳。「普教中」似乎有一定好處。

然而，正面的結果並非壓倒性的。上述何國祥（二〇〇二）的研究同時指出：「……但事實是，中文科成績未見提高，與傳統用粵語作教學媒介語的班級比較，甚至有略遜的感覺。」而香港中文大學二〇〇二年的研究（轉引自高寶玉，二〇一二）也指出，「普教中」和「粵教中」的班級在詞彙、交際用語、閱讀理解方面，成績十分相近。

其他學者的研究結果也表明「普教中」對學習中文的好處並不明顯。例如梁佩雲（二〇〇六）的研究中指出，若不注意分辨普通話科和中文科在教學的深度和廣度上的差異，用普通話教中文對兩科的教學成效都沒有好處。又例如高寶玉（二〇一二）的課堂研究報告指出，粵普之間在詞義上有很大分別，進行粵普轉譯時產生的傳意障礙，亦非參照粵普對照詞典就能輕易解決，老師稍有不慎，轉譯不當，學生就會被錯誤引領，對語意產生誤解，影響教學效果。

很明顯，「普教中」有利於學好中文只是一項假設，在看到的

研究看來，整體而言效果並不明顯，個別研究甚至指出在某些個案裏「普教中」帶來了負面效果。

「普教中」的成敗因由

效果不彰，部份原因是「普教中」往往把中國語文科上成普通話課。有校長指出，部份經驗不淺的教師在實行普教中時，花大量時間教授學生普通話發音、拼音和朗讀，結果偏離中文科的教學目標。

另一個原因，是學生使用較陌生的語言學習，在課堂答問和造句往往採取迴避策略，課堂互動不如「粵教中」班級那麼有效（梁佩雲，二〇〇六）。這都是不難理解的。

由於這些原因，以致中學普遍採取了一個奇特的策略：在初中，超過一百所中學採用全面或局部「普教中」；但在高中，於面臨公開考試的時候，繼續採用「普教中」的不足十所！據一位前直資中學校長講述，他任職學校的初中採用「普教中」，但到底高中應否繼續採用「普教中」，則引起了爭論。老師擔心，在面對舊制會考、高考時，假若繼續「普教中」，只會令教學進度變得緩慢，學生理解也打折扣。倘連預科也維持「普教中」的話，更是以學生

的前途作賭注，學校也可能面臨收生困難。最後，中文科老師一致決定，高中階段要轉回廣東話教中文。筆者相信，這個案例所考慮的原因應有相當的代表性。

此外，我們還應注意兒童在不同發展階段有不同的特點。例如在幼兒教育階段，正是母語發展的黃金時期，一些高收費的國際幼稚園只教英文和普通話，完全不使用廣東話，這對以粵語為母語的小朋友的語言和思維發展，都可能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對此家長必須有清醒的頭腦，不應盲目追求名牌而把子女帶進一個「兩頭唔到岸」的困境。

但到了高等教育階段，情況則大不相同，使用母語以外的語言上課學習是司空見慣的事。這個時候，青年人的母語和思維模式均已臻成熟，不會再受到某一兩科的教學語言影響。所以，不同學習階段的考慮是大不相同的，我們須要運用教育心理學的專業知識。

結語

目前，有關「普教中」的實證研究仍不多，有限的研究結果顯示「普教中」的成效並不如社會人士預計的大。

不過，「普教中」成功的例子也是有的，筆者曾到過一所屋邨

小學，該校全面使用「普教中」十多年，對師資、課程、教學法、語言環境都作了相當周詳的部署和持續的調整。教育局不同時期的外評報告均指出，該校學生中英語文良好，普通話流利，上課時樂意表達，積極投入，與筆者的觀感頗為一致。

由此可見，同樣是「普教中」，不同學校的成效是有參差的。到底是甚麼因素導致個別學校比其他學校成功（或失敗）呢？成功是否需要某些特定條件呢？同樣的條件用在「粵教中」之上會否更好呢？不同的師資和教學法又是否帶來不同的效果呢？正如英語授課或母語授課一樣，不同學校、不同老師、不同學生、不同教法，都會帶來不同的效果。對於這一系列變數及其影響，我們目前掌握的仍然不多。

嚴格來說，「普教中」仍處於試驗階段，需要更多的研究才可以全面掌握其成效和解釋其成因。在審慎之餘，我們還可抱開放的態度。

（本文僅代表筆者個人觀點。）

引用文獻

① UNESCO Bangkok (2007), Advocacy Kit for Promoting Multilingual Education: Including the Excluded (Bangkok: UNESCO). The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team (2014), EFA Global Monitoring Report 2013/4 (Summary):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hieving quality for all (UNESCO).

②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二〇一三）：《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語文教育檢討總結報告》。

③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二〇一〇／二〇一一）：《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

④ 謝錫金、岑紹基、祈永華、徐碧美（二〇〇四）：《發展母語教學，邁向優質教育——回顧與前瞻》（香港大學教育學院母語教學教師支援中心）。

⑤ 何國祥主編（二〇〇二）：《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香港教育學院中文系）。

⑥ 劉筱玲（二〇〇五）：《香港地區用普通話講授小學中國語文課的實驗與研究》（小學中國語文教育研究學會）。

⑦ 梁佩雲（二〇〇六）：〈從中學教師的普通話教學觀念看『用普通話教中文』在香港的潛在問題〉，《教育研究學報》（香港中文大學香港教育研究所），第二卷第二期。

⑧ 高寶玉（二〇一二）：〈香港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課堂研究〉，《華語文教育研究》第九卷第三期。

普教中的迷思

施安娜（中學教師）

言文合一？言文混淆？

語常會前任主席田北辰在二〇〇七年指出，「過去三年追蹤二十間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學校，發現對學生的寫作能力很有幫助，他們對語感和規範漢語的意識亦較強」，卻指出本港缺乏師資及教學法，令推行普通話教中文有困難。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

然而這豈止是良好願望，這是言文混淆、脫離實際的無知。中文大學中文系前任主任鄧仕樑教授收錄在一九九九年三月《中國語文通訊》裏的〈當前香港的漢語教學〉一文，提出「言文合一的說法在語言學裏是不能成立的」，並引用語言學家朱德熙的說法，指出「不管哪種語言裏，書面語和口語之間總是有一定距離的」，明確指出「在中國傳統裏，漢以後二千年讀書人寫的文章，用的正是脫離

了口語的語言」。專家的看法讀書正是要通過書面語去學習書面語的使用，鄧氏認為，今天整個局面變了，生活的語言跟書面語言距離接近了，學習效果該更好，但不能說學生在沒有學好普通話之前不能寫文章。香港文字研究者容若在一九九九年在《明報月刊》的〈壓現代中文的兩座大山〉一文中形容這是講真話。

其實，早在一九八八年，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新亞研究所教授李學銘，便指出了言文混淆的問題，李氏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中指出「過分強調口頭語對書面語的影響，而不知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是不智的，李氏指出有少數熟諳普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以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以為「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誠然，如李氏所說，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

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

當我們倡議學習普通話是大勢所趨，想一想我們的學者專家怎說；當我們高談學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想一想說與寫不同，知識面廣狹並不是取決於口頭語的學習。請一眾熱切推行普通話教中文的官員，理解當中的不智與不利，而不是一味的唱好。正如容若在二〇〇七年四月的《明報月刊》〈推廣普通話戒浮誇〉所言，侈言消滅方言，侈言「語同音」，假設廣東人不懂普通話就看不懂白話文，假設用廣東話教學要「翻譯」，都是浮誇之言。這種批評，可不是浮誇之言，而是有證有據的，也許急於推行普教中的官員、認定用了普通話教中文便能提高學生寫作能力的同工，可以讀一讀，想一想。

我手寫我口≠提升寫作能力

或有人以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至「我手寫我口」，似乎是把「我手寫我口」作為用普通話教中文的目的了。以普通話

教中文，可以訓練學生「我手寫我口」，改善他們寫作常犯的港式口語，學生在寫和讀中文方面表現有進步，是一種美麗的誤會，這是欠缺對語文裏言文不一的認識，也是昧於歷史的天真。

晚清時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白話文運動有言文一致的說法，那是基於改革情感下的提倡，冷靜下來便有了不同的理解，作為新文化運動主要人物之一的周作人，在《重刊覓裳續譜序》裏，便指出「大家當時大為民眾民族等觀念所陶醉，故對於這一面的東西以感情作用而竭力表揚，或因反抗舊說而反撥地發揮，一切估價就自然難免有些過當，不過這在過程上恐怕也是不得已的事，或者可以說是當然的初步，到了現在卻似乎應該更進一步，多少加重一點客觀的態度，冷靜地來探討或賞玩這些事情了」。一九二五年，周作人在《國語文學談》裏便有這樣的反思：「中國現在還有好些人以為純用老百姓的白話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國裏當然只應有一種國語，但可以也是應當有兩種語體，一是口語，一是文章語。口語是普通說話用的，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語是寫文章用的，須得有相當教養的人才能瞭解，這當然全以口語為基本，但是用字更豐富，組織更精密，使其適於表現複雜的思想感情之用，這在一般的日用口語是不勝任的。」這正好指出了口語言詞

貧弱，組織單純，不能敘複雜的事實、抒微妙的情意，若我們期望以作為口語的普通話提高寫作能力，是把重點放錯了。

教育學院「用普通話教中文研究計劃」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問與答》小冊子中，第三十三問裏提及「普通話乃漢民族共同語，是現代漢語的口語表達形式。當我們談到『語文』的概念時，『語』指的就是普通話（口語）；『文』指的是白話文，它是現代漢語的書面表達形式」。這裏明確地指出普通話是口語，而我們所期望提高的寫作能力，其實是書面語。讀寫能力的提高，牽涉的是理解與表達能力，這與一個人的知識面廣狹關係密切，香港教育署語文教育學院前副院長、理工大學中文及雙語學系退休教授、現任香港公開大學榮譽教授李學銘在《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一九八八）中，提出「一個人能聽、能說普通話，當然已掌握了一些特定的語音、語法、詞匯知識，但並不表示這個人已具有廣闊的知識面，更不表示這個人已有很高的語文能力」。誠然，香港學生容易在語法和詞匯上出現港式口語，加上英語干擾，問題複雜，但採用普通話教中文，可能帶來學生學習動機下降、師生溝通出現問題等等都不容忽視，那絕對不是百利而無一害的。更符合香港現實情況的做法是，如李學銘所說的「切實做好語文教學工作，加強閱

讀寫作指導」，明白「書面語的學習，仍該以書面語的接觸為最有效」，才是對症下藥，提升學生的讀寫能力。

普通話不是我們的母語

教育局網頁的〈語文學習支援〉一文，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經網民於（二〇一四年）二月一日瘋傳後，輿論嘩然，教育局於二月二日道歉。然而筆者更關注的是其中與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有密切的關係。教育局的「語文學習支援」其實是當局對於語文學習、甚至是教學語言的政策，該篇教育局於二月二日收回的文章中指出，「教育局語文教學支援組於二〇〇四年成立專責小組，以提升香港語文水平為終極目標。專責小組由教學顧問組成，為全港中小學，提供中文（包括普通話）及英文課程發展支援服務」。其中一項工作正是「鼓勵以普通話進行語文活動或課堂學習」。

二〇一三年財政司長曾俊華在財政預算案中建議撥款五十億注資語文基金，二〇一四年一月十日在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通過了。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提及「語常會就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在不同語境下使用中文及英文等方面，提供了有用的數據和資料」。

可是筆者在語常會的網頁，除了看到在二〇〇八年因要推行普教中而做的研究、《協助香港中、小學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簡介》之外，並無任何新的數據，而教育局提交立法會的文件，只是談及自二〇〇八年開始至二〇一四年，合共支援了一百六十所學校推行普教中，指出「我們相信，藉着鼓勵和支援更多學校推行普教中，這項計劃會大大有助達到推行普教中的長遠目標」。這裏明確地指出長遠目標推行普教中，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指的只是二〇〇八年語常會關於推行普教中所需的條件的研究，即具備六個條件，分別是：（一）師資、（二）學校管理層的態度及策略、（三）語言環境、（四）學生的學習能力、（五）課程、教學及教材安排，以及（六）教與學的支援。筆者早已指出，這「儼如師資及教學法問題解決了，香港學生的寫作能力便提高了，這是昧於現實、欠缺學理的良好願望」。這也是「言文混淆、脱離實際的無知」。

若教育局提及的所謂有用數據和資料，只是指一百六十所學校參與推行普教中的數字，但卻沒有分析當中的成效，談的只是數字，不是質素，又怎能據此而提出要求撥款繼續推行？更不可思議的是，教育局網頁中有關普教中的問與答中，回應「目前個別

官立中小學實施以普通話教中文，教育局能否作全港性推廣，讓學子熟練掌握普通話，以提高中文修養？」指出語文基金及優質教育基金近年曾資助三項與這課題有關的研究，提及「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所提及的三項研究何時進行，並沒有清楚說明，但清晰可見的是，當中提出普教中的成效未有定論，當局在考慮繼續推行時，可曾考慮成效？這斷不能是說「相信」便可以過關的，便可以斥巨資繼續投資的。

事實上，部份參與普教中計劃的學校，質疑其成效，已有報道提及小學校長指出於小一推行普教中，見過不少因普教中而引起的語言混亂；有學校曾推行半年普教中便停止，因發現學生的學習差異擴大，上課像教普通話多於中文課。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回應TSA測試中學生語文水平低時指出，近年不少學校推行「普教中」，用普通話教中文，老師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漢語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凡此種種，教育局可曾正視，可有交代？這也許是當局沒有公佈普教中成效的原因，可是巨額撥款已通過了。

關於香港的教學語言政策，不得不追溯至一九八二年《香港教育透視國際顧問團報告書》，其中關於教學語言的說法，對於後來的相關政策有很大影響，報告書中指出「母語是教與學的最佳語言」，認為廣州話是香港學生的「心中的語言」，有助於學生的學習。繼續堅持推行普教中的教育當局，當中應該有對語文有相當研究的學者，應該明白言與文不同，不可混淆，學好普通話，不等於提高了學生的語文水平。普通話並非大部份香港學生的母語，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是否要改變學生的心中語言？改變其母語？對於接近百分之九十七本地人口採用的語言，稱其為方言，而要加以改變，那是對於本地的語言、對於本地文化的不敬。

摧殘文化「普教中」

潘國森（語言學人、香港作家協會副主席、廣府話保育協會會長）

一、基礎資料與摘要

「普教中」，是「普通話教中文」的簡稱。推行之目的，在於要全香港所有中學、小學、幼稚園都必須使用「普通話」作為中文科教學用的口語。然後由「普教中」推廣到用在其他所有術科，例如傳統屬「理科」的物理、化學，以及「文科」的歷史、地理等等，都用普通話講課而棄用過去一直使用的廣府話（俗稱廣東話、粵語）。

「語常會」，是負責推動「普教中」的法定公營機構。全名是「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Standing Committee on Language Education and Research），一九九六年成立。商人田北辰先生（現為香港立法會議員）是前任主席，現任主席是程介明教授（前香港大學副校長）。

「教統會」，全名「教育統籌委員會」（Education Committee），是一個「非法定機構」，一九八四年成立。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先

生當過主席，現任主席是鄭慕智博士。名義上該會「向教育局局長提供意見」，包括「整體教育目標和政策」，以及「推行其建議的先後次序」等。因為「教統會」還會「向教育局局長提交報告和建議」，局長自然要鄭重「參考」（或可以說照着辦），所以「教統會」實際上指導教育局的工作！比較起來，「教統會」當然比「語常會」大得多。

現時在推動「普教中」的理由有許多謬誤，先列舉出來。下文再逐一詳細解說：

（一）田北辰先生的誤解

田君在二〇〇七年（時任「語常會」主席）指出：「研究顯示學校若能在足夠師資、專家支援等有利因素配合下推行普教中，學生的寫作能力會有改善，可達致『我手寫我口』。」並說：「普通話教學將是大趨所勢，但目前不是所有學校均有足夠條件實行，不宜硬性規定全港落實的時間表。」（見二〇〇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文匯報》報道）

田君不是專業寫作人，其中文寫作能力可以比擬為「星期日司機」（Sunday Driver）。試想一個平庸的司機，憑甚麼跑去駕駛

學院指導教車師傅和學員怎樣做一個好司機？他誤以為「我手寫我口」就是「中文寫作」的最高境界，顯然沒有了解清末詩人黃遵憲（一八四八至一九〇五）的原意！

至於田君所說「研究顯示……寫作能力會有改善」甚麼的，只能是田君這個「外行人」誤信個別大學教師失實言論的結果。為了證明寫作時「用普通話口語入文」是唯一正確的修辭法，有個別教師虛構了「標準中文」、「正宗中文」的說法，將某些他們看不順眼、出自香港人手筆的文章標籤為「港式中文」。

下文會進一步討論當中的失實和誤導。

（二）程介明教授的江湖市井恐嚇用語

程介明教授在二〇〇〇年（時任香港大學副校長、教統會成員，現任語常會主席）曾經公開聲稱：「香港以廣東話作為母語教學，只有死路一條，全世界好少地方以方言作教學語言，母語政策好似自殺政策！」（見二〇〇〇年四月一日《蘋果日報》報道）

程君被委任為「教統會」成員、「語常會」主席，筆者個人理解由於他是一位大學教師（負責教學），也是「教育行政人員」（學校的高層，可以過問其他同事怎樣講課和講甚麼內容），卻不是為了

他有「未卜先知」的超自然能力！

甚麼叫「死路一條」？

這顯然不是程君直接參與「語文教育」的體會，也不是做過些甚麼「語文研究」的學術結論。卻似「綠林好漢」裹脅良民，或是「江湖術士」棍騙愚婦的恐嚇言語！

程君不知道「普通話」也是中國方言，屬於北方方言的一支，以北京話為主的「人工方言」。中國自秦漢以來，二千年「書同文」（全國用相同的漢字）而「語不同聲」（各地用不同的漢語方言），無損九州宇內、大江南北中國人的國族認同和團結。

程君的教育哲學，可以用「唯利是視」四字概括，當代教育理念應該是「在學校教會學生一輩子所需的知識技能」，還是「讓學生掌握自學能力，離開校園之後因應自己的人生路終身學習」？

這個「程氏死路一條假說」，還缺了大量論證工作！

作為負責任的大學教師，請提供數據和證據！

（三）「學好中文寫作」與「學好普通話應對」的異同

筆者在二〇〇七年見到田君「我手寫我口」的謬論之後，開始撰文評論這場「普教中運動」背後的錯誤想法，以及論證之失實。

人類大部份現存「語言」(language)都有「口語」(verbal language)和「書面語」(written language)之分。當然有少數例外，如在成吉思汗以前，蒙古語只有口語而沒有文字。今時今日學習任何一門語言，都要口語和書面語並重。二者有關，但不完全對等。

筆者公開明確反對「普教中」，常有人誤解，以為凡是反對「普教中」，就是「反對學好普通話」、「抗拒使用普通話與中國其他地區人士溝通」。實情是香港學生要學好普通話口語，該是中小學「中國語文科」以外的另一個科目。

現時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承認最高的普通話學歷資格，是「普通話水平測試」(漢語拼音為 Putonghua Shuiping Ceshi，縮寫 PSC)。這個語言考試制度，於一九九四年由「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國家教育委員會」和「廣播電影電視部」共同頒佈。

合格成績分三級，可獲頒「普通話水平測試等級證書」。九十二分以上是一級(標準普通話)，八十分至不足九十二分是二級(比較標準的普通話)，六十分至不足八十分是三級(一般水平的普通話)。不足六十分算「不合格」。現時一般要求播音員、節目主持人、影視話劇演員有一級以上水平，教師、大學生二級以上，公

務員、社會公共服務行業從業人員三級以上。

這個測試只考口語，不考文字書寫或閱讀，亦不限學歷，只有小學程度的成年人也可以報考。考試範圍和內容亦很公開，翻來覆去都是那些字詞和範文。中國內地中小學實行「普教中」，教師要有「二級以上水平」，但是有「二級以上水平」不代表有能力在中學、小學教授中國語文科。

如果程君擔心「廣東話教中文」會害得香港學生「死路一條」，那也不怕，他們可以去報考「普通話水平測試」。有語言天份的朋友，只要全心全力準備，幾個月苦練就可以考得好成績！可是，在香港學校推行普教中，並不能為學生爭取到豁免參加「普通話水平測試」便得到合格的評級。所以，將來即使全面推行「普教中」，那十二年學習無助於香港學生獲得中國官方承認的普通話資歷！

程君忘記了告訴家長和同學，你們要得一條生路，除了盲從「普教中」以外，還得要自救，自己報考「普通話水平測試」！

二、冤枉學生「不正宗」

二〇〇九年，筆者發表了一篇雜文，題為《夜晚不正宗》（見六月一日《文匯報》）。

事緣有網友投訴，有學生見自己作文作業凡見「夜晚」一詞，

都被國文老師用紅筆劃掉，請教老師何解，老師說「晚上」才是「正宗中文」的用詞，「夜晚」是廣東話，不正宗。

於是我在拙文中列了四個名作家的用例：

（一）「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掇一個香桌兒出來。」（《水滸傳》第四十五回）

（二）「夜晚路上有虎，須要小心。」（《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

（三）「只是園裏空，夜晚風冷。」（《紅樓夢》第七十五回）

（四）「初秋的夜晚，星光葉影裏陣陣的小風。」（老舍《駱駝祥子》）

前三例出自傳統章回小說，第四例是上世紀三十年代作品，被譽為「現代白話文小說的經典作品」。這樣也「不正宗」？

按筆者的理解，香港出現這個「正宗」與「不正宗」之辯，當是「普教中」的「副產品」！

說到所謂「正宗中文」，請恕筆者孤陋寡聞，不識出自何經何典，或是哪一位偉大作家、哪一位語言學大師的尊口（口講）貴手（手寫）？

老師與「老師的老師」（大學裏面任教，當中小學國文老師的老師那些教授博士），為了證明「普教中」好，「廣教中」（廣東話教中文）不好，當然要找「證據」。當一些以北方方言為母語的大學教

師，要找我們嶺南文人的「錯字錯詞」，自己卻讀文言文不多，看見不熟眼的，就當作是「廣東話口語入文」，就打成「不正宗」了！

三、「標準中文」來自專制的「學術霸權」

香港吃「普教中」這行飯的大學教師，可以怎樣證明「普教中」的成效和優勢？

辦法是在一間學校入面，分開「普教中」和「廣教中」的班，過了一段時間用考試、測驗來評分，假如「普教中」班的成績勝過「廣教中」，就算大功告成。但是國文老師給學生的作文功課評分，常有主觀成份，怎麼辦？

那就只能在修辭方面定奪，根本沒有評估學生作一篇文的成績有何差異。只要有目標、有計劃的證明「普教中」班的學生用字正確而「廣教中」班的學生用字多錯就可以了！

於是有大學教師「創造」出「標準中文」和「港式中文」，前者對而後者錯。「普教中」班專門教「標準中文」的修辭，就可以證明「普教中」比「廣教中」優勝。

現在從石定栩等編著的《港式中文與標準中文的比較》（香港教育圖書公司，二〇〇六年）一書找出兩個例子。石著聲稱「錄取」和「責怪」是「標準中文」；「取錄」和「怪責」則是「港式中文」，

在「標準中文」不能成詞。「不能成詞」自然是錯！

筆者沒有上過任何一家大學中文系的本科課程，從來不知道「取錄」和「怪責」是「港式中文」。

做學問，應該堅守「有一分證據，講一分說話」的大原則。還是看前人用例吧！

《清史稿●王安國傳》：「上科鄉試後，頗聞諸學臣因錄科例嚴……或縱容子弟家人乘機作弊，致取錄不甚公明。」又《清史稿●選舉志》：「嘉慶中……詔曰：『近日士子獵取詭異之詞，以艱深文其淺陋，大乖文體。考官務各別裁偽體。支離怪誕之文，不得錄取。』」

這兩則資料都在談論清代的科舉取士，王安國的「取錄」與嘉慶帝詔書的「錄取」是「同義詞」（只需有一義通同，不必完全相同，否則就不需要兩個不同的詞）。

二十世紀中國語言學界用新的術語研究古文，認為古代漢語（近似文言文）多用「單音節詞」（即是單字詞），現代漢語（近似白話文）多用「雙音節詞」（即兩字詞）。「錄」和「取」本來就是有「一義通同」的同義詞。「錄」是用筆寫下，記錄了某人的名字，就可以引伸為選某人入圍。「取」是用手拿，引伸為選中某人。

「錄取」和「取錄」，按「現代漢語」的語法分析，叫作「同義並

列」。在「古代漢語」許多時原本容許不同的「詞序」。王安國是清代的榜眼，他對皇帝講「取錄」時，香港還未開埠，何來甚麼「港式中文」？石君等大學教師，沒有興趣了解古人用詞，只因從小到大只知「錄取」而未見過「取錄」，碰巧香港民間廣府話口語講「取錄」多過「錄取」，便輕率判為「港式中文」。這樣「普教中」，只是人為的「學術霸權」！

「責」是責備，「怪」是怪罪，都有批評別人犯錯之意，也是「同義詞」。

「責怪」和「怪責」都是「同義並列」的「雙音節詞」。「責怪」一詞唐朝詩人已用。盧仝《聽蕭君姬人彈琴》：「孔子怪責顏回瑟，野夫何事蕭君筵。」

一千年前的古人在用「港式中文」？

不要開玩笑了！

「普教中」優越的真相在此！

簡而言之，就是個別不是粵籍的大學教師，讀我們嶺南文人寫的文章，看到未見過的詞序，以為是「錯誤的港式中文」！

常言道：「書有未曾經我讀。」所謂「標準中文」，只是少讀古文而支持「普教中」的教師胡扯，自封「標準」而已！

四、「我手寫我口」的真相

筆者估計，田君大談「我手寫我口」，只是拾人牙慧，從某些大學教師處聽來而沒有讀過原典，否則，他不會亂用。

「我手寫我口」，出自黃遵憲《人境廬詩章》的〈雜感〉，原詩甚長，節錄如下：

「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口流涎。沿習甘剽盜，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摶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明窗敞流離，高爐熱香煙。左陳端溪硯，右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

黃詩人講「我手寫我口」，是針對時人好古，凡是儒家經典裏面沒有用過的字，都不敢拿來寫詩，詩人還直言諷刺「俗儒」，見到古人棄如糟粕的用詞，卻喜歡得「流口水」（口流涎）！詩人要打破當時的惡俗。以「我手寫我口」來拒絕被古人古書「拘牽」。

當「語常會」田君、程君還是小孩子的年代，香港文人常用所謂「三及第文體」，即是文言、白話與廣府話口語交互運用，不受前人「拘牽」。這樣是為了修辭的變化。

以對應英語「no」為例，白話文用「不是」，廣府話口語用「唔係」，文言文用「並非」。至於英語片語的「No, not this way.」，白話文可用「不是這樣」，廣府話口語「唔係咁樣」，文言文「並非如

此」。

但是白話、文言、口語的界線並非一定清晰，有人以為「是」才是正確的書面語，「係」則純屬廣府話的口語。實情「是」與「係」，亦是「一義通同」的「同義詞」，交互運用可以增加修辭的變化。

《紅樓夢》第二回：「雖係鐘鼎之家，卻亦是書香之族。」作者在這裏用了排偶句，「係」與「是」正正是可以通用的「同義詞」，只不過《紅樓夢》一書用「是」多而「係」少。假如掩蓋了作者和作品的名字，摘取一個小段落交給我們香港吃「普教中」這門飯的中文科老師，說不定曹霑曹雪芹會給老師訓斥為用了「港式中文」呢！

假如「語常會」的田君、程君在行使他們的職權時，輕率的判定某家大學中文系的老師用詞「正宗」、「標準」，那是長官意志干預學術。「政治爭議」只能「政治解決」，不是我們民間讀書人有能力扭轉。

甚麼「晚上正宗，夜晚不正宗」、「錄取標準，取錄不標準」，都是人為製造的「學術霸權」。現在「語常會」推「普教中」。只准以現今普通話口語入文，說甚麼「我手寫我口」，無非由黃遵憲大力反對「六經拘牽」，改為「大學教師自封標準中文拘牽」！

五、向「語常會」諸公下戰書、約比試！

「學術爭議」應該用「學術解決」。

一九五六年，周恩來簽發的《國務院關於推廣普通話的指示》有謂：「漢語統一的基礎已經存在了，這就是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的普通話。」

這段文字明確指出，普通話口語也是「方言」，「以北方話為基礎方言」。至於書寫則「以典範的現代白話文著作為語法規範」。

「語常會」諸公在大力推動「普教中」的過程中，用了許多無關學術的意見低貶我們粵籍嶺南文人的寫作水平。你們不喜歡讀古書，卻拿周恩來總理的講話「狐假虎威」。

「普教中」背後的學理錯漏百出，輕率花費數以億計的公帑去硬推，一則破壞學術自由，二則扭曲語言歷史，三則摧傷地方文化。

筆者寫作時，主要用廣府話母語思考，自問筆下修辭不算錯得很多。既然「語常會」諸公認為用普通話思考、普通話口語入文就可以寫得好文章，並寫得比我們歷代講北方官話不甚流俐的粵籍文人更好。那麼，筆者代表「廣府話保育協會」公開向「語常會」下戰書、約比試。

請「語常會」派代表示範「普通話入文」的威力，與筆者交換作品批改。

「語常會」代表找到筆者錯多，算「語常會」贏。

筆者找到「語常會」代表錯多，算筆者贏。

不論「語常會」派多少人，筆者就是匹馬單槍，單打獨鬥亦可，車輪戰亦可。

這樣，總勝過由「語常會」領導人以長官意志、不提證據而指派誰是香港中文寫作權威，再由這個「學術霸權」任意判定誰的中文水平高、誰的中文水平低。

小結：「普教中」摧殘文化

今時今日，「語常會」推動的「普教中運動」在以下層面摧殘香港地區的文化：

（一）行政干預學術

「語常會」的田君、程君親自向年青人教授中國語文科的經驗不足，以中文寫作的能力成疑，卻以道聽塗說的歪理（我手寫我口）、順口雌黃的武斷（死路一條）去證明「普教中」的優越，是外行人領導內行人，難以服眾。

（二）製造學術霸權

「語常會」舉不出任何由具署名作者的文字論述，去證明「普教中」的實效，以及為甚麼中國作家只要用「普通話」口語入文，就可以寫得出好文章。反而，筆者可以列舉許多位當代名作家的忠告，要提升中文寫作能力必先多讀古文、多背古文。（見拙著《甲級中文》引述季羨林、巴金等名家的言論）

我不能因為哪一位大學教師得到「語常會」認可，就將其當成「中文寫作的唯一權威」。

（三）扼殺創作自由

「普教中」的內容，不單止是用「普通話教中文」，還包括指令教師限制學生日常寫作和講話時的任何用詞，不准用方言口語，不准用「普教中」專家未見過的用詞入文，否則當錯扣分。

盲從「普教中」教師的學生得分，從古今名家的作品吸取養份的受罰。

結果是，名演員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

為「普教中」滅範文

潘國森

一、因何取消範文？

「範文」，指原先在香港中學會考要求學生必讀的指定課文，一般約二十餘篇。數十年前，課程規定文言文（即所謂古文）多過白話文，例如諸葛亮《出師表》、蘇軾《赤壁賦》之類的古文。因為試題有可能要求考生直接評論有關範文的內容或作意，所以歷來考生都會背熟所有古文範文。這個傳統行之有效數十年，但是「考評局」（全名是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在二〇〇七年的一屆中學會考起，改革了考試內容，廢除了幾十年來的範文。

廢除範文的結果，是香港中學生不再「被迫」背誦古文。數年下來，教師和社會大眾（主要是雇主和學生身邊的長輩）發現近年香港年青人的中文水平大幅下滑，一般學生於許多常用字、諺言、成語、淺白詩歌都沒有學過！

教育當局終於將「重設範文」放在「議事日程」，即使能夠以最快的程序撥亂反正（討論和籌備需時），已有大約十屆學生受害！必將造成嚴重的文化斷層！

這事跟「普教中」有沒有甚麼關係？

從表面看來，廢除範文可能跟長官意志有關，二〇〇〇年羅范椒芬女士（現任行政會議議員，時任教育統籌局局長，當時未實行政治問責制）公然「批判」她初中時的西史老師要同學背書，令到她對西史科失去興趣云云。然後我們見到一些大學教師研究背書對學生成績的影響，很快就有在香港進行的研究指出，背書損害學生的學習興趣！

我們可以橫向比較，看看海峽兩岸的中學怎樣教中文。中國大陸和台灣的中學生都要背古文，考試亦要考古文。中國大陸當然「普教中」，台灣也是「國教中」。台灣社會的「國語」，跟中國大陸的「普通話」大致相同，都是以北京方言為主，只因海峽兩岸分治幾十年而令「普通話」和「國語」有細微差別。

人家「普教中」要背古文，為甚麼香港「普教中」不背古文？

巧合？

有計劃？

二、文史教育之「去中國化」

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第十四任港督盧吉（一八五八至一九四五，一九〇七至一九一二年在任）在任內成立香港大學，當時就提到香港這第一所西式大學，也是中國第一所西式大學是「為中國而立」。香港大學的校訓是「明德格物」，典出《大學》，可以作為全中國所有大學的總校訓。

語常會現任主席程介明教授曾任香港大學副校長，他是怎樣看香港的基礎中國文史教育？

程君對當代香港中學的中國歷史教育甚為不滿，並將其寶貝兒子上中國歷史課時悶得睡覺的事「娓娓道來」！程君不擔心兒子斷了中華文化的根，反而以「程生聽史好安眠」作為廢除中國歷史科的「有力證據」。結果現時香港許多中學不設中國歷史科，將香港年青人原本要學的一丁點兒國史皮毛，都拼入到「初級人文學科」(Junior Humanities) 去。

以程君這樣一位輕視華夏文明傳承的家長出掌「語常會」，筆者有理由憂慮會對香港大中小學的「語文教育」和「語文研究」產生惡劣影響。

這樣的語文教育政策、國史教育政策，恐怕連台灣陳水扁主政

時代的「去中國化政策」尚嘆不如！程生上國史課時睡覺，會不會《程氏家訓》入面，有：「大學入歷史系死路一條」之句？

三、「普教中」難容古文！

要證明「普教中」比「廣教中」優越，過去一代又一代香港中學生必讀的「範文」必須清除！

何解？

只要香港中學的國文科多教古文，明眼人都知道「廣教中」比「普教中」優勝。

原因很簡單。

今天「粵方言」（包括香港九成以上居民講的廣府話）的「口語詞」，比「普通話」的「口語詞」更貼近「古代漢語」的「書面語」！

現時「普通話」的名詞多用「雙音節詞」，「廣府話」口語和古文則多用「單音節詞」。

且以對應英語的「eye」為例。

普通話叫「眼睛」，廣府話叫「眼」，也講「目」。

我們讀過點古文的香港人，都知傳統典雅的四字成語說到人的「eye」，用字非「眼」即「目」，如「眼高手低」，「眼花撩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目中無人」，「目迷五色」，「目無尊長」等等。

哪有「眼睛」的位置在？

如果香港推行「普教中」而不廢古文，就連在學的小孩子都能看清事實的真相！

中國大陸的「普教中」和台灣的「國教中」為甚麼無需廢除古文？

因為主政者不必強行證明「廣教中」如何不是！

四、廣府話九聲、普通話四聲

常言道：「屁股決定腦袋。」意指一個公職人員的言論會受到自己的身份影響，你人坐上某個位置，就需講這個職位要講的話。田北辰先生雖然有責任推動「普教中」，但是也沒有埋沒良心，曾經指出學生學習經典詩歌時，以廣府話更有效。

一般認為現時漢語有七大方言區，普通話屬「北方方言」，廣府話屬「粵方言」。中央官來自全國各地，要有相對劃一的語言，以便溝通，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這個我們以廣府話為母語的香港粵籍文人非常理解，只是不必強制要求全部香港年青人的普通話水平，都達至「一級」（九十二分以上）。

粵方言除了用詞比普通話更貼近古代漢語之外，豐富的聲調是另一個優勢。今天粵方言仍然保留較多入聲字音，此外閩方言和客家方言亦多入聲，只是聲調總數不及粵方言多。所以用粵方言、閩

方言、客家方言學唐詩都有優勢。普通話卻「入派三聲」，即是指原有的入聲字音，都轉讀到平、上、去三聲。

原來中國文字一字一音，前賢分成平、上、去、入四聲。我們廣府話於這四聲都再分陰陽，再加中入聲就是九個聲調。普通話（北方方言）因為上、去二聲不分陰陽，就只有陰（平）、陽（平）、上、去四聲。

缺了入聲字音有甚麼影響？

入聲字最能表達沉鬱、悲涼、空闊、冷落的意境。

且看世傳由唐代大詩人李白填的一首《憶秦娥》詞：

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

樂游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

這個詞牌的格律規定上下片都是三仄韻，一疊韻，而且要用入聲韻。即是說詞中咽、月、月、別；節、絕、絕、闕各個句腳而押韻。

我們活在二十、廿一世紀的中國讀書人，如果懂得用廣府話來唸這首詞，就可以感受到原作的沉鬱頓錯。

普通話就不成了！

咽是陰平聲，月是去聲，別、節、絕是陽平聲，闕是陰平聲。

類似的例不勝枚舉。

上聲去聲不分陰陽有甚麼影響？

原本香港小孩不會混淆「再會」的「再」和「存在」的「在」，因為在廣府話「再」是陰去聲，「在」是陽去聲。涇渭分明！

有了「普教中」之後，就開始有小學生分不清「再」和「在」！因為兩字在普通話都是去聲，普通話去聲不分陰陽！

類似由「廣教中」改「普教中」而產生的錯，陸續有來！

田君、程君都是外行人，當然沒有能力了解明白！

五、願學普通話，未敢毀長城

今天香港人經常會聽到「生物多樣」(bio-diversity) 的說法，指我們人類差不多是地球生物圈的主宰，應要保育不同物種。因為每一個物種都有其存在價值，一種動物、一種植物滅絕了，就不能再生。一個物種滅絕之後，對整個地球生態環境的長遠影響通常都難以即時準確估計。而且，其毀滅不會等到最後一個成員死亡，只要那種動物、植物的「活口」太少，就不能傳承。中國人是主要食豬肉的民族（少數回教徒是例外）。現在我們主要吃源自外國入口的「白皮豬」，但不必把中國原產的黑毛豬都宰光而不留一口。

我們中國人引以為傲的華夏文明，是一個多元文化。且不說我

們廣府話是今天其中一支最有資格遙接唐詩宋詞文學道統的方言。即使普通話比廣府話有任何語言學上的優點，廣府話仍然值得我們保育。

不為甚麼，只為她是我們的母語。

如果我們香港的年青一代立志到北京當個中央官，又或者要跟中國十多億操普通話的同胞打交道，當然要能講能聽普通話。但是學好普通話有許多更有效的途徑，我們嶺南人無需自毀長城，棄廣府話而就普通話。

近時，社會上充斥猜忌的意氣和作風。

筆者總結本文，也來個「利益申報」。筆者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聽國語時代曲學國語（跟今天我們談論的普通話大體相同），從沒有學過漢語拼音方案。頻年以來，與海峽兩岸的朋友交流，常被指「普通話（國語）好得不似香港人」。寫作時向來以廣府話母語思考，海峽兩岸的文友、讀者都看得明白。當然，筆者學「普通話／國語」的過程完全不涉及甚麼「普教中」，只是孤證特例，未必適合所有香港年青人。

香港人實在不必為了學好普通話，而放棄我們以廣府話母語學習和傳承華夏文明的優勢。

普教中

陳惜姿（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

普通話教中文

小兒明年升小一。學校那邊要我們選擇，他要入普通話班還是廣東話班。那是中文科的教學語言，其他科目一概用廣東話教。而廣東話班則每星期還有普通話堂，學學拼音等。

我最初不假思索就選了普通話班。原因是：若他念津校，根本沒這項選擇。但現在這學校是要付學費的，當然要「好一點」的教育，而當時我直覺認為用普通話學中文應該比用廣東話好。

事實上，這學校有三班普通話班，廣東話班只有一班。可見大部份家長都所見略同。

語常會那邊更宣布，未來連津校都會陸續轉用普通話教中文，彷彿是大勢所趨，「唔讀就笨」。

但在交表之前，我們改選了廣東話班。

思前想後，和不少這校高年級的家長談過，他們說，普通話班

的討論氣氛，明顯受語言影響，大不如旁邊的廣東話班學生。

小小的小一生，既要學「綠油油的」普通話怎說，還要用它來作句；要學寫「運動」二字，又要學其漢語拼音，看來不是那麼容易。

這又回到一個老問題，母語是我們最擅長的語言，用來學習自然得心應手。就算老師是內地人，普通話是他們的母語，傳授知識者沒問題，但香港小孩子要追得上則難了。

有個家長更具體的問：你能否接受孩子不懂大部份詞語的廣東話讀音，而只懂普通話的嗎？

另一個迷思則是：用普通話學中文能改善寫作。這個我有點經驗，我改過本地生和內地生的功課，本地生的文章，顯然不及內地生流暢。廣東話思考對寫文章造成的傷害是明顯的，但內地生的文章有時也受到共產黨語言的影響。結果，能寫出好文章的人數比例，幾乎相同。

艱難的普教中

開學未到一月，已隱隱然感到升中選校的壓力。我沒有像很多家長一樣，加入子女同學家長的 WhatsApp 群組，好處是耳根清

靜，壞處當然是有可能錯過一些資訊。但我覺得無論有幾多資訊都好，始終不及認真看清楚自己兒女重要。學校多好都沒用，首先它未必會取錄你，就是取錄了，子女也未必適合，強求沒用。

學校簡介會通常有幾個招徠，升大學率有多高，課外活動有多繽紛，家長教育做得有多好……到底哪一項元素最值得關注？

不知有幾多「仔」像小兒一樣，那麼難搞。他不是順服的人，不是你叫他向東便向東，叫他向西便向西。他明白升中的重要，知道要努力，但肉體軟弱。

所以一間學校入大學率有多高，目前階段並不是最重要，這對他來說太遙遠了。而且世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這美好的數字背後是要付出努力的，這很可能代表催谷。自問孩子不是甘被催谷的人，便不敢高攀。

我反而留意學校的課程，希望找到一間學校，讓兒子讀得上，令他喜歡上學。中文科是他的弱項，他不能再用普通話讀中文。

而事實上，香港中小學中文科的語言政策令我非常困擾。目前大部份小學都用普通話教中文，但到中學，特別是高中，未必很多中學能堅持。以目前高中中文科的艱深程度，學生用母語（廣東話）學習已如此吃力，更遑論用普通話去學！相信教師用普通話教

古文也會感到非常辛苦。

有些學校初中用普通話，高中轉回廣東話。就這樣轉來轉去，所謂何事？對誰人有好處？學生的普通話程度是不是整體提高了？中文程度又有沒有改善？當局有做過調查嗎？

再談普教中

香港號稱國際城市，跟人溝通的能力十分重要，我們不能故步自封，普通話一定要學。但是否要用普通話來學中文，便見仁見智。

正如要用英文來學生物、地理，你要有基本英文能力才行。很多學生因為英文弱，連帶所有用英文學習的科目都拖垮了，殊為可惜。母語教學政策雖然引來極大批評，後來又要大刀闊斧地「微調」了，但我相信那總能幫助一些學生。

普教中來勢洶洶，正為孩子找小學的朋友慨嘆，現在想找一間以廣東話教中文的小學，原來那麼難。但我真不認為普教中適合所有學生，尤其中文能力本已不高、學習動機本已不強的人。

小學是發展思維的階段，小學生是罕見會在課堂裏舉手答問題的人類。一旦實行普教中，課室的互動減少了，老師執教戰戰兢

兢，只管把拼音讀好，照本宣科好了。要學生用普通話回應更是困難，只能聽老師單向傳授。大家都是用第二語言，教與學自己的母語，隔靴搔癢。

另一問題，是師資。本地教育學院中文系學生，為了應付普教中，花上極大的心力應付普通話基準試，甚至要回內地上普通話沉浸課程。他們本來可以用更多時間研究教學法，想出更多有趣的教案，但不行了。跟他們競爭的，是來自內地、母語是普通話的人。

我聽聞，有些內地大學畢業生，本科不是讀中文的，來港花一年念個對外漢語教學碩士，再報讀中文科小學教育文憑。完成後，便有機會得到本地小學校長垂青，獲聘為中文老師。

若論普通話能力，本地土生土長的中文系本科生，很難與之匹敵。若論中文水平，卻未必比他們差。這是否本末倒置？

香港書面語與三次中文運動

陳智德（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一）

有許多香港作家的語文風格，是我一直留意，覺得十分精彩的，如董橋的清雅流麗，劉紹銘的沉厚睿智，蔡炎培的機巧靈動，黃碧雲的樸拙餘韻，締造了香港文學中的傑出語言，他們有的受惠於傳統舊學，有的轉化五四文學和西方文學語言，有的從粵語汲取民間語言智慧，造就香港中文書面語即粵式書面語那古雅而靈活的優點，香港文學作品在內容和題材以外，首先吸引讀者的，本是其語言質感。

從學科或教學層面來說，文學和語文分屬不同專業，但最終不能截然二分，從創作而言，語文當然也是文學作品的重要一環。香港的語文環境及其讀寫教習傳統構成了香港文學的語言面貌，這是香港文學語言上的優點，卻又是備受誤解的一點。曾幾何時，有不少外地讀者以為香港人只會說廣東話而不懂「寫中文」，或以為香港作家全用廣東話字彙入文寫作，這是由於地域和文化阻隔使然，

當中的誤解不難破除，但不知甚麼時候開始，香港內部也逐漸混淆語文和文學的重點，把香港學生的語文問題歸咎於粵語環境，以為學好普通話，另一種通行範圍更廣的口語便可解決書面語中的語文問題，都是忽視香港固有的語言環境，以優點為缺點的結果，當中的誤解卻不易說清。

香港教育界一直奉行以粵語教習「國文」的傳統，發展出完整的粵語書面語系統，即我們能夠用粵音朗讀現代中文「的、了、呢、麼」等口語中不使用的語彙，也能夠用粵音朗讀古典文獻中的「之、乎、者、也」，口語中不使用，卻能轉化在書面語之中運用。我們都習慣口頭上說廣東話，寫作時以書面語思考，閱讀時以粵音默唸書面語。有時，一些大眾刊物以廣東話口語入文，個別一兩句是可增加親切感和有地道、「生鬼」之效，但通篇是廣東話口語的文章，閱讀時反而是不暢順的，因我們本就習慣以粵音唸誦規範的書面語。

香港的中文教習，本是沿襲以粵音唸誦文章的嶺南教育傳統，嶺南地域學子一向都以粵語朗讀或吟哦古典詩詞，書面文字亦有不少具書面讀音及口語讀音之分。香港教育界多年來奉行嶺南中文教習傳統，使香港粵語形成粵式口語和書面語兩大系統。如果香港粵

語只限於「方言」上的運用，香港人寫作書面語將面臨更多「轉換」詞彙的困難，但香港粵語本來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的傳統，在學習中文的過程中，我們本來就習慣轉換書面詞彙。

把粵語等同於俚俗，以至視粵語比英文次等的想法，是殖民地時期的扭曲想法，語文就好像膚色和人種一樣，不同國家的語言和同一國家中的不同方言之間，都應該是平等的，不應有高等次等之分。在語文教育而論，「言」、「文」分別書寫的香港書面語本為嶺南語文教育傳統，絕不應視為弱點。「言文分途」實為香港書面語的優勢，普通話在生活上當然應與粵語並存，但在學習「中文」的層次上，以粵語學習傳統書面語（文言文）和現代書面語（語體文）的粵語音讀、訓練「言文分途」的書面語寫作，既屬嶺南文化傳統，亦是中國語言的重要組成和運作部份，香港文學作品作為具體「言文分途」的語言實踐記錄及藝術深化結果，對其研習和承續，正有助擴闊學生的語文觀念，豐富中國語言的既有成份。

我本不是研究語文的專家，只作為讀中文系出身的香港作家，有感於語文現象之扭曲。香港傳統上以粵語教習語文，本是香港的一種優勢，香港作家在此語言環境下造就古雅而靈活的語文，參與締造現代中文書面語之多元風格，意義超乎本土，維護粵語讀寫傳

統絕不只是一種地方考慮。普通話作為全國通行的口語，香港學生有必要好好學習，但以普通話教習語文，並非最佳的語文教學方式。青年學子語文程度下降本是全球趨勢，香港學生的語文問題亦關乎互聯網使用習慣、閱讀風氣不足等，而不是因為使用粵語教學。「普教中」的結果是將另一種口語（普通話）取代本來就包括口語和書面語成份的香港粵語作為中文教學語言，對學生只會做成語文混亂。

大家心裏都明白，「普教中」的要旨本不在於口頭所宣傳的語文教學所需，其實家長們又何嘗不知？所謂大勢所趨，出發點本不在乎教育，那趨勢我們無論如何解說都不會改變，多說無益，但始終不能永遠緘默，我不單擔心將來的香港學生不懂使用粵音朗讀「的、了、呢、麼」和「之、乎、者、也」，更擔心香港文學的前景，董橋、劉紹銘、蔡炎培、黃碧雲等人的作品，作為香港現代粵式中文書面語的巔峰之作，會否成為失傳的絕響？正如香港的粵語，蘊含了廣東話口語和現代中文書面語兩大成份，缺一不可，香港的語言，同樣包括口語的傳統和文學的傳統，粵語、香港中文書面語、香港文學、香港文化和語文教育，本是環環相扣的問題，彼此如同命之鳥，粵語的憂思，也是香港文學和文化的憂思。

（二）

一九六八至七一年間的「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在香港學運史上稱為「第一次中文運動」，針對殖民地政府長期以來在法例和教育等層面，貶低中文的地位，形成整個社會「重英輕中」趨勢，青年學生及其他有識之士都認為這是不合理的，呼籲改革法例和教育，發起大規模的運動，包括公開論壇、發表聲明、告全港市民書、簽名運動，以至杯葛市政局選舉等，最後使港府於一九七一年透過委員會發表的報告，提出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

我最初讀到香港學運的歷史，是源於對香港文學的興趣，研讀下去，發掘香港文學資料的同時，也讀到不少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史料，例如上世紀七十年代的《中國學生周報》、《盤古》、《七〇年代雙週刊》、《大拇指》等刊物，除了文學作品，也刊登不少有關「保衛釣魚台運動」、「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艇戶事件」和「金禧事件」的報道以至相關文學作品。

我們就這樣在教育建制以外，透過香港文學認識香港學生運動和社會運動的歷史，閱讀更多相關資料後，又回頭豐富了對香港文學的認識。二千年我訪問作家鄧阿藍時，特別問及他在七十年代參

與工人運動的情形，他告訴我，他是「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工人學生聯盟」（簡稱「工學聯盟」）的成員。

「第一次中文運動」本具反殖意味，針對殖民主義引起的不公義語文現象，港府後來逐漸承認中文的法定地位，但重英輕中的教育作為殖民主義的另一核心，未有絲毫動搖，港府一九七八年發表的《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再次引發公眾對重英輕中教育的不滿，學界成立「中文運動聯合委員會」，提出母語教學、針對重英輕中現象，是為「第二次中文運動」。

這運動本由大學生發起，得到教育界和文藝界廣泛迴響，例如當年由中大和港大學生會合辦的青年文學獎，舉辦各種活動呼應。作家如司馬長風、小思、張君默、王亭之（談錫永）、岑逸飛等等亦於報紙專欄談論相關話題，形成很熱烈的共同關注中文教育和文學寫作的氣氛。中文運動的組織者於一九七九年創辦《中運報》，同時由中大和港大學生會成立「中運中學生組」，一九七九年創辦《中鳴》。我家裏保留多份一九八三年出版的《中鳴》，是我讀初中時透過校內的中文學會而獲得的，內容包括書評、作家介紹、社運報道、青年文學獎得獎作品選輯、「中運中學生組」訊息等，印象

非常深刻。

文化和教育都是潛移默化的工作，七十年代的兩次中文運動也許未有真正改變重英輕中的教育建制，因為文化理念總敵不過人們實際和利益考慮時的選擇，但文化理念一旦成形，便會比實際考慮更有生命力，如果它夠堅定，最終會達至對實際和利益的超越。香港的文化、文學和社會運動，實也見證，一切理念的超越，總來自民間潛移默化的推動。

今天重提七十年代的中文運動，不純粹談論歷史舊事，而是希望這歷史能對目前的「普教中」問題和粵語運動有所呼應和提供參考。香港長年以來奉行以粵語讀寫中文的嶺南語文教育，建立「言文分途」的書面語讀寫能力，既能與以北方白話為基礎的現代規範漢語溝通、接軌，也形成吸收嶺南口語古風的香港中文書面語，這不單作為一種中文教育傳統而得到珍視，更是香港過去得以超越殖民主義的分化和矮化政策的重要工具；而二千年代以來香港學生語文水準下降，本是閱讀風氣不足和互聯網使用習慣的全球性影響，不是中文教育本身的問題，故從文化和教育上考量的話，不需也不應放棄傳統上粵語讀寫中文教育而改用「普通話教中文」。香港學

生仍必須學好普通話，但如昔日般設「普通話」科便可，甚至可再加強，香港學生需要更多的普通話老師，加強與中國內地交流溝通的能力，但實在不必要用普通話「教中文」。

「普教中」已於小學廣泛推行，我們都明白這「大勢所趨」式的現實很難改變，這社會如果要從實際和利益設想時，大概不會理會香港的教育傳統，但如果我們肯定文化和教育的理念，它也應該最終超越一切的實際和利益考慮。香港學界由近年「普教中」問題引發帶有深重憂患意識的粵語運動，可說是香港的「第三次中文運動」。

普教中是行政決定，不是專業決定

張婉雯（寫小說，參與動物保護的大學語文導師）

我是一個會講普通話（雖然講得不太好）的中文老師，自小接受的是廣東話中文教育。因此，在普通話教中文的議題上，大概可以講一點個人看法。

廣東話是古代漢語的活化石。許多所謂「口語」的詞彙，例如「行路」、「飲食」、「將」等，都來自古代漢語。翻開《古文觀止》，不會找到「走路」、「吃喝」、「把」等字詞。在白話文出現前，文言文已用上了幾千年，當中累積的文化、美感是我們的寶貴財產。廣東話更接近古語音，用廣東話來讀唐詩，更能體現其押韻、節奏之美。這一點已經有很多人說過；且別說詩詞歌賦，單是應用書信，香港人慣用的格式套語中，已保留了不少韻文古文元素，如「惠函敬悉」、「尚祈示覆，佇候佳音」、「耑此奉達、順頌台祺」、「懇請賜電示知，俾便遵循是荷」等。港台兩地因避過文革一劫，尚能保留這些中華文化基因，內地所尊的「現代漢語」已沒有了這些。假如

用普通話教古文教書信，只能說是捨近求遠，對本來就講廣東話的香港人來說，更是戇居不已。我所負責的課程，大抵以教授應用文為主；在我的班內，若有內地來港的同學，則教書信時，我會用廣東話和普通話分別誦讀相關詞彙，希望讓內地同學在廣東話水平有限的條件下，也能領略一點港台公函之雅之古。

有人認為，懂普通話，書面語能力較好。這話不太對。第一是對古漢語的把握，這一點上文已說過。要留意的是，普通話也有普通話的口語，不是凡講普通話就等如「講」書面語。既說「書面語」，那就是書寫用的，不是說話用的。內地人、台灣人也講他們的口語、粗話和潮語，口語粗話潮語就不是正規書面語。我看內地兒童動畫，裏頭的大灰熊自稱「俺」，不是「我」。「俺」就是活潑的普通話口語，與大灰熊粗獷魯莽的形象非常配合。《後宮甄嬛傳》第七十集皇后這樣說：「她喜歡嚷嚷本宮作側福晉的事，又看不上侍妾，那本宮就抬舉她一回……添了這麼個兒媳婦，是誰給誰添堵呢。」話裏透着陰險的得意。這是對白，是口語，跟講語法、講邏輯、講規範的書面語，是兩碼子的事。

所謂的「規範漢語」，我認為，只是在書寫公文、應用文時適用，因為公文、應用文是為了工作及生活所需而寫，要盡量做到人

人都看得懂，故此必須有一個較統一的規範、模式作根據。而「規範」二字亦可斟酌；港台兩地的公文規範，與內地的公文規範又有不同，內地人的「此致」，跟港台兩地的「此致」，用法不一樣。而應用文既為公眾需要而寫，那麼該地區的習慣風俗自然要納入「規範」的考慮條件。反過來，適當的方言運用，在文學作品中，就發揮不可取代的作用。小說中的人物對話，若全部以「規範漢語」書寫，只怕會淪為「千人一面」的可笑情境。若然小說中人皆「講」書面語，那麼《紅樓夢》中的熙鳳黛玉、《三國演義》中的劉備張飛、《西遊記》中的唐僧悟空，全部都變成公務員或政府機關發言人了。

我是贊成年輕人學講普通話的。多懂一種語言就多一些機會。學懂普通話，能多交內地台灣的朋友，更能了解其文化，可以發表意見，游說他人。要做到這一點，學校可以開設獨立的普通話科，而不是用普通話教中文。用普通話來教一班本來就用廣東話的學生學中文，到最後只怕是普通話學不好，中文也學不好。事實上，香港的中小學，教的已是正規書面語，加上獨立的普通話科，已足以讓同學了解國情，與內地人和台灣人溝通。推動普教中，只怕是行政決定，多於專業決定，讓我們的下一代變成語言的浮萍。

普教中犧牲語文學習

鄧力行（普教中學生關注組發言人）

教育局在網頁文章中指稱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引起社會關注政府是否有意貶抑廣東話的地位，作為大陸同化香港的重要一步。共同語和方言，是其中一種語言的分類方法，而這種分類，可說是政治性的。每種語言本身都有地方基礎，都是地方語言，都是「方言」。而令語言脫離「方言」變成「共同語」的，不是語言本身，而是政治因素，簡單點來說就是由政權指定。所以誰是方言，誰是共同語，本質上就是政治問題，不是語言問題。雖然教育局其後迅速道歉並收回文章，但實際上，當局已推動「普教中」多年，參與的學校也日漸增多，情況值得我們關注。

華文世界統一使用現代白話文，實有必要，否則華人世界之出版物不能互通，將導致文化的割裂和斷層，對學界亦有大害。但在於語言，則大可不必，香港文憑試的中文科口試目前主要還是以廣東考核，但按現在官方將廣東話視為「不是法定語言的方言」，將普通話視為「正統」，全力推行「普教中」的姿態，若長此下去，

相信連口試也變成以普通話考核，廣東話再無用武之地之日實不遠矣。語言的主要功能是日常溝通，廣東話作為大部份香港人的母語以及日常溝通的語言，以廣東話教授中國語文，實在是理所當然的。語文學習，當中包含很大邏輯概念和文化概念的理解，這對大部份學生來說，實在不是一件易事。即使不論廣東話之源遠流長保留古音較多等優勢，以母語教授中國語文科，也絕對是最有利於學生理解中國語文科內容的做法。

以普通話教中文科，實際上就是在一科教授母語語文的科目中，要教師以非母語教授，要學生以非母語理解，是為了學一種新語言而犧牲語文學習，不利表達，障礙理解，更製造「普通話才是正規中文」的錯覺，壓縮廣東話的生存空間。常有論指普通話教中文有利學習語體文，則屬無稽，普通話與語體文實際上是兩回事，當你仔細聽人說的普通話口語，那跟真正流暢簡煉的語體文，根本是全然不同的。若果以為以普通話教中文就能糾正學生以廣東話口語入文的問題，那其實只會引來學生以普通話口語入文的同樣問題。若社會認為有需要加強對學生的普通話訓練，合理的做法應該是增加普通話課的節數，而不是犧牲中國語文科的學習強推普教中。

普教中在香港已推行多年，不少學校的中文科都已經轉為以普通話授課。學校推行普教中的原因，一般都是指以普通話教授中國

語文科能使學生更好地學習中文。然而，就連教育局也承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

普教中為何無助甚至有礙學生學好中文，嶺南大學中文系的陳雲教授已在〈普教中有甚麼可以學的？〉一文從普通話和廣東話兩種語言本身特性的角度詳細說明。而本文則希望從教與學的角度，分析普教中會帶來甚麼問題。

現時，中學中國語文科的內容相當艱深，除了基本的語文理解和表達外，更要求學生對中國文化、中國文學等有一定的認識和體會。尤其在新學制下，所有高中學生均需應考程度相當高的文憑試，而文憑試中文科各卷對於學生的思維能力、文化知識、學養根底的要求，均遠遠高於舊制會考，學生要有效掌握中文科的要求，達到相當的水平，本來已經十分不容易。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實際上就是要教師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教授，學生以他們不熟悉的語言聽講，大大障礙了師生的表達和理解，對中文科的教學效能造成巨大的負面影響。

教學語言，是會大大影響教學成效的。教授本身已不容易表達和理解的內容，最有效的語言，必定是教師和學生的母語。現時即

使是在普遍被認為水平較高的英文中學裏，不少教師依然會在課堂中「偷雞」使用粵語講課，以助學生理解學科的內容，可見在事實上，母語才是最有效的教學語言。香港的中學教育是普及教育，學生的語言能力差距極大，強迫語言能力不強學生以非母語去學習中文科，實際上是在摧毀他們考好中文科的希望、扼殺他們對中文科的興趣，禍及一代香港人的語文水平、有礙於中國文化的承傳。

有不少人認為，普教中能使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的同時，多聽多說普通話，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是一舉兩得。多學一種語言，對學生來說，並不是一件壞事。可是，普教中帶來的語言障礙，卻加深了學生理解中文科老師講課的難度，使學生錯失不少透過中文科課堂改善中文能力的機會，大大降低中文科的教學成效。在現今的社會，學好普通話，的確會使學生在語言上有一定的優勢，可是，在決定中文科的教學語言此一議題上，政府和學校卻萬萬不應本末倒置，將「學好普通話」置於「學好中文」之上。要訓練學生的普通話能力，絕不應以犧牲中文科學習作為代價。

我輩自小聽以粵語教授的中文課，中文何曾比不上自小接受普教中的新一代？若普教中如此有優勢，何解新一代中文水平每況愈下？歸根究柢，力推普教中，還是政治目的大於語文學習，大於文化承傳。莘莘學子，從來都只是犧牲品。

我接受了「普教中」之後

謝西嘉（流落於阿美利堅鄉郊的城市港女）

來到美國，我第一次遇上身份認同與文化衝突是在自我介紹之時，連接腦袋潛意識與舌頭的神經線迅速傳遞電波之際，我自然地說我來自香港。無論對方是亞洲人或外國人，都會問：「所以你說普通話嗎？」然後我會自豪且理直氣壯地說自己的母語是廣東話。當他們問到分別何在，起初我支吾以對，只能說上是地方本土語言。當以上對話重複數十遍後，我漸漸發展出一套自我感覺良好的答案：「廣東話是複雜而精準的地方本土語言，有九個聲調，抑揚頓挫起伏較普通話大，也較難學。但無論說普通話或廣東話，書寫的都是中文。」

後來，有個上海女生主動跟我講她好喜歡廣東話，並看無線連續劇自學，有個不會廣東話的深圳女生問我有沒有看過特別技巧的朗誦影片，然後說撇開技巧和表情，她覺得用廣東話念詩好動聽。

有時候我說自己來自香港，中台同學都會雙眼發亮的問為甚麼香港人都能說流利的英語和普通話，猶如香港人的頭頂都冠上光環似的，我思索良久，然後說其實不一定，只不過母校是英文中學，同時以普教中。

對，是「普教中」，早於十年前母校初中的中文科已全面用普通話授課，雖然至今我在自己身上也搞不清目的和成效何在，能說一口足以溝通有餘的普通話，都不是在初中三年那些操港式普通話的老師身上學的。在臉書上看到朗天的狀態，實在到位得想按讚一萬次：「相信普教中的，大部分自己中文差勁，主張普教中的，一部分甚至自己普通話也說的不好，包括教育局長吳克儉。」在母校把普教中全面推行而擁有話語權的人「浸過鹹水」，閉上眼睛還以為自己在聽洋人發言，惜有些場合「焗住」要講普通話的時候，其打結的舌頭又不爭氣地出賣其香港人的身份，十足身份認同障礙。

母校同時是鄧小樺筆下那些推行「在我間學校裏只能聽到英語或普通話」政策的表表者，校園有語言大使，校徽下掛上血紅色的徽章，鼓勵同學說法定語言。每個學期末同學還要互相評分，回顧過去表現。這都是流於形式，陽奉陰違的種種，「冚唪」（粵音：

柯果）非常。最荒謬的是連演講嘉賓和牧師也要跟隨學校的法定語言，只記得當時仍是立法會議員的陳淑莊在早會用「半鹹淡」的普通話說：「那個……老師叮囑我要用英文或普通話……但……你們都聽到……我的普通話很普通，（廣東話）所以，我都係講返廣東話啦哈哈哈！」

記得用粵語教我高中中文兩年的班主任在畢業紀念冊上寫：「你是個讓人又愛又恨的學生……不愛規行矩步，左爭右辯不守語言政策……希望你在踏入社會後回首作自我審視之際，發現自己仍留有這些棱角，這點執着，別讓歲月磨蝕最初最真的自己。」

在港修讀香港流行文化時，用二十六篇潮文解讀二十六個被廣泛使用而不被常規認同的粵語詞彙，完成期末的創意習作，潮語包括「伏」、「搏盡」、「重口味」，較 old-school 的有「竹升」、「地踎」。在解釋創作動機的論文中，我寫着：「廣東話這種語言的言語（parole）成份比語言（langue）成份強，不講求嚴謹的文法，也沒有統一的法規去編製正式的語言體系。其語言的運用隨時代文化階級改變，反映社會變遷，達到語言最根本的溝通用途。雖然粵語是港人母語，但卻被普遍認為膚淺欠深度。我們常把俚語掛在嘴

邊，但在文學作品中它們永遠只游走於邊緣位置。粵語精準簡潔，只需用上一個詞語就能表達好幾句英語的話。廣東話這個語言所蘊藏的本土性與主體性的文化意涵遠遠比其表面意思來得更深遠。」可能在政府和貴族學校的白鴿眼裏，香港這個國際都會是不該如此低俗粗糙的。但相比客套間接的日語和一些包裝得近乎偽善的語言，土炮的廣東話多了幾分老實市井，也是讓我 pride and proud to be a 港女的原因之一。

普通話救中文

牢騷齋主（教師）

教育局說「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百分之九十七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引來軒然大波，現在教育局收回有關言論，廣東話是否法定語「言」的爭論大概已告一段落，但廣東話可否用來教中文的爭論卻並未停止。（牢騷按：百分之九十七這個數據似乎也有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的數字，二〇〇一、二〇〇六及二〇一一年三次人口普查按慣用語言劃分的五歲及以上人口都是約百分之九十）。

《基本法》是有提及教學語言的，《基本法》第一百三十六條說：「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在原有教育制度的基礎上，自行制定有關教育的發展和改進的政策，包括教育體制和管理、教學語言、經費分配、考試制度、學位制度和承認學歷等政策。社會團體和私人可依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興辦各種教育事業。」換言之，教學語言是香港的自治範圍。按我們原有的教育制度，教學語言有英文、中

文，至於中文是否僅指粵語或是僅指普通話，從來都沒有爭論，大概也不會有人關心，家長最關心的，只是某校是否用英文教學而已。

但近年來有人不但提倡用普通話教中文，更認為香港中文成績低落，須改用普通話教中文才能救中文。例如二〇〇五年港大一名先生在報上說：「八年來，香港逐漸自毀長城，把以往中英雙語文化的優勢摧毀，把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削弱，用方言口語來作教學語言，與傳媒的口語化朋比為奸，為祖國入世與國際接軌的大業，不止難作貢獻，更背道而馳！」教了幾十年中文，原來自己「朋比為奸」、「難作貢獻」，那天是五月十六日，我馬上聯想到毛主席的五●一六通知。連續兩屆中學文憑考試放榜後中文科都成為頭條新聞，名校中文表現差劣更成了城中熱話，相信一定有人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就可以起死回生。據我所知，不少學校已經普教中了，也有些學校的家長教師會以爭取普教中為目標。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讓我們看看用普通話教中文的實際情況。一九九九年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以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二〇〇八年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提出計劃協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普教中成為一時潮流，遍地開花了。校監及校長多番問我，會否參與這個計劃，我期期以為不可，組內同事也不甚支持。

有些先進學校，不但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甚至用普通話教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他們的成績如何，我沒法知道，不過他們曾在研討會上講得救見證，大概成績不會太差吧。只是這類學校畢竟不多，更多的是初中普教中，高中轉用粵語，究其原因，是因為考試要考說話聆聽，用粵語始終較有把握。也有些學校設實驗班，例如一級設一班用普通話教中文，中文成績好的學生撥入普通話班，其他班用粵語。這種安排令我費解，不是說用普通話可以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嗎？那麼應該把差生撥入普通話班才是正路，但我沒有聽過有學校是這樣做的。據說有些學校聲稱普教中，實際上只是播課文的普通話朗讀聲帶，我希望這不是事實吧。有些聲稱英文教學的學校是掛英頭，賣廣肉，難道沒有聲稱普教中的學校不是掛普頭，賣廣肉的嗎？

掛普頭　賣廣肉

我有時覺得主張普通話救中文的想法很天真，如果普教中中文就會好，內地的中文教師就輕鬆得多啦，事實卻非如此，他們也為學生的語文成績低落頭痛不已。另一方面，如果普通話可以救中文，現時香港學生自小學起已學普通話，加上這些年來普教中的學校已有不少，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普遍已有進步，北上交流或接待南

下的學生也無難度，何以中文成績仍然不濟，教育局更要重施故技恢復「範文」（正確的稱呼是「指定文言經典學習材料」，而且佔分僅為全科約百分之七，只是說話卷的一半，不可跟舊制會考的讀本問題相提並論）？

很多人認為用普通話教中文，我手寫我口，就沒有方言入文之弊，這觀點甚有問題。中國自古以還言雖有差別，文倒是統一的，而且相對穩定。以前大江南北的讀書人都是讀四書五經考科舉，用文言寫文章，至於用粵語還是用吳語教學，沒有影響。程美寶教授在《地域文化與國家認同：晚清以來「廣東文化」觀的形成》一書中指出，「由於文言是跨越方言界線的，儘管某些地區的士子說不好官話，但這並不會對他們的文言寫作能力構成障礙……從官員巡視地方學校，注意到學生用方言念書的現象的記載看來，廣東的學生大多是用方言來念誦文章的……廣東士大夫透過科舉及文言寫作能力的表現，可以和北方的士子並駕齊驅……」就以梁啟超為例，他的國語甚是不濟，聽過他演講的幽默大師梁實秋這樣記載：「他的廣東官話是很夠標準的，距離國語甚遠」，但梁啟超的文章，據他自己說，「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

梁啓超廣東話好國語不濟

有人可能會說，現在不寫古文了，用普通話學中文寫白話文不是有優勢嗎？胡適主張文學革命，大力提倡白話文，他自己是怎樣學白話文的呢？「我也以我自己的體驗告訴他們，許多偉大而暢銷數百年的小說如《水滸傳》、《三國演義》、《西遊記》、《紅樓夢》、《儒林外史》等等鉅著，早已把白話文的形式標準化了。……我本人就是從皖南的一個方言區域裏出來的。我家鄉的方言便是中國最難懂的方言之一，但是我只是學了一兩千漢字，就能欣賞《水滸傳》等等的中國傳統小說名著了。當我十來歲去上海讀書時，我雖然還不會說「官話」（白話），我已經毫無困難的寫起白話文。」（胡適口述，唐德剛譯註：《胡適口述自傳》）胡適不會說普通話，居然「毫無困難的寫起白話文」，主要還是靠大量閱讀，書讀得多，寫文章自然流暢；而且讀書多，知識面廣，語文能力和表達能力才會提高，至於是否用普通話來讀中文，似乎沒有關係。

普通話不是大部份香港人的母語，用非母語作為教學語言是可行的，但先決條件是教師和學生的非母語能力已等同或超越母語，否則未見其利先見其弊，而目前香港的師生普遍還不具備這項條件。事實上，如果用普通話教中文，可以想像師生都會把重點放在語音方面，中文科向來遭學生投訴悶，如果中文科變成普通話科的

加長版，課堂難免變得更死氣沉沉。再說，雖然社會大眾很關心中文科的成績，但有多少人真的認為中文水平很重要呢？心態上不重視中文，用普通話教中文非但沒有效果，可能更會適得其反。前校長神父曾說：「我認為用英語授課在香港所有學校應該編為第二種語言才是較健全和較人道的教育政策，用英語做教學語言既乏效能亦不公平。就算能學好英文和講流利英語的學生在憂愁、失意、沮喪和需要輔導時也要用上廣東話。面對生活、個人和哲學上的困難時，我們可以肯定他們能夠用英語找到伶俐、稱心和滿意的答案嗎？」我相信，上述他所說的「英語」換成「普通話」，也是一樣值得反思的。只是我怕，他也會被批評為「自毀長城，把以往中英雙語文化的優勢摧毀，把自己的國際競爭力削弱，用方言口語來作教學語言，與傳媒的口語化朋比為奸，為祖國入世與國際接軌的大業，不止難作貢獻，更背道而馳！」

普通話也救不了

差不多三十年前，李學銘教授就語重心長的評論過普通話教中文，我不怕做文抄公抄一次作為本文的結語：「普通話是中國人的標準語、共同語，在方言環境中提倡學習，除了有積極的意義外，也是一種認同心態，我們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只是有少數熟諳普

通話或略諳普通話的人（引者：宜加入「或不諳普通話的人」），不知在甚麼時候開始，逐漸養成一種自尊、自重的優越心態（引者：宜加入「或自卑心態」），他們認為，要提高本港學生以至社會人士的中文程度，尤其是書面語的程度，必須採用普通話教學和推廣普通話在社會上的使用。在他們的心目中，普通話是語文教學與學習的救厄解困靈丹，有了普通話，就不會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問題。其實，在普通話通行地區，仍然有語文程度低降的困擾，能講字正腔圓而又流暢普通話的人，不一定能寫通順中文，也不一定有豐富的語文知識和文化常識，能講普通話與中文程度之間，尤其是能講普通話與書面語表達能力之間，可說並無必然關係。昧於口頭語與書面語的差距，昧於某一社會的條件與需求，而侈談中文程度的提高，對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是非常不利的。」（〈方言環境中的語文教學與學習〉）

香港學生要學好普通話，那就應該加強普通話教學，增加普通話的教學時數，甚至要求學生考獲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的某個水平才可申請報大學。至於用普通話教中文，就學理而言，並無必要，從實際來說，難以全面推行，強制實施，只會有反效果。

普教中：推普廢粵前奏

陳樂施（二〇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專題編輯）

早前教育局網頁稱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軒然大波，保護粵語重新成為輿論焦點。要矮化、蠶食一門語言非一朝一夕可達，自香港推行使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下稱「普教中」）起，愈來愈多中小學加入行列，但至今政策對提升中文水平的效果卻令人懷疑。若再深入研究其政策內容，不難發現普教中雖名義上轉換中文教學語言，實際上卻意在培育以普通話為母語的新一代。若不盡早轉此教學趨勢，香港推普廢粵指日可待。

長遠目標　早埋伏筆

香港並無政策規定中文科教授語言，中小學可自行選擇以粵語或普通話教授中文科，但早於一九九九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已欲為全面推行普教中鋪路。在諮詢文件《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改革建議》中，不僅計劃「在中國語文課程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

素」，更將「用普通話教中文」列為長遠語文教育目標。

其後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下稱「語常會」）撥款二億於二〇〇八年起四年間推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提供配套資源於有意全面使用普教中的中小學，參與學校多達一百六十間。根據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度《小學概覽》及《中學概覽》顯示，已實施或正試行普教中的中小學共一百八十間，佔總數近兩成。加上語常會計劃增加參與學校數目，香港中小學普教中比率正不斷擴大。

效果不彰　疑點重重

二〇〇七年時任語常會主席田北辰表示「普教中學生普通話聽說能力比用廣州話學習的學生有進步，寫作也較通暢，較少方言干擾的情況」。支持普教中人士往往以普通話口語貼近中文書面語，「言文合一可助長中文水平」作理據，但均從未有具體研究資料證明其說，「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計劃甚至未有明確指出普教中有何優勢。究竟普教中推行後，學生中文水準是否真的有所提升？

媒體曾採訪數間普教中學校以探討教學成效，其中如油蔴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校長表示學生口語入文情況減少，「中文明顯進

步」，諸如此類的例子令不少人因而相信普教中對語文水平有利。但學生語文表達貼近書面語規範並不意味整體寫作能力的提高，亦無法證明政策對學生中文聽、講、讀等能力有利。

普教中學生中文基礎被削弱的其中一個原因為課程花費大量時間於教授普通話技巧，而非語文。如語常會二〇〇八年《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報告提及，參與研究的普教中學校在教學安排上多着重普通話朗讀訓練，以提升學生朗讀信心及普通話語感；學生亦要從初小開始花時間學習普通話拼音。考評局二〇一一年發表的全港性系統評估考試報告中，便指出小學生會在中文考卷上寫出普通話拼音以取代中文字，如以拼音「liàng」取代「漂亮」的「亮」。這種中普夾雜的情況顯示出學生認字能力被普通話教學削弱，普教中弊端漸現。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副院長謝錫金也指，普教中課程普遍將教學生認字的時間花在教拼音上，結果反削弱學生寫字能力。

除此之外，普教中迫使學生使用非母語上課亦為學習增添障礙。研究報告《在傳統改變以前的思考：用普通話教中文》指出，若中文課改以普通話授課，學生反應將變得被動，高層次思維和言語都會受到限制。香港教育學院中文學系助理教授鄧城鋒在觀看多

節普教中課堂錄像後亦稱，學生答問造句往往採取迴避和模仿的策略，可見以非母語學習中文將窒礙學生思考。縱使遣詞造句錯誤減少，卻無法主動以中文溝通達意，反而得不償失。

吊詭的是，教育局亦在其網頁表明普教中並無實質證據證明其成效。教育局網頁《普通話（中學）——問與答》回應「是否應實施普教中全港性推廣」一問時，鼓勵具條件的學校推行普教中，卻又指「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甚至「有兩項研究發現，普教中學生中文能力與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教育局竟鼓勵學校推行一項效果成疑、甚或有反效果的政策，實屬離奇，更令人不禁猜測普教中的推行是否另有所圖。

教中為名　推普為實

普教中課程既是以普通話教授中文，政策應圍繞語文學習為主，普通話教學為輔。但觀乎語常會建議，多項指引都提及普通話之推廣。《在香港中、小學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所需之條件》參考文件便強調語言環境是普教中成功推行的重要條件，因此有必要在校內營造普通話語言環境，以普通話作主要語言。報告又列出

學校實踐例子，如以普通話進行週會，於課間播放普通話錄音、在校園空間張貼普通話拼音字句等等。如此營造普通話校園僅為配合普教中一科的做法令人費解，學生課程中並非只有中文科，推廣普通話亦不需如此大規模動用學校資源對學生終日灌輸，令人質疑普教中政策以製造理想語言環境為名，迫使學生以普通話作為母語才是真正目標。

教材方面，該份文件表示學校須在教材上作出相應調適，採用有普通話拼音的課文和聽說材料等。近日一系列名為《驚心動魄》的二〇〇四年教育電視節目被發現抹黑粵語，將說粵語的角色塑造為魔俠反派，又教導學生「素質」等大陸用詞才是正統，蛋撻應說成「雞蛋餡酥餅」等。令人擔心普教中教材除了配合教學外，亦會如節目般鼓吹以普代粵，甚或引入「用字正統」的內地範文，逐漸改變學生用詞，以教學語言變化為名作出洗腦。

普教中政策亦需師資配合，惟語常會計劃中培訓普教中老師的方法多涉及調派大陸教研人手，大陸人員將是校內推動普教中團隊成員，每週會駐校兩天，又會進行教學示範，香港教師亦必須參加大陸交流及觀摩活動等。換言之大陸人員會參與校內普教中發展，有權影響計劃的制訂，教師亦須學習大陸教學示範，如此一來難保教學與校園不滲入大陸色彩。

守護粵語　捍衞文化

以上種種均證明普教中的推行已遠超教授中文範圍，意圖使下一代以普通話為母語，亦存在課程赤化危機。尤其參與學校正不斷增加，影響學生人數將愈來愈多，如果學生因而習慣以普通話思考，以普通話為母語，若干年後學生投身社會，成為主流語言主宰，便是粵語滅亡之時。「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一門語言不但是文化載體，更代表族群的獨特身份；當學生說着普通話，背誦着「用字正統」的範文，向大陸看齊時，中港融合將又進一步。

一項效益不明、動機可疑的政策，為何會使學校主動配合、家長趨之若鶩、社會盲目推崇？歸根咎柢，是香港人長年歧視粵語，才會因而誤信普教中必然較粵教中有助學習。近年有人開始積極保衞粵語，提倡粵語入文等，或能帶來新契機。停止盲目抬高外語，重新認清粵語的意義，才能挽回其頹勢。

（原載於香港大學學生會官方刊物《學苑》二〇一四年二月號）

普通話教中文所為何事

陳仲明（自由撰稿人）

十年母語教學，令香港英語水平全線下滑，最後以孫明揚一句「不得不承認，現時本港學生的英語水平，與令人滿意仍有大段距離，且仍有大量改善空間」而「微調」作結；但整整一代香港學生，卻無從選擇，只能淪為教改的白老鼠。如今，母語教學「微調」尚在進行中，成果未明。但一波未完，另一場教學語言戰爭已經悄悄打響了，就是普教中（普通話教中文科）。

事緣二〇〇〇年，課程發展議會把普教中列為長遠目標，然後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語常會）協助推行。儘管沒有正式頒佈政策文件，但其實普教中已暗中「變相推行」。現行做法是把決定權交給學校，由學校自己決定是否改用普通話教中文科。二〇〇五年語常會做過調查，發現用普通話教中文的中小學共有二百零八間，且有一百六十六間準備五年內改為普教中。二〇〇八年，語常會推出計劃，幫助中小學推行普教中，在二〇〇八至二

○一四年間共有一百六十間中小學參加。如此一來，假設當年的一百六十六間中小學有一半參加了語常會計劃，以現在全港中小學共有一千零八十八間（不計國際學校）計算，全港普教中學校的比例已達百分之三十四，實際數字當然更高。可見，不待政府正式頒佈政策，許多學校已紛紛轉為普教中。

有此現象，家長的態度是關鍵。家長想下一代學好普通話，多一技之長，於是把子女都送進普教中的學校，是可以理解的。但要知道，中文科的根本目的是學好中文，要學普通話，已經另有普通話科。香港向來是用廣東話教中文的，轉用普通話教，對學生真的比較好嗎？普教中的政策源自二〇〇三年語常會的《提升香港語文水平行動方案》，但細看文件，就會發現制訂政策時論據是相當混亂的。語常會共做了三個研究報告以「論證」普教中是對的，但在文件中，自己卻又說「研究的樣本很少，因只有少數本港學校採用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以及，各項研究均採用不同方法評估學生在學習中國語文科的進度，以致較難就研究結果作出比較」。

既然如此，正常做法是否應該做更多研究，然後再推行政策呢？但事實卻不是。儘管自認論證不足，語常會卻直接得出結論：「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科的學生的普通話能力有所進步，他們在

中文寫作方面的能力，亦較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為佳。目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可見當初決定推行普教中時，根本不是基於理論支持，而是「先實行後檢討」，把學生當作實驗品。

當年政府推行母語教學，好歹也引用了不少海內外研究報告，「證明」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才正式推行。儘管實施效果差強人意，但起碼功課「做到足」。如今改用普通話教中文，亦屬於教學語言變更，茲事體大，豈能如此兒戲為之？還是政治掛帥，事在必行？

再說，雖然母語教學需要「微調」，但「母語教學有助學生學習，因大多數學生較喜歡以母語學習」依然是政府的定論，香港學生的母語是廣東話，不是普通話，現在要學生以非母語學習中文科，是否自相矛盾？普通話教中文事實上是否壓縮了廣東話的使用空間？還是說，大家都不介意呢？

廣東話不但是香港的語言，更是香港文化的核心。幾十年來，香港人引以為傲的各種流行文化，如電視劇、電影、音樂、舞台劇等，無不以廣東話為載體。隨着中港繼續融合，有朝一日，如果要說香港跟大陸還有甚麼不同，強勢的廣東話文化將是港人的最後依

託。在課堂上用廣東話學習自己的語文，是香港人的基本尊嚴，也是廣東話地位的象徵。如今，港人竟主動自毀長城，想來簡直匪夷所思。

在教育局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一欄下有這麼一段話：「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百分之九十七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原來在教育局眼中，百分之九十七港人每天在說的廣東話，連成為法定語言的資格都沒有。普教中真的不是要排擠廣東話嗎？你信不信？反正我不信。

廣府話　頂硬上

趙善軒（明愛專上學院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英國皇家歷史學會會員）

普中教學　家校師生俱無益

學習普通話並沒有甚麼問題，畢竟多學一種語文並非壞事，何況要在香港謀生，不學普通話肯定會吃虧的，諺曰：「學習普通話，生意滿天下。」然而，中小學只須開一門普通話課已經足夠了，惟當局偏偏要把中國語文科以普通話為教學語言，其邏輯實在荒謬之極。

其一，以普通話教中文，別的不說，甚麼難以掌握古代詩文音韻云云已是後話。光是香港教師絕大部份以廣府話為母語一點，就足以廢除。早在清朝的時候就已有「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廣東人說官話」之說，讀者有興趣的話，可聽聽孫中山先生的國語演說，那真的有點不倫不類。廣府語系與普通話南轅北轍，學起來本已甚為

難習，就像英國人學俄語無異，舌頭運轉不斷，感覺相當難受，非得從小學起不可。

其二，香港在任的中文教師，多半途出家，即使考國家普通話水平測試，拿甲級二等的，實是屈指可數，更何況當局坦白地說「我們並沒有有關教師考獲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普通話水平測試』二級乙等或以上的成績的數據」①。不幸的是，現時強要他們以本來就不熟悉的語言來教學，根本就是強人所難，即使未到辭不達意的境況，也定必事倍而功半。

由此觀之，推行普教中或會增加學生習練語言的機會，卻會導致語文水平下降，除非把本土教師統統撤換，引入以標準普通話為母語的新香港人，要麼就是犧牲教師生計，不然就浪費了學生上課的寶貴時間。懸崖勒馬，恢復廣府話教中文，才是撥亂反正的不二法門。

① 立法會十一題：以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http://www.info.gov.hk/gia/general/200801/23/P200801230175.htm）

捍衞廣府話　必須頂硬上

二〇一四年初，有傳媒發現教育局官方網頁《語文學習支援》一文，竟然指廣府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各位試想，一個地方有百分之九十七人使用的語言非法定語言，這種事只有在殖民地才會發生。舊時英殖如是，想不到今日也仍然如是。

至一八四二年以降，英語是殖民地唯一的法定語文，一九六八年由學界成立委員會向政府爭取中文合法化，到了一九七四年，中文運動抗爭最終逼使港英政府通過《法定語文條例》（香港法律第五章），訂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基本法第九條》寫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還可使用英文，英文也是正式語文。」惟此處只針對書寫語文而非口語，即使一般情況下都是使用廣東話，但其法定地位尚未正名。

民意沸騰，眾怒難犯，教育局馬上為事件道歉，《大公報》專欄作家口誅筆伐，其謂：「教育局網頁文章的有關註釋說『廣東話不是香港的法定語文』，這一句子，並不全錯，因為廣東話的確不是香港的法定語文。廣東話是一種方言，即廣泛流傳、使用於廣東省內的地方語言，並不是一種語文，因此不能說廣東話是一種法定

語文，或者是香港的法定語文。」②左報力批教育局因眾怒難犯而發的「致歉新聞稿」乃多餘之舉，氣勢凌人，官威盡現。

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筆者在此建議，本土派立法會議員應馬上提出議案，把廣府話與英文訂為法定語言，操普通話與客家話、潮州話人數相約，可定為輔助語言。為廣府話正名，當抱着明末祖籍廣東的抗清名將袁崇煥「掉哪媽！頂硬上！」之精神，方能水到渠成。

② 關昭：〈教育局「致歉」些甚麼？〉，二〇一四年二月三日《大公報》。

廣東話爭議的核心問題

桑普（政治評論人）

二〇一四年一月底，教育局網站上載了一篇題為《語文學習支援》的文章，指出「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接近百分之九十七本地人口，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而英語則多作商業用途。至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定語言，普通話的使用日見普遍，反映內地與香港經濟及文化的緊密聯繫」。此文一出，隨即引發網民猛烈批評，指摘教育局曲解《基本法》與《法定語文條例》所規定中文和英文皆為「法定語文」的意思，並且虛構普通話為「法定語言」，謊稱廣東話為「非法定語言」，導致「矮化」廣東話。

及至二月二日，教育局將有關文章刪除，並在「新聞公報」欄目刊登題為《政策正面睇》文章，為事件道歉，指該文章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含糊不精準」，將作修訂，並指中國語文教育目

的是要提高學生學習和運用中文的能力，包括能夠掌握「規範的書面語」，能說流利的「廣東話和普通話」。

其實，最應該接受「中文教育」的，正是教育局當中那些要為該文章負責的官員。首先，無論是廣東話（Cantonese）抑或普通話（或稱國語）（Mandarin），都屬於口語，從來都不是香港或內地的「法定語文」。至於教育局所炮製的「法定語言」這個概念，根本無中生有。由始至終，只有作為書面語的中文（或稱華文）（Chinese），以及英文，才堪稱為「法定語文」。這些教育局官員一心想強化普通話口語教育（其合理性留待下文探討），但卻貿然使用「非法定語言」和「中國方言」兩組詞語來標籤廣東話口語，前者根本無中生有，後者根本無助論證推動普通話教育的必要性，簡直全盤混賬，足見梁振英統治團隊語文素質低劣，所寫所說，完全「唔得掂」。

教育局的混賬文章，隨即引來本土派人士的猛烈反擊。有人指出聯合國早已正式定義粵語為一種「語言」，不稱之為「方言」，並且認定粵語為全球六大主要日常用語之一。筆者對於所謂「六大」的真實性存有頗大疑問，也對於廣東話是否真的被列入「六大」或

「十大」之類的虛榮和排名不感興趣（因為沒有人因為「大」就有義務必須學好那些語文），更對於粵語是否「中國方言」的「口水戰」感到毫無意義。依我看來，港共政權在這次法定語文爭議中所體現的問題主要有兩個。

首先是「推普廢粵」或者至少是「普通話普及化、廣東話邊緣化」的長遠憂慮。眾所周知，廣東話和英語一直是香港教育行之多年而有效的通用口語，而且中文和英文是香港教育的通用書面語文。這一現象沒有必要改變。另一方面，普通話口語的確比以前更加「實用」，但其「實用程度」依然遠比廣東話來得低，因此只能成為枝葉，不能成為主幹。所謂「兩文三語」，如果是指先學好中文和英文書面語，以及廣東話與英語口語，行有餘力，才開展額外的普通話教育，那是值得支持。但如果「兩文三語」政策，是指強制要求全港所有中小學生，都要如同教育局的補充聲明所指，必須「能說流利的廣東話和普通話」，那麼就會本末倒置，輕重不分，增加香港學生不必要的學習壓力，同時引起強化港中兩地融合與香港失去本土獨特性格的真實憂慮。這正是許多港人所不樂見的「廣東話邊緣化」發展趨向，值得警惕。

此外，有一點比較綿裏藏針：教育局補充聲明中要求學生「能夠掌握規範的書面語」。這一點涉及到誰的規範、甚麼規範的問題。先拋開正體字與簡體字的差異不談，如果香港學生被要求掌握的所謂「規範書面語」，是指共產黨式冗贅空廢中文，例如「進行優化處理」、「講實話做實事」、「準確記錄和反映了改革開放以來中央為實推進三農工作所做出的一系列重要戰略部署，對於配合全面深化農村改革、加快推進農業現代化具有重要參考作用」云云，那就簡直把中文降格至弱智文字的境界。如果大家最後被要求學習這種不斷被官方標榜為「平易近人」的「規範書面語」，筆者奉勸各位棄而不學，轉而學好傳統簡潔中文，免受精神污染。

為了我們的未來，拒絕普教中

木子（普教中學生關注組召集人）

在親朋戚友的聚會中，姨媽姑姐的閒聊總離不開生活閒情、子女學業。近年來，「普通話教中文」一詞漸漸流行起來，不時聽到某某表弟某某鄰居，考進了間普教中學校。普遍學校都在精英班實行普教中，令普教中似乎變成「成績好」的代名詞。

其實自從九七年主權移交，教育局已經開始大規模推行普教中課程。在二〇〇〇年香港課程發展議會的《香港學校課程的整體檢視報告》，提到「在整體的中國語文課程中加入普通話的學習元素，並以『用普通話教中文』為遠程目標」。根據反普教中組織「港語學」的研究，迄今已有超過百分之七十一小學、約百分之二十五中學設有普教中班別。

有中文老師說，普教中的確令學生有更多時間練習普通話。更有家長反映，普教中給學生學習多一種語言，提升學生日後的競爭力，「方便北上搵食」。亦有學生表示，普教中課堂令他聽不懂老師的說話，令他無法投入課堂，又因為普通話講得差勁，使他害怕在課

堂上與老師和同學溝通。人人各執一詞，咁普教中究竟是禍是福？

首先，香港是一個普遍以粵語為共同交流語的地方。香港的人口約百分之九十二是華裔，而香港人有約九成人以粵語的廣州話為慣用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流行曲、港產片蜚聲國際，令到粵語成為了香港文化的象徵、載體，亦構成香港人的身份認同。

既然如此，當主流學生的母語都是粵語，使用一種他們不熟悉、不常用的語言，即普通話，來教授中國語文，必定對學生學習中文有所影響。視乎學生的能力，可能某些學生的語文能力較優秀，課堂上使用普通話對他們來說並無問題，但教育政策的制定，需要顧及不同能力的學生。我們普教中學生關注組，自二〇一四年二月成立以來，一直收集老師家長學生對於普教中的意見和經歷。我們發現其中好多個案，都是因為學生聽不明白老師的問題和內容，不懂得回答，不懂如何書寫生字，考試經常不合格，結果不僅普通話，連中文科都丟失了興趣。中文課不只是灌輸語文知識給學生，而是從中鍛煉理性分析、體會情感、欣賞文學作品等。強迫語言能力不強學生以非母語去學習中文科，學出半桶水的中文。實際上是禍及一代人的語文水準、有礙於文化承傳。

普教中的課堂上，比起粵語教中文的班別，教師需要用更多時間教授生字的讀音，變相削減了教授其他語文內容的時間。不習慣

普通話發音的學生，需要用更多倍心機學習普通話，才能取得好的中文成績。這亦是普教中多數在精英班實行的原因：讀書佳的學生能先學習不差的普通話，再學習中文。當然，從中的確是訓練到普通話能力又提升中文能力，但當我們要考慮全港能力參差的學生時，斷不能無視學生學習能力，在繁重學業上，加設普教中這個無必要的關卡，是摧毀他們考好中文科的希望、扼殺他們對中文科的興趣吧。以上亦反映，普教中的弊處之一，就是普通話能力與中文能力掛鉤。

其次，從來沒有證據證明普教中可以提升學生的中文能力。教育局在其網頁亦承認「仍未有確實證據，證明以普通話學習中國語文的學生的一般中文能力會有所改善。其中兩項研究發現，以普通話學習的學生的中文能力，與以廣東話學習的學生並無分別，甚或表現更差」。我們不禁納悶，家長們為子女蜂擁報讀普教中學校，究竟是真的為子女學習好，還是為了跟上潮流，盲目相信那些宣稱「普教中有助提升競爭力」的宣傳？

其三，就是對於本土文化，乃至於香港通用書面語的侵蝕。以下舉一些簡單的例子，都是我們關注組收集得來的真實情況。在正常的中文課裏，學生是可以寫「鳳爪」、「魚蛋」、「街市」等名稱的，老師亦不會當之為「口語入文」。但在普教中的課堂，以

上的名詞是錯的，是要扣分的那種錯，要改為「雞爪子」、「魚肉丸子」、「菜市場」！鳳爪魚蛋街市，根本不是口語，是通順、意義完整的名詞。但由於它們不是由北京方言為基礎的「規範漢語」用詞，所以在普教中的課堂，它們就是錯！

有些普教中支持認為，普通話以北京方言為基礎，比起廣東話更接近白話文，所以用之學習中文，有助提升中文書寫。但根據語言學家陳雲老師的說法，語言和語文是兩個系統，學好中文，無關用哪種語言，而是需要閱讀優秀的文學作品。書面語是精煉的白話文，而無論使用粵語抑或普通話甚至其他方言，來學習中文，都無大影響，都需要學習、適應口語轉化為書面語的過程。而這個過程，用母語來學習是最佳的。承上，「鳳爪魚蛋街市」都是無問題的白話文，但現在為了順服在普通話霸權之下，就犧牲了香港一直通用的書面中文，來迎合北方話的詞彙、語法。

在口語、口音方面，有同學向我們表示「被普教中兩年，講嘢已經帶有奇怪的口音，而且寫字好易寫出同音字，例如『紙』變成『只』」。而關注組一位成員的妹妹正在小學接受普教中，有一次她說了一句：「一 su花」。原來她想說「一束花」卻不懂「束」字廣東話如何讀，就用普通話讀音讀了。而平時我們口頭講的是「一紮花」，同樣可以入文，不是方言詞，但普教中的學生卻不懂唸、不

懂用了。可見普教中對於小孩、語文能力不佳的學生，是會影響其口語發音和表達能力。

有些支持普教中的人士常說「學多一種語言可提升競爭力，加上中國日漸強大，普通話越來越重要」。我們並非反對學習普通話，而是反對普通話教中文。我們一直認為普通話需要學，但不是在中文課加入普通話科內容。有些普教中學校，直接將中文科和普通話科合併，其危害不再在此覆述。

按照現在的情況，教育局每年批平均一百四十多萬資助給普教中學校，在這利誘之下，普教中學校的數目在十數年間，將會逐漸上升。當周街都是普通話的時候，當下一代香港人都講普通話的時候才反抗，太遲了。

普教中並非一朝一夕的事，為何實行了十數年，依然受教育局推廣，未見停止？不如說是因為家長的盲目追捧、學校抵受不住教育局的利誘，還有學生的默默忍受。學生哥們，與其盲目服從不合理的事情，我們應該主動說不。除了為我們學生的未來，更是為了中文的未來，為了粵語的未來，為了香港的未來，拒絕普教中。

今次有幸撰文，希望能從學生角度，為讀者分析普教中對莘莘學子的禍害。我在此代表普教中學生關注組同人，感謝彭志銘先生和一眾前輩為反普教中運動所付出的努力。

三、語言：從主流語言到法定語言

說南蠻・滅粵難

陶傑（專欄作家）

說南蠻

香港特府吳克儉無端端宣佈中小學應推廣所謂普通話教學，又引起一場風波。

吳局長只是奉上命做傳聲筒。「上面」一貫排擠粵語，視廣東與福建為心腹大患。因為最早是陝北的政權，對於閩粵兩省因言語不通，天性疑忌，加上歷史心理陰影，覺得這兩個省有如異國，隨時會作反，排斥粵語尤為或隱或現的政治任務之一。

說廣府話是「方言」，其實不確。粵處中國之南方，語言與各省不通。確實，中華民族起源於黃河流域，黃帝與蚩尤大戰之時，五嶺以南的廣東，還是一片鱷魚虎豹出沒之地，雜居着猺、獞、苗等茹毛飲血的生番，所以稱為「南蠻」。

中國的南北戰爭，由秦始皇三十三年開始。秦始皇置郡，決定遷徙五十萬人去南方，與當時還叫「百越」的各部落雜處。所以粵

人與中原在春秋戰國之時本屬一家，今日粵音保留許多字眼，在詩經和楚詞中都用過，便是明證。

以後，五胡亂華，北方各省流民更四處逃竄，北宋遷都杭州，中國文化面對匈奴及金人入侵，且戰且退，到宋帝昺南渡，朝臣多名家族從長江進入嶺南，又有幾萬家戶。在歷史上，宋帝昺和陸丞相一起南逃到九龍，是一件大事，今日九龍城的宋王台紀念的，當年不只是一個孤王，還有數十萬兵，皆來自中原，因此今天許多廣東俗語，保留了宋朝的俗話，如「莫理頭尻」，在《水滸傳》裏出現過，「尻」不是生殖器，是尾巴，「莫理頭尻」是指人首尾不顧，演變為今日，叫「無厘頭」。因此，廣府話嚴格來說，並非方語，是中土正音。

人類文明先有聲音，後有語言，有語言之後，而有文字。因此「語文」兩字，以「語」先行。廣東話到今天還稱為「頸」、「喉」、「大髀」，與北方話所稱的「腦袋」、「臉」、「嗓子」、「腿」已經是不同的路數。廣東話說「日頭」，普通話稱「太陽」。廣東話稱「月光」，北方普通話稱「月亮」。廣東話叫「粥」，而北方這個古字早已流失，稱之為「稀飯」。由此可知，南北分道揚鑣，南方的廣府話保留了許多中國古語的化石。

但粵語為何又被北方人視為「方言」？因為粵語雖然有大量語彙是古正之字，但也有許多字的發音，只知其聲，其字已死，考究而無字。輕重清濁之間，發音時有變異。譬如「冇」是「無」的變音。「冚家」是「合家」的變音。「番屋企」是「返屋企」的變音。還有一句「千祈咪亂嚟」，那個「嚟」字是「來」的變音。凡此種種，都讓北方人振振有詞，指粵語不入流，其實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偏見。「千祈咪亂嚟」的「千祈」古雅得不得了，「咪」是「勿」的變音，凡此種種，尋音者無從下筆，因此流傳到今日，出現大量生按白造的誤字。

譬如「大石砸死蟹」，那個「砸」字借用的是「窄」音，應作「磧」；還有「雞春咁密都哺得出雞仔」，那個「春」字與四季無關，實是「卵」字的變音。為何「卵」與「春」的讀音十萬八千里，有此誤讀，我估計可能許多廣東人受過教育，為了避粗口的諧音，一個「卵」字與廣州話男性生殖器發音相似。還有「褲浪」那個「浪」，不是大浪灣的浪，而是褲「襠」，褲襠是指衣服的中襬，也就是腰下的部份，這個「襠」字與「浪」的發音也搭不着邊，為何有此轉誤？則遙不可考。相信這是因為早年粵省文人秀才與農夫俗人混雜，因此今天的粵語，雖然許多有兩千多年的來歷，卻又沙石夾雜，許多

音正字誤讀，約定俗成，令北方人一頭霧水，其中並無規律可尋，有點像英文的不規則動詞：Go, Went, Gone。北方人學廣東話沒有這等耐性，因此一概斥為異端。

今天香港許多地名如紅磡、深水埗、鰂魚涌，「磡」、「埗」、「涌」都是廣東話特有地理語彙。地巖突出來的一塊為之「磡」，是小型的巖崖。深水而無淺灘的海灣為之「埗」，因此深水埗這個地名完全正確。至於「涌」，是阡陌交匯成的淺河道，南方的漁村獨有這種河道和大海交匯而成的地域，如今日的大澳就有二涌，都是至少五百年的稱呼了。今日特區政府指廣東話為方言，惡紫奪朱，又何其淺薄無知乃爾？

今天說「篤背脊」的那個「篤」字，也是誤寫。粵語之中分得仔細，凡以器械或尖針刺人的動作，叫做「殺」。唐朝以前，以器械橫擊為打，直擊則為「殺」。所以說「殺背脊」，到今日仍有活力，中國的奴才，不限於廣東人。

廣東話之豐富，其中一個原因，與廣東飲食多樣有關。譬如「鹵水鵝」，這個「鹵」便是北方佬投胎三輩子也不能理解。鹵水指以香料和鹽一起醃，所以這個「鹵」字，象形與一個「鹽」字相通。中國菜式中只有福建、潮州、廣州有「鹵水」，北方沒有，因為香

料最早從印度和南洋傳來，只及華南海岸，北方只有辣椒，所以做不出「鹵水」來。

至於「九大簋」的那個「簋」字，則是春秋時代的金屬器皿，今人擺酒席，稱有「九大簋」也是兩千年前的習俗。今日北方人排斥廣東話，一半出於無知，另一半出於眼紅；北方說南方是蠻？未見得，廣東與蘇浙皆有文化，古有齊楚黃河流域的暴秦發源之地，方才野蠻，北方才蠻呢。

南北中國

不但普通話和粵語天下本無事，但由於政治挑釁，漸成一場「南北戰爭」，在文化上，早有南北兩個中國。

梁啟超在《中國地理大勢論》說：「長城飲馬，河梁攜手，北人之氣概；江南草長，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懷。」

北方人豪邁，故言「氣概」；南方人婉柔，故曰「情懷」。中國的文化處處體現南北之差異：共產黨盤踞的先秦陝北，打仗用人海戰術，手段粗狠；國民黨主控的吳越江浙，國軍在徐蚌會戰中，看見戰場前線都是驅趕來做炮灰的百姓，不忍開槍。中國文化的粗獷，戰勝了婉柔。

秦始皇統一六國，是北方中國的勝利。春秋的吳越，戰國的齊楚，文化比北方的秦國精緻，商貿比秦國發達。但是劣幣驅逐良幣，精緻而有修養的文化南國，最終被暴力而好戰的北國吞滅。

北方的民歌，像《山丹丹花開紅艷艷》、《南泥灣》、《黃河大合唱》，由郭蘭英、王昆這類腔調唱出來，跟南方的音樂，像《月亮代表我的心》、《甜蜜蜜》的鄧麗君相比，便知梁啟超結論之準確。

一九七九年，大陸剛「改革」，鄧麗君即瘋魔全國，因為大陸平民在三十年的革命粗獷的北腔轟炸之後，忽然聽見鄧麗君情懷陰柔的南調，有如貧瘠的黃土地，忽然新綠了一層甘霖。

南北中國的建築，風格也因地貌之不同而大異。《世說新語》說：中原北方，因「暢通無阻」，建築物簡樸；江左南岸，「紆餘曲折」，所以庭院幽深。

華北平原一望而平坦，所以北方話詞彙少；華南多丘陵山嶺，所以粵語的花樣多。只飲食一項，北方只有煮、炒、蒸、炸、涮，廣東還加上炆、燴、焓、焗。如果以「普通話大一統」，取代粵語，則不如連廣東菜也一併取締，因為炆、燉、燴、焓、焗，普通話唸不出來，大陸既然推廣普通話，沒有理由也不強令廣東人不要再炆、燉，「統一」吃麵條和包子？

百年炸彈

粵語和「普通話」的紛爭，早在近一百年前已經埋下了火種。

起源是一場相當愚蠢的「五四運動」：「五四」除了政治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還附加了「廢除文言」的一場「白話文運動」——一批二三十歲、學問和做人都還沒通澈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語文，只知其一、不識其二的胡亂「革命」，這才埋下了計時炸彈。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最愚蠢的口號，是「我手寫我口」。胡適、錢玄同，都不是廣東人，對廣府話毫無認識。他們以為，白話文與文言是必然對立的，而不知道在廣府話裏，「文白」早融為一體，寫在紙上的文字，與在嘴巴說出來的語言，沒有甚麼差別。

譬如，今天的廣府話，還可以用嘴巴說：「內子擅於烹飪」——這句話可以寫出來，也可以在會話寒暄時說出來。但是在普通話裏，「內子擅於烹飪」，不是「口語」，非要「白話化」成「我太太擅長燒菜」。

廣州話講「內子」，但是在大陸，經歷了毛式「文革」，語文遭到摧毀，先流行「我愛人」，繼而說「我夫人」，而「內子」、「犬兒」、「尊翁」，皆可是文言，也是口語，用在沒有經歷過「文革」的

香港，直到今日。

「五四」中人的「我手寫我口」，另有一個問題：是寫誰的口？廣東話的「手」和「口」，差別很微，連農夫和傭人，出口也有儒家的禮教，但如果「我手寫我口」的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的流氓，而如果流氓當道，文化腐壞，「我手寫我口」即導致中文的急速腐敗。

「五四運動」是一場幼稚而偏激的「革命」，在現代人類史上，沒有地位，由其中的「廢除文言」即可見其可笑。文言與白話，在廣州話裏並不排斥，早已共融，不懂廣東話的胡適及其同夥，卻一葉蔽目地胡亂「改革」，其後又以行政手段鞏立「國語」地位。民國時代，本來你講你的，我說我的，到了今日，又別有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大一統政治。「五四」之為禍中國人三代，今日看來，令人失笑。

滅粵難

香港特區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普通話教學」，以實現全面取締粵語。

中國仇恨粵語，有強烈的政治理由。史上粵人以叛逆作反稱

著，顛覆大清中國的逆賊孫中山、汪精衞、洪秀全，皆是廣東人。清末一干遺民有四處籌組「義軍」，企圖反清復明者，還有一個屈大均，也是廣東人。屈大均不愛大清國，但熱愛廣東，曾遊歷粵省，將廣東有甚麼好玩的山水，何等奇趣的習俗，甚麼好吃的東西，寫成一冊筆記《廣東新語》。

蔣中正是浙江人，用人一向不喜粵籍，連同廣西與雲南，國軍的粵系桂系，像薛岳、張發奎、李漢魂、白崇禧、李宗仁，蔣氏一向視同異類。兩廣與雲南一樣，有山嶺屏障的天險，雲南的龍雲和盧漢，亦與蔣有暗隙。蔣介石不喜南方人，在心理上，還有汪精衞和廖仲愷這兩個廣東人，一度是廣東人孫中山的嫡系門生。廣東人是中華民國之母，江浙人繼承了政權，大概有幾分心虛，汪兆銘想做主席，多少也有幾分為廣東人復辟的意思。

毛澤東更厭惡廣東人，手下將軍除了一個梅縣客家葉劍英，無一是粵籍。廣東人葉劍英果然反骨，「文革」期間帶着一伙將領「大鬧懷仁堂」，是為「二月逆流」。毛澤東對葉劍英只解除兵權，因為葉劍英本來在張國燾名下，張國燾出走時，葉劍英密報毛澤東，救了毛澤東一命，毛澤東留下葉劍英這條命，事實證明，犯下大錯，死後就是這個廣東人慫恿華國鋒，活捉了江青，廢掉了毛主席的接

班大計。

有此歷史因由，粵人既是心腹大患，中國絕不可能容許粵語及其文化流傳，不滅粵，必為粵滅。這一點絕不是甚麼「平機會」處理得了的。

不過吳克儉想廢廣東話，在香港也很困難。首先，《基本法》規定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粵語就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此外提倡講「普通話」，特府梁班子應該帶頭：梁振英讀《施政報告》，曾財爺讀預算案，今年（二〇一四年）起應改以「普通話」讀出，然後立法會再由民建聯帶頭，以普通話和應，工商界的議員跟隨，將堅持說粵語的泛民孤立起來。不如此，所謂普通話，不可能推廣，但一這樣做，必演變成一場戰爭，不過梁班子最好鬥，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全面開戰，也很好。

逍遙沒誰管

香港教育局想在香港中小學推廣「普通話教學」引起社會普遍反感，指用北方的語言政治排擠保留中原古音最豐富的粵語。

「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香港在英治時代，國語、粵語、上海話、福建話，還有潮汕和客家話，百花齊放，多語並行，一向

和而不同，令英國殖民地版圖在遠東多添幾分姿采。

香港以前只有中文和英文。書寫的中文之外，各種方言並行不悖，英國人從不干預。只要有足夠本金註冊登記，殖民地政府不管你用哪種方言教學，但如果在課堂上講馬克思、毛澤東思想，推行階級仇恨和暴動，即使教師用字正腔圓的牛津英語授課，教育司也不會發牌，或者發了牌，也會暗中監視。

至於普通話授課，香港的蘇浙公學幾十年聞名。校長孫方中女士是上海人，蘇浙公學的校董也是蘇浙同鄉會的班底，徐季良、邵逸夫、包玉剛、沈葦昌等文人雅士、蘇杭商賈，都是名義上的老闆和股東。但是蘇浙公學並沒有用上海話授課，而是用國語，因為上海話的詞彙不夠用。以滬語唸唐詩宋詞，根本讀不出來。所幾蘇浙公學的教學語言是國語，而殖民地政府知道蘇浙同學會的背景，都是逃避共產黨而南來的租界工業家，知道這家學校教出來的學生，不會在街上唸毛語錄、放炸彈，集體發瘋，港督和教育司都放心。

邵氏電影早期以國語發行，因為對象都看準了蘇浙僑民。但是電影南洋一發行，南洋華僑卻又是海南閩籍人士的天下，國語行不通。早期，連香港左派長城鳳凰的許多黑白國語片，賣到美國金山的唐人埠，也要另行配上了粵語。今天，電影資料館搜集到幾個拷

貝，只剩下粵語版，配音的腔調都是上一代，有傳統廣州口音的人。

香港那時還有潮語電影，拍的多半是大戲，像《陳姑追舟》。蘇浙和外省人來香港住下十多年，他們的子女在香港出生，與廣東人混在一起，漸漸也不說上海或北方話了。因此邵氏電影到一九七二年推出全粵語的《七十二家房客》，國語片漸漸讓路，市場現實如此，沒有甚麼好爭議。

而南來文人錢穆和唐君毅，雖然在九龍城開了新亞書院，一個以蘇浙口音的國語講四書五經，牟宗三則以濃厚的湖南腔上課，聽課的學生卻全是香港廣東子弟，半懂不通，但幸而手上有課本。穿長衫的牟宗三吊起一副湖南腔的國語嗓子，唸兩句，一口痰湧上喉嚨，朝着窗口「吐」的一聲，放出一把長虹發劍。那時只有這口「吐」的那一聲「語言」，凌駕地域，一堂課裏，班上的香港仔唯一聽懂就是這一聲，哄堂大笑，牟老先生若無其事，繼續搖頭晃腦，講他的孔孟之道。

英國人胸懷四海，對於殖民地的語言，不會趕盡殺絕，總之打出一面旗號：接受英語教學的，可以加入官府當公務員，起薪點從優。有了這條通道，本地人自然會靠攏，不是親英，而是為了金

錢。英國人沒有禁止其他方言教學，只是說，你想飛黃騰達，用我的語文。如果不想靠攏英國，自生自滅，或者中學畢業，愛國忠精，去台灣升學，回來之後去調景嶺教小學，英國人絕不攔阻，你儘管用國語講學好了。

小政府，大市場。身為一個政府，狹隘而小家，這也看不慣，那也想管一手，又沒有知識基礎，只會將英國人留下的一座城市敗掉。天生對一個「管」有一鋪戒不了的癮的，就是專制極權。香港在英治時代，雖然沒有一人一票，但總督金文泰就是一個廣東方言專家，前布政司鍾逸傑來香港之前，在馬來半島也操通福建話和客家話。香港一年來離心加劇，又能怪誰？

教學語言

中國語文或文學用甚麼話來教學，吵吵鬧鬧，而不知其中有四層：

一、中國文學中的白話文課，如《背影》，教師該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在課堂上向學生朗讀。

二、講解和賞析此一白話文的語言，教師應該用普通話還是粵語。

三、中國文學中的文言，像《醉翁亭記》、《赤壁賦》，還有唐詩宋詞元曲，朗讀課文時，教師該用普通話，還是用粵語。

四、在講述賞析《醉翁亭記》、《赤壁賦》、唐詩宋詞這類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時，教師應該用普通話，還是粵語。

中文教學的語言，如果不先分清楚以上四樣，吵來吵去，越吵越吵不清楚，而且以中國人的農民低級思維，吵着吵着，粵語教學的問題，就變成政治問題。變成了政治問題，就是「港獨」問題。變成了「港獨問題」，就是「分裂祖國」的罪行。一旦「分裂祖國」，共產黨那隻手，出於動物的原始本能，就會摸向腰間那把槍，準備「鎮壓」而殺人。

若心智正常，而對於中國語文的方言，稍有認識，對於上列這四點都知道跟甚麼「分裂中國」完全沒有關係。

如果你懂上海話，就知道在上海，即使在民國時代，中小學教授中國文學，教師唸課文，尤其古文，必定自動轉為北京官話（那時不叫「普通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這幾句，無法以滬語口讀。一個上海先生，必定轉以北京官話唸出來——此中不必由北洋政府、民國政府，或者蔣介石、蔡元培、

胡適哪一個官僚來「行政命令」，上海教師上課，自然會轉腔。

有許多字眼，上海話是發不出音的，例如「不」，上海人說「弗」，上海人說不出「你」，必說「儂」。上海人唸不出「誰」，必講「啥人」。甚至廣東人講「飲水」，北京人說「喝水」，上海人「飲」和「喝」都說不出來，只說「吃水」。

但是上海話和北京話讀不出來，或者不再流行的字和詞，廣東話都有，都唸得出。所以，用粵語朗讀古文最好；用粵語講解中國文學，也沒有問題。老舍的作品，教師可以用民國時代的京片子來唸一次課文（如果他會），講解也可以一樣用粵語。教學語言之爭，對於一群沒有中國文化修養的官僚才成為問題，對於強盜，才成為罪行。

捍衛廣東話 • 自己母語自己救

彭志銘（出版社社長）

呢個香港垃圾政府，豢養埋一批庸廢奴才，尤以教育局成棚窩囊，出醜完一單又一單，似誓要搞垮香港教育至甘心。成班豬兜粉腸真係愛與民為敵呀！

若非一群網民睇到教育局官方網站喺二〇一四年一月廿四號鋪了那篇反智的《語文學習支援》，咁就畀班窩囊廢鬼鬼祟祟地荼毒下一代，偽指「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矣！

我唯一最尊重的語言學巨擘容若老師，縱使新春臥牀，也來電怒罵，敕令本人必須撰文狂插教育局嗰班豬兜粉腸無知禍港；其實，就算容若老師唔出聲，我亦不會坐視莫聞。

呢劑教育局的醜聞，香港「評論界」全部被誤導去研討「廣東話」是法定「語文」？或是「語言」？好簡單啫！那是書寫和口語、文字和聲音之別而已！只要「中文」仍係香港特區認可的「法定語文」（《基本法》第九條講咗中英文皆是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的正

式語文），講乜嘢鄉下話乜嘢音嘅漢語，都應有同等地位的法律保障！無理由講普通話的地位會高過廣東話、上海話、四川話或西藏話㗎？英國從未有過「牛津音」和「劍橋音」之爭的法律問題，點解？因為人哋懂得尊重自家文明，和愛惜先祖傳下來的文化遺產，更不會像山賊農民心態的自我膨脹感覺良好地歧視同宗文化文明。

中共管轄的地區上，久不久就有戮害古中國傳統文化的惡行，源於獨裁者之恐懼，深怕地方意識抬頭，兼常幻覺人哋「獨立」、「分裂」，於是諸多規範，力求統一，甚至人家講乜嘢口音都要管，這是精神病一種；而香港班奴才太監，愛揣摸上意，不顧香港死活，唔插佢哋又點得呢？

謊言Vs方言，政府你呃人

有低B仔問：為何香港人要捍衛廣東話？又問：為甚麼要捍衛香港廣東話為法定語言？（上述兩條問題，乃用強國蝗蟲語發音的！）

哦！很簡單啫！廣東話係全中國語文內，最優秀、古雅、有文化之翹楚表表者，睇住佢被矮化、邊緣化，甚至被政治殲滅，作為有血性的華人，怎可不挺身捍衛？第二，若香港廣東話沒有法律地

位，那在行政、立法和司法機關無澈①法律效用，咁唔只廣東話玩完，又即係《基本法》所講過啲嘢亦可廢了唔算數也②！咁等同宣布香港特區正式收皮也！

嗱！一群裝睡，或真係懵閉閉十吓十吓的立法會議員，唔該立刻提案動議，將廣東話立法確定為香港法定語啦！咁除咗對得住自己列祖列宗外，仲一定取得港人歡心的選票呀！

二〇一四年初，呢個香港廢柴政府教育局一篇打壓廣東話的反智劣文《語文學習支援》，被全球華人喊打後，匆匆「下架」毀屍滅迹，而網民也即時興高采烈地歡呼「勝利了」，喂！請勿過早開心，唔該要仔細睇清楚教育局的「歉意聲明」先吧！教育局只說：「當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出現含糊不精准（正字應係「準」）的地方，會盡快修訂，就引起的誤會深表歉意。」嗱！呢啲咪係偽術語言囉！乜嘢「註釋出現含糊不精準」啫！正確地說，係「大錯特錯」呀！市井蠱惑仔都懂：「錯就要認，打要企定」啦！身為政府部門，居然仲玩虛偽，瞞騙大眾，真卑鄙！

香港廢柴政府還信「謊言講一百次，便會成真的」來愚弄港人，白癡到無朋友。香港人，你會受騙嗎？

教育電視妖魔化廣東話

香港特區政府唔保住華夏最優美的「粵方言」外，更曾陰濕卑鄙的出賤招，幫中共政權傾力抹黑廣東話。

話說由香港教育統籌局策劃主導的教育電視節目，分別於二〇〇四年，提供給小六學生「學習」的《驚心動魄（粵普比較之二）》，及二〇〇六年給小四學生的《語文雙女俠（口語和書面語）》，皆有教壞和唬嚇學童意味之能事。

《驚》片中，有造型妖異的「魔俠」一角，聲言「要用粵語一統天下，最恨普通話了！」這魔俠用廣東話詞彙攻擊代表普通話的女俠「泠月」，最終被靚女以同義的普通話詞彙一一擊倒，展示普通話比粵語優勝一籌！

《語》片就有「口語女俠」大戰「書面語女俠」，連番惡鬥下，書面語女俠大勝，證明口語廣州話不能用於書面寫作。而據教統局官方簡介：「廣州話口語不能用於書面的原因在於它不規範，不能達

---

① 漸，音「曬」，盡也，作「全部」解，舊廣東曾自創字為「嘯」，後被用作「浪費」意。今港人以殘體「晒」字代「曬」。

② 果然，在二〇一四年六月十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發布《「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其地位可將《基本法》掃落地毯底。

到與多數人溝通的目的！」

嗱！大家睇吓呢個專門破壞自家優良文化的政權，邊有文化㗎！可恨，香港特區班奴才庸官卻從旁幫兇，不顧後果的戕殘先祖沿用了幾千年的文化遺產。

家陣，大陸政權用緊嘅北語、普通話，或稱現代漢語，只不過係中共呢幾十年間強制內地民眾使用嘅所謂「規範化語言」，跟我哋嶺南地區所講而保留咗幾千年嘅「古漢語」，唔該佢哋慳啲啦！

中共高官透過語文打壓方言，是有政治目的的，主要係殲滅地方意識，以便獨裁專制，點會再理你乜乜文化遺產吖？已無所不用其極矣！咁香港的「地方官」呢？現今的教育局理直氣壯話，上述有關教育電視短劇，是前教育統籌局嘅事，依家嘅局方「一直重視推廣兩文三語，以保持香港的特色及競爭力」喎！典型卸膊官腔到嘔！但卻不敢直接回應由佢哋發表嘅《語文學習支援》，指「廣東話唔係法定嘅語言的中國方言」點解會咁無知低能，真庸廢窩囊！

廣東話抗癌救命丹

大陸北佬為了要殲滅廣東話，已去到走火入魔、發神經的病態狀況，用盡種種打壓手段不得逞後，竟以「醫學角度」，派遣人民醫院副院長于峰及一眾偽專家聯手撰文，話「講粵語會導致鼻咽

癌」喎！仲煞有介事的在一份大陸印製的《海南醫學》雜誌內，分析指粵語獨特發音，尤以「鼻音韻母」令鼻咽和鼻竇共振刺激，引起鼻黏膜增生，形成皮性腫瘤云云。

嘩呀！咁講法，我哋呢啲淨識講粵語嘅廣東佬咪一定一定冚家死晒（正字係「澌」）、絕子絕孫？但又講咗幾千年囉喎！點解仲生勾勾嘅？全球仍有約一億人講廣東話的，都死唔去嘅？奇怪嗎？

嗱！以本人的「廣東話語文研究專家」身份地位，向大家解釋說個玄機吧！

那是十分十分簡單的拆解，因為我哋廣東話內，有五個字音正好抵銷上述共振刺激的，那五音就是「門」字部首內，有「小九能七西」的五大「性」字，此「一門五傑」乃上天賜給廣東人的抗癌救命丹呀！

讀呢五字大明咒，不特止唔會有鼻咽癌，仲會血氣暢通、身心愉快，包無血栓塞中風同肺癌，唔信？得閒大叫幾聲，還可以增強肺部健康，最好，對住香港廢柴政府啲高層或民賤團眾頭目的肉照嚟練習，包保延年益壽，長命百歲！香港是全球人均最長壽的第二位地區，是有原因㗎！

話時話，以蝗蟲語發音多講「愛國愛黨」此四字，卻易患喉癌㗎！因發音全在喉嚨蒂（近音「定」），不是由「心」而發！

北語普通話捲腳太多，又易有「舌癌」㗎！加上佢哋得「四聲」，死死聲真大吉利市（讀作「是」）過佢，點及粵語有九音，「長長久久」咁好！

要想打沉廣東話，用政治和醫學係不會成功的，最好話廣東話講得多係無發達嘅，或許仲有效啦！但我至鍾意講「小狗懶擦鞋」同「掉哪媽」喎！吹呀！

掉佢老母支筆過海

廣東佬講「掉哪媽」，清火去熱，無喉嚨痛，咁請睇吓「草泥馬」呢三個字，又有無發現有乜唔妥呢？

如果，「草泥馬」用粵音嚟讀，擔保人人聲大大，不過，一轉咗以「煲冬瓜」讀呢？成班北佬就個個口啞啞，好似讀完要處死咁！

究竟，關「草泥馬」三字嘅字形事吖？定係字義？抑或字音呢？

同一道理，廣東東莞石碣鎮袁崇煥紀念碑，下邊銅牌刻住「掉哪媽！頂硬上！」六字，近年，俾當地「領導」飭令鑿走；香港報章報道時，竟將原裝碑文箇個「掉」字，打咗格仔，矇查查；更經典嘅，係有一份大報，居然裁走個「掉」字，出街圖片得番「哪

媽！頂硬上！」五字，斬頭示眾。內文則用個「X」嚟代替！

大佬！驚乜呀？咁慄！點出嚟行傳媒呀？唔係話要如實報道㗎咩？

「掉哪媽」唔得，咁「操你媽」、「幹你娘」又如何？甚或「去你的」又怎辦？關字形、字義、定字音事呢？請問！

假如，六八九大話精調吳得掂條廢柴嘅阿媽過海，入大帥府，專責調理鹵味，煲大檸樂，咁點落筆呢？

瓜咗三百八十年嘅明末大將袁崇煥，力抵後金（即前清）兵攻，用「掉哪媽！頂硬上！」一詞激勵士卒死守，終於捱過了關，解困兼紮職，這也是佢個石像紀念碑下刻鑄箇六個字嘅原由典故，咁嘅「救國宣言」，極有愛國教育價值嘅名句，唔好好保存同弘揚，重要剷平於無形，唔畀人挑那罵一聲，就有鬼嘞！

二〇一〇年，廣州市政府透過政協網站，向市民查詢多用普通話廣播嘅意見，話藉此適應將來亞運會，同埋打造廣州成為國際大都會喎！旋即引起廣州人奮起反抗，直指中央立心殲滅粵方言，搞出一場廣東話捍衛戰！

究竟，中國政府歷來點打壓粵方言呢？

先睇睇中國嘅近代歷史——

最憎南方方言嘅人，應該算係紫禁城內嘅清朝皇帝。雍正不滿福建佬跟廣東人結義，組成天地會反清復明，於是用「鄉音不可通曉」為由，於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下令禁止兩省嘅人「習為鄉音」，更命令督撫設立正音書院以「正」之！「正音」者，係用《康熙字典》及《音韻闡微》二書作準，即以中州音為正音，但係，直至雍正駕崩瓜老襯，都仍未能遏止閩粵嘅土話鄉音。

到咸豐皇帝就更弊，粵人李文茂喺咸豐四年（一八五四年），率領紅船弟子加盟太平軍起義，到廣西自封為王，對抗清廷，就係咁！朝廷下令，焚毀佛山瓊花會館，禁演粵劇，違者斬，搞到粵劇受到空前打壓，瀕臨滅亡。由於太平天國嘅天王洪秀全係廣東人，連詔書都係用廣東話寫成，所以粵語就係太平天國嘅「國語」。

嗱！唔好睇輕語言嘅政治力量，太平軍老早便明白清廷利用「正音」嚟「統治」漢人，所以，佢哋提出《奉天討胡檄布四方論》：「中國有中國的語言，今滿洲造為京腔，更中國音，是欲以胡言語惑中國也！」

透過語言，爭取民心，團結民族意識，係鬥爭嘅手段。

不要以為只有外族（清滿州人），才會用語言作為政治工具，藉「語言統一」嚟滅絕漢人各群族的結連，有利統治，原來，咱們

中國人亦好呢味嘢。一九一一年，中華民國成立後，翌年，召開「讀音統一會」，提選國語，及制定消滅方言政策；原先，「南京官話」勝出，後覺得其雜音繁重，遂改用北平話做國語。坊間傳說粵語比北平話少一票而落選，乃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顧全大局，棄母語、投北話之故，其實，呢個講法不正確，因一九一二年，揸莊嘅，係袁世凱，孫中山無份投票！

到一九三六年，國民政府更頒令禁拍、禁映粵語電影，此粗暴舉措，本是作消滅方言嘅試金石，幸好，當時大部份粵語片喺香港拍攝，影響有限，跟住，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嘅工作亦陷於停頓，「國語統一」呢個口號才無人理會，殲滅方言亦無人執行！

中共執政後，深信馬克思那套集權理論，話統一語言，就可統一世界。

一九五八年，中央政府提倡普通話教學，到一九六〇年全面取消各地母語教學，目的顯而易見，用溫水煮蛙，死咗都唔知乜事！

與此同時，佢哋喺廣東推出廣州話方案，唔准粵語方言有關嘅出版，箇陣，研究粵語嘅，只得香港、澳門同美加；及因為大陸封關，留番香港呢個對外窗口，無端端令廣東話自由發展，隨住大眾

娛樂文化，「流亡」海外，更顯光芒。

八十年代後，中國改革開放，中央政策曾轉用懷柔手段治國，讓內地那本《方言》雜誌復刊，每省都有方言學會成立，研究方言，算係中興好現象，普通話亦有粵語化啖，例如北語嘅「許多」、「很多」會講為「好多」，連溫家寶總理都話「唱衰」，表面看來，河水不犯井水，求大同、存大異，大家和諧生活咪好囉！反正，方言唔打都自動流失啦！返學考試要用普通話，重邊有人有癮研究本地方言吖！最串嘅上海，新一代咪逐漸不懂講滬語土話！阿公點會唔明？咁為乜突然玩針對，搞小動作？用普通話代替粵語廣播呢？理由很簡單，就係有人利用語言作政治工具（騷出得政協牌頭，唔慌會無緣無故嘅）嚟推行對弈大比併！是否反映咗大陸內政不穩，內鬥不斷，暗湧滔天呢？吓！

五四時期嘅文字改革先鋒，胡適曾力言話：想殲滅方言，一萬年都唔使旨意。

方言土語，同風俗習慣一樣，乃維繫一個地方宗族嘅核心價值，不容冒犯，捍衞自己宗族文化，猶如保衞國土之重要，神聖不可侵犯，如果，有人唔知地（音「訂」），玩大咗，咁唔係國民之損失，國家的悲哀！而係，掉佢老母支筆過海啦！

我係香港人

毛孟靜（立法會議員）

前半生老跟人說，我的母語是上海話。母語，不就是媽媽的話嘛。生於江浙家庭，記憶中，直至五、六歲前，彷彿都講不了廣東話。童年一大幅連續定格畫面，是投訴肚子痛，媽媽會來邊撫按娃娃肚皮，邊唸滬語童謠：天無忌，地無忌，陰陽無忌，百無禁忌，只好到山上造窩，莫到小人肚皮造窩……

上海話的小人，泛指兒童，跟君子小人之說無關。而窩，讀go，由是窩貼是 go tieh；而皮，講 bee。成年後，會得教老媽外遊際想吃牛肉，就跟西人說「皮膚」，bee foo、beef。日子有功，自小懂得在語言之間游走翻譯。近年一大這個成就，且是寫得出連會講滬語的李怡也不知所以然的「賊腔」。賊腔一詞，聽上去有點兇，但在敝家鄉話中，只是批評人造作扮嘢罷了。

至近中年，根深蒂固地，從來自稱是上海人，以籍貫分家。老老實實，也不是道地上海，祖先來自浙江寧波。一九四九年大陸赤

化，老爸走難前最後的 port of call，亦非上海，而是南京。

在外頭用英文自我介紹，固然會說 I'm from Hong Kong，近年且加說 I'm a Hongkonger。九十年代，在法新社任職末期，同事中有個是語言學碩士的美國女子，自她處驚悉——真係驚悉——母語的一大定義，是一個人不加思索用來數數目的一套語言，就是此人的母語：The language you use to count without thinking is your mother tongue.

一、二、三、四……我數任何東西，用的從來是廣東話！

也即是說，本土生土長香港人，即使家裏是老一代的南下移民——阿拉爹爹姆媽半個世紀下來都勿肯學廣東閒話——我這一輩就已給百分百同化，是不折不扣的香港人。

每隔一段時候，總就有人跳出來說，粵語粗糙，未能入文。有說，一個「幾」字，像問「幾時」，就難登大雅之堂了。真係？那「明月幾時有」一句名詩，點算？而「傾偈」，是必要改回「談天」？老早讀董橋舊文，老早知古文乃「謦欬」，語出莊子之「昆弟親戚之謦欬」唻。

英殖終結際，已有甚麼學者在所謂知識份子刊物撰文，要把漢語唐文天下大一統。香港說朱古力？不對，還該改回巧克力，云

云。其時已好生本土意識，忙不迭在報紙專欄文字中反駁：咩事？我係講士多啤梨但識寫草莓，得唔得先。

我的一大政治口號兼理念，是「拒絕大陸化」。話說大陸化，語言是一大戰線，要抵擋文化清洗，不步西藏新疆後塵。年來左報一籃子罵人，鍾意用上「瀨沆一氣」。縱是古文，卻是大陸腔調。有人就是拒絕明白，那一款行文語氣，就是共黨語言、洗腦文字，要抵制的，是中共用來統治人心的工具。

教育局夠膽說粵語非法定語文。哈。那立法會九成九九的時間都用廣東話發言，豈非就犯了法？香港人係講香港話，你奈我何，差人會拉乎？教育局那篇奇文已刪。說奇，卻也不奇；中共要政治清洗香港裏外之心，路人皆知。

廣府話

劉天賜（資深傳媒工作者）

應該是中學生通識吧，香港同胞日常交談、說笑、「食字」、談情、粗言等等用的粵語（廣府話）乃有非常長遠歷史。古代華夏的語言，即是「雅言」，廣府話的祖先。雅言的基礎是以黃帝為首的華夏部落，聯盟使用的原始華夏語言（最早華夏語言了）。到了周朝，發展成為中原一帶的民族共同語言，因為共同承認，共同使用，官方交往，文人講學，祭祀活動，都使用雅言了。孔子：「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秦漢擴大版圖，採用中央集權式統治制度，一國之文字統一了，一國之共同統治語言（官方語言）也應用。此即官方用之雅言。雅言首先在南方廣信地區使用。廣信，是古代嶺南地名，它是以漢武帝「初開粵地宜廣布恩信」之「聖旨」命名，是監察嶺南九郡的「交趾刺史部」所在地，以廣信劃分廣東、廣西。有關古廣信

所在位置，有今之梧州、封開兩種說法。雅言便成為各土著部落的共同語，就像春秋戰國時各諸侯國交往都使用雅言一樣，形成雙語制，在自己部落內使用自己的母語方言，對外交往則使用雅言。這個模式沒有甚麼「法定」「不法定」。

這便是經二千多年中原不斷變局而只有嶺南地區保留了最早華夏語言、語法、措辭、九音的原由。廣府話可引的例子不勝枚舉了。

早前，香港教育局《有關中、小學教育語文學習支援》網頁，提到：本港需發展兩文三語，「雖然《基本法》規定中英雙語為本港法定語言」，但近百分之九十七港人，都「以廣東話（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作為家居及日常交際的常用語言」。文中更指普通話是中國的法定語言。

廣東話是一般叫法，廣東甚大，潮汕語、台山語等方言亦是廣東話，該稱廣府話。法定語言，便有濃厚的排斥其他方言的意味，其他方言都有地位的，不必「法定」才有價值及地位。普通話是希望統一全國共用一種語言而訂立的，由是鼓勵大家應用，不宜含有排斥其他方言的用字放上去。「普通」兩字已經清楚不過了，形容

是「普及語言」，用詞便合適得多了。中國地大，山川阻隔，各地自成各地風俗與語言，有歷史有文化，亦即有根。無論多少人應用，皆該鄭重保留，保留最佳最現成方法就是應用。生活上的應用不能計較「法定」與「非法定」。

香港、澳門要保留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則更加注重我們生活不能脫離的廣府話。學習普通話不宜反對，是全國普遍應用之語言。不因如此而令其他方言消失，各方言皆在各地區發展承傳，而又能互相融滙於普遍使用語言之中。

既然香港承傳了來自廣州語言，亦是中原古華夏語言（國寶級）的繼承人，我們須更加珍惜，不可排斥，不可消滅。

母語為「生命體」

文潔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近日兩宗社會事件，跟廣東話密切相關。

教育局在介紹「語文學習支援」網頁的文章，注釋廣東話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起不少港人的反感。教育局隨後予以澄清：「廣東話是大部分本地人口的母語和中文口語。教育局致力提升學生兩文三語的發展。」

近日備受社會關注的印尼傭工涉嫌受僱主虐待的連串事件，也被認為跟廣東話相關。學者何建業便以印傭聽說粵語的能力，檢視印傭在香港的待遇，並探討其成因。一般人印象為菲傭善用英語，教育程度較高；印傭因為多照顧長者，於就業前有接受粵語訓練的機會，構成了她們在香港工作較為有利的生存資本。她們來港工作以後又得到進一步拓展，使她們在外籍傭工中間造成了差異，雖然減卻了的語言障礙未必就能使她們得到較佳的待遇。

也有學者以個人經驗及具體事件，整理出英語、普通話及廣東

話在香港學界中的複雜互動與角力。不少學者在大學「國際化」、「重英輕中」的壓力下作出調適，包括怎樣以英語教授中國文化的題材，如何在中文與英文的學術出版裏作出取捨。此等掙扎皆因本地大學現今趨向採用的全英語教學語言政策（MOI），以及以英語出版等同國際級出版。學者的結論概括且非常中肯，認為以廣東話思辨本土議題，較能深入文化的基本並激發學生學習的志趣。例如馬傑偉便強調母語作為文化肌理的重要性，並肯定廣東話多作為生活的「生命體」，是本土研究的原材料。他主張借用英語學術的資源，倡議以廣東話教授本土性強的科目，並努力在大學體制內外開拓粵語討論以及中文學術書寫的空間。

另一學者許寶強在「香港廣東文化的未來」研討會裏，也坦然提及放棄母語授課對不少本地教育工作者所曾帶來的苦悶、恐懼、羞恥甚至犬儒等心理狀態。

母語或中文教學在香港並不曾達到過一致的共識，更莫說以廣東話授課，其中複雜的心理跟殖民地的職場或對畢業後工作前景的憂慮不無關係。許寶強回顧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教學語言政策，至九十年代「國際化」如何成為高等教育的議題，分析了二〇一〇年教資會發表的《展望香港高等教育體系》報告書，並見出其

中「國際化」(Internationalization)之取向，及有關的種種關注與政策。許氏指出此等構思視英語授課為國際化的指標，並無助於本地與非本地生的融合，達成國際化的效果，甚至會令部份學生失卻自信及學習的動機。

許寶強以波蘭尼(Polanyi)「所有知識都只能是個人的知識」的理論作結，強調教育設計必須因應在地的社會脈絡，並另於學習的情感與熱誠，他提出以母語學習為前提，進行情感培育培力及學習的生活動力。

「標準」語言

教資局近日把本地大學「國際化」的主張，改用了「Global Engagement」的用語。我們還在推敲這改動的意涵時，對於教學以英語為主的爭論又再啟動。這回是英語教學者發表心聲，坦言同事在班房用廣東話教學，容易在教育評估上得到較高的分數(這個現象說明了些甚麼?)。我記起每逢有母語為英語的老師在課堂上說一兩句廣東話，不論讀音咬字是否標準，都會贏得一陣掌聲。相反說來，母語非為英語者說起英語，都感到如果說得不夠標準，可能惹來的眼光及壓力。

語言是否說得標準，外來的「陌生人」、「他者」、「非我族類」的身份差異或政治，其實來得十分直接，先不說英語而以廣東話為例。社會學家，又是融入香港的新移民（馬來西亞籍華裔）的陳允中，觀察到香港基層相對於中產，少有對「標準」廣東話的要求。基層對鄉音及普通話的包容力強，皆因以團結共處和互相幫助作為生活的基礎。不同群體（專業及菁英者、內地高等教育工作者、荃灣、灣仔基層街坊、新界菜園村）裏的語言情況，顯示回流菁英沒有本土化的壓力。他們多用英語，少用本地語言，有別於香港基層以廣東話為主。

基層街坊說的廣東話非常多元，包括夾雜着各種鄉音之廣東話，根本分辨不出有所謂標準的廣東話及俗語，亦無所要求。陳允中認為生活所需與語言策略息息相關，街坊對不同語言或廣東話的包容，在於團結就是力量，以便爭取各種共同利益。基層每逢有溝通的困難，都會努力學習用對方慣用的語言，或互相幫忙翻譯，務求避免因語言差異而「礙事」。另一項重要的結論也依據着同一思考：即語言政治與社會關係。他認為香港人反新移民情緒及本土意識的提高，其實在乎香港人自身與中國「鄉下」的聯繫。關係的疏離，會視帶鄉音的廣東話為「不標準」，忘了它原來的多元化與包

容性，為了製造差異的身份政治。

文化學者陳錦榮（John Ernil）亦指出所謂「香港身份」或「香港廣東性」的探討，依然是忽略了對族裔及種族差異在本土的身份政治及角色上的關注。他以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Simmel）的理論，說明「陌生者」產生之社會功能。「陌生者」的想像經過正面到負面的階段，由對「內在者」有利的位置到負面的陌生性，包括二十世紀說的「外地勞工」或「非法移民」。陳錦榮明言應該關注南亞少數族裔「如何被規範、被構成、被次級化，以及被隱形於以香港廣東性主導的固有論述之中」。

陳錦榮提到香港的粵語人口，在以排斥的態度對待陌生人以至內地人時，所標榜的依然是所謂「錯誤」的廣東口音。言下之意，討論香港廣東性或「香港本體性」的同時，應自覺到過度的自我識別，會如何模糊及隱沒了香港的種族組成及差異。陳說本地學術界對種族與種族主義之間的張力，探討嚴重不足，還不時在舊文化理論的沿用下（如「混雜」理論、「眾聲喧嘩」等），提出陌生者的政治理論。

此情無計可消除：「粵語授課」有感

朱耀偉（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教授及香港研究課程主任）

較早前本港一個碩士課程，據報有內地生選讀註明「以粵語授課」的科目，上課時卻要求老師改用普通話授課，結果掀起一場風波。最終校方維持粵語授課，但教師在有需要時會用普通話講解關鍵詞句，又為聽不懂粵語的內地生安排額外的普通話講解環節。

如此做法，尚算符合情理。其實以普通話教中文的問題，近年已一再引起爭議。筆者一直認為普教中可以提升中文寫作水平是一個美麗的誤會，論者如鄧仕樑教授便曾論證，口語跟書面語原是兩個不同系統，「言文合一」的說法根本不能成立。

香港確有需要提高普通話水平，但那並不等於不用粵語教中文。粵語一向給人難登大雅之堂的感覺，但不少論者已分別指出，粵語不少用詞十分古雅，音調也有其獨特之處，如念唐詩宋詞時便更合音律。近年普通話日漸普及，粵語不夠正統的迷思就顯得更加真實，而且在流行文化的層面，這種迷思亦進一步播散，情況叫人憂心。

粵語國語　各有勝場

近期本地音樂人馮翰銘推出「為詩詞插上爵士翅膀」的《樂章》，嘗試為經典中國詩詞譜上現代音樂，結合文學和音樂的創意令人激賞。碟中所收錄的大部份是唐詩宋詞，唱的卻是普通話，就難免叫香港聽眾有點失望。音樂人為詩詞譜曲的文學情結，創作人跨越中西的實驗精神，我都十分欣賞；華語流行音樂市場龐大，以普通話將詩詞入樂較為容易，我也完全明白。

然而，在一篇訪問中提到的觀點則叫我深感無奈。《南方都市報》記者在新聞發布會上訪問馮翰銘，問及有關《樂章》選用普通話時有此回答：「我覺得國語唱得比較好聽，廣東話唱有時不太適合。我有請教過一些前輩，林夕跟我說：『你選的時候很簡單，如果你選的那種語言能夠押韻、韻腳是對的，那就ＯＫ了，不需要給自己太多的煩惱。』林夕說完之後，我也恍然大悟。」

我同意林夕所言，但若以碟中主打歌《將進酒》為例，韻腳便有問題。《將進酒》聲情曲折，多次轉韻，其中如「雪」、「月」和「謔」、「酌」的韻腳，都要粵語入聲才能唱出味道。

對「國語唱得比較好聽」的說法，我更是無法苟同。碟中所選以唐詩宋詞為主，論者已一再指出，這類作品用粵語讀起來較為鏗

鏘動聽，「廣東話唱有時不太適合」之說，除了因為用粵語較難譜曲，又或要面向華語流行音樂市場之外，實在沒法叫人信服。

偷換概念　自我閹割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的「樽」，「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飲」，粵語才唱得自然。「一飲」的「飲」在粵語是閉口音，以普通話唱來就非常尷尬，況且普通話應用「喝」字才算標準。

《將進酒》並非孤例，《一剪梅》（又名《一翦梅》）「此情無計可消除」的「無計」也是粵語才覺自然，而《飲酒》「悠然見南山」一句的「見」，陳雲已曾細論：不論讀作見還是現，都是粵語讀來比較安適，用普通話讀則聲調高而韻尾也短促，聽起來有點急躁，並不符合詩境。

至於楊慎《臨江仙》，當年亞視播放央視《三國演義》（一九九四年版），主題曲的詞同是《臨江仙》，陳光榮譜的曲，由葉振棠用粵語唱出，又未覺有何不太適合之處。據報《樂章》歌手之一陳慧琳表示，將來會讓兒子一起聽新歌學詩詞，希望他們不要只聽普通話版本。

當然，個別詩詞用普通話來唱，或另有味道，亦可能更配合譜曲人的爵士曲風，但那並不等於「國語唱得比較好聽」。現實的考量偷換成美學的理由，正是教學制度所要揭櫫的另一個迷思。

雖然粵語很古雅，仍有不少人認為在正經場合不宜用粵語。筆者曾在中文系任教多年，有幸聽過不少中文學者的粵語演講，深切體會到他們在講論高深哲理和解說精闢文字時所用的粵語，是何等優雅怎樣得體的。假如他們不再用粵語授課，不但是香港文化的自我閹割，也是那些願意努力適應不同環境，希望認識中國文化多元性的內地生的重大損失。《觀書有感》說：「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文化精神，原來如此。

我十分崇拜的詞人林振強逝世十周年，曾說「做個勇敢廣東人」的他，除了歌詞觸動我心外，「廣東話是我唯一說得流利，聽得完全明白的語言」亦令我深有同感。十年過去，追憶長流細水，謹以此為念。

粵語永遠反叛！

鄧小樺（香港文學生活館理事會召集人）

繼教育局官網說粵語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而引來猛烈指摘之後，網上又流出二〇〇四年的教育電視，裏面普通話女俠打敗想以粵語統一天下的「粵語魔」，有將粵語妖魔化之嫌。許多網民，包括一些文藝朋友，為此怒火中燒不止。

長期被官方邊緣化

我沒有看那短片，只分享個人經驗。我二〇〇〇年初開始幹些代課補習之類的工作，赫然發現學校裏開始有滅粵之勢，例如貴族中學的校長說，「在我間學校裏只能聽到英語或普通話」。引人憤怒的粵語魔教育電視是二〇〇四年出爐；二〇〇四年確實有一場語言戰爭，中大反英語化，我參與討論和運動，吸收了很多關於中文及粵語教學的討論，把書架上塵封的學系論文集《香港語文教學反思》翻出來，以前的中文系系主任鄧公仕樑在序言裏說，是否以

普通話教語文，與教學成果的語言能力高下並無直接關係，不能把北京官話直接等同於正規書面語，否則北京的學生就不需要語文課了。輕輕一句反駁之有力，到現在還記得。以下論點則應是來自蔡寶瓊教授：非母語教學，會令學子接觸這世界時，像有個玻璃罩着，沒有投入感，而這可能就是目的本身。我在全天候普通話教學的學校裏代過課，完全就是這樣。

文學創作要用粵語不容易，而有些作家選擇背負這種使命。粵語是長期被官方邊緣化的語言：英語和普通話，都是統治者的語言，相對而言粵語則是被統治者即人民的語言。用粵語創作，就是選擇背負被統治者的身份而堅持以自己的方式反抗。有人說「勿讓粵語淪為次等語言」，其實，歷史上粵語一直被視為次等語言。像電影《白宮管家》，矢志打破種族隔離的黑人女孩，必先敢於擁抱自己恥辱的真實身份。

港式粵語與「三及第體」

大家都知，港式粵語和廣州講的粵語，是有一點分別。我當然是喜歡港式粵語，它既有更多古語痕迹，也有更多外來語影響，令港式粵語豐富有活力。看到有網民說「不要讓其他語言污染粵

語」，這種觀念我不能同意。如果不能與其他語言互相影響，這語言就死氣沉沉。香港早有「三及第體」，指文言、白話、方言交雜的語體，極富韻味。中英夾雜，網絡潮語，都是素材，高手的話都能裝嵌出好作品。

二〇一三年「身為少數」朗誦會上，以客家語寫作的台灣作家甘耀明說，很羨慕粵語有好多字仍能寫得出來，不像客家語已經多半音傳字不傳。話中有沉痛。因此，繼續使用粵語，多講多寫，為它的歷史鉤沉，以創作碰觸它的邊界，就已經是重要的保衛。我們有形形色色的保衛軍，陳冠中寫《金都茶餐廳》，鉤出「尐」、「渠」等廣東話舊字，是他心頭緊張的事。另外，周耀輝也曾說，粵語有九聲，填詞份外困難，但一眾粵語填詞人都很有志氣，要「試下粵語呢樣嘢可以去到幾盡」。所以，有時唱K歌也有另一種觀察趣味。以前統籌策劃寫作教育課程，有想過要特地開一課來講粵語寫作——粵語寫作要有風格，比書面語更難。我心裏一直記着幾個人，深入淺出甚至可以給中學生做粵語教材，裏面當然有謝立文。

粵語犀利在於本身就難

黃碧雲《烈女圖》，轉化《晚晚六點半》的阿婆口述歷史語言作

為敘事聲音，那種吟哦口氣粗鄙俗語，在典雅男性主體敘事傳統裏，盡顯一種大紅艷綠大花粗布的魅力。董啟章在多本小說裏都有以粵語去處理深度思考，他說因為他不想粵語只代表低俗或親切，也希望它能夠作為哲學思考、表達複雜情感的語言。二〇一四年我在自由野策劃的「就是粵語詩，粵語就是詩」詩歌音樂會，就是希望集中地展現粵語的種種可能：宗教、哲思、批判、冷峻、豪邁、現代主義……飲江詩裏的上帝常常是講廣州話的（想像上帝跟你說「係你自己攞嚟嘅」）。游靜是少數在詩裏罵人和吵架的詩人，她從來不避粵語的尖刻銳利。羅貴祥的粵語象徵城市與世俗，他這樣冷靜。蔡炎培是視粵語如遊戲了，崑南則用粵語來處理港式地道題材。這個名單至少要加上力推方言詩多年的關夢南先生（他當日沒空）。

搞創作的人同此心：藝術以創造去解決問題。正面建立，不須踩低別人抬高自己。粵語犀利，係因為佢本身就難，而且成份好雜，所以練到我哋周身刀繞指柔。因此，粵語係殺唔死的，亦無話要統一天下，佢就係永遠反叛，有容乃大。

尊重粵語，珍惜粵語

陳寧（香港作家）

語言文化有其歷史與尊嚴，不容隨意貶抑。粵語源遠流長，不僅不是現在所謂官方普通話的「從屬」（方言其一定義），它甚至是現代漢語的重要構成。粵語更非有語無文，口語云廣東話，無一字一句不可以寫出來。

早在十餘年前，後殖民理論盛行，我在英國研究院曾出席不少學術會議，關於語言方言之討論，多不勝數。座中提出的例子，像粵語這類在香港通用的，連語言學文化學權威也不敢隨便定義為dialect，對漢語稍有研究的專家，則從歷史、文化、社會等各方分析判定粵語為獨立的language。這不是甚麼深奧的學術論述，絕對有理有據可依，不由得政治手段干擾。

民間群起挺粵語，無非是憂心政治打壓（滅種滅語），像前幾年廣州出現的撐粵語運動，也是一場捍衛文化之戰。總之，關於粵語的討論，愈多愈好。更細緻地論及不同地區的粵語分別（如香

港、廣州），甚至不同年代的用語差異，亦顯示粵語博大精深、多元活潑，都是有益的對話。還能說話的時候都不說，以後想說就「失語」了。

絕對可參考台灣的例子，從一「語」獨大到尊重多元文化與語言，民主之路走來，也是語言的奮戰。且引已故台灣作家郭松棻的小說《驚婚》一段：「台灣人首先在語言上失勢了，這畢竟是被異民族統治的悲哀，母語被剝奪了，被強迫塞進了殖民者的語言，那好像嘴巴被滿滿塞了一口穢物。光復了，他重新拾起母語，畢竟太遲了。在日常生活裏，語言成為一場看不到出路的死戰，台灣人不能表達自己，被剪斷了舌頭似的。有理也難說清。」

我認識一些台灣本省朋友，現在才慢慢從父母那裏一句一句學習台語（閩南語），感覺像「重新出生」，既複雜又珍貴，卻因此更能理解前代人的傷痛。台灣不乏學者與作家整理與書寫這些經驗。

人必自重而後人重之。香港不曾經歷台灣那樣兩度被剝奪自由使用母語的權利，英國人來了，重英輕中是必然的，卻沒打壓貶抑粵語，我成長的上世紀八十年代，是粵語流行文化最興盛的年代。學校裏的中文課，老師用粵語教古文，叫我們背誦唐詩，我從不以粵語為恥，不覺得它是低下或次等的語言，雖然寫與講的語言不盡

相同（算是香港特色），但也只是擴闊了我對語言的認知和視野。語言很寬廣，狹隘的只是人心。

我深以粵語人自豪。幾年前一時興起，做過「誦讀劇場」，探索粵語從書寫語言延伸至表演語言的多變。在香港、台北與廣州等地巡迴演出時，屢遇觀眾問起為甚麼是粵語，我總是這樣回答。劇場活動在外地引起一些討論，包括文字與語言之間的關係，亦令非粵語觀眾體會到書面粵語的優美聲調與韻律，對粵語文化產生興趣。廣州那場不乏北方觀眾，他們也能投入，感受到文本的獨特活力。後來我獲亞洲文化協會頒發獎學金前往紐約居住，其中一項「任務」就是拜訪當地前衞劇場工作者，交流這方面的經驗。

我的實驗還只是書面粵語，一點皮毛已經迷人得不得了。口語廣東話，更加唔使講，可俗可雅，生猛傳神。最重要的是，這是有生命力的語言，不是可任人踐踏的死屍。

尊重粵語，珍惜粵語，推廣粵語。這是香港的文化遺產。

（原刊於《明報》副刊專欄，二〇一四年二月九日〈粵語不是方言〉及二〇一四年二月十六日〈珍惜粵語〉，此文乃修改、合併二文而成。）

方言與槍炮

區家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教育局網頁一文，煞有介事地解釋廣東話是「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無必要又無厘頭引起爭論，教育局最後道歉了事。

首先，教育局的文章，混淆了「語言」和「語文」，香港「法定語文」是中文及英文，但無所謂「法定語言」。「語言」和「語文」不是同一回事，人類文明發展，「語言」溝通早就有，把語音變成文字，即書寫「語文」的發明，只是幾千年前的事，世上有很多文明，有語言無文字。

至於甚麼是「方言」，甚麼叫「語言」，「方言」是不是「語言」，涉及定義，從來爭論不休。縱觀古今中外，「語言」與「方言」之辨，界線模糊，隨歷史、時地而變。當中，最有意思、解釋力最強的說法，應是這句：

A language is a dialect with an army and navy 或這句的變種 Dialect is a language without an army。

簡單而言，「方言」或「語言」，由權力界定，「沒擁有軍隊的語言，就叫方言」。翻查 wikipedia，這句話是語言學家 Max Weinreich 在一次演講中從發言意見中聽到的，他認為非常有啟發性，亦傳誦至今。若以此詮釋，廣東話是方言。

不過，中國的方塊字，卻令方言語言之爭，多了一個有趣角度。往日周遊列國，常有一個問題在心頭：為何常聽聞有歐洲人「精通八國語言」，就是很少聽聞有中國人「精通八國語言」？邊想邊讀，寫過一文，同方塊字很有關係：

長久以來，中國人視中央集權、文化的大一統為理所當然。自居「天地之中」，萬方來朝，文化熔爐數千年不衰。為何如此？只緣身在此山中，歷代中國史家甚少深究，中華文明輝煌有活力，這就是答案，還用再問？

西方學者愛用 monolithic 形容中國，在他們眼中，數千年中國，不只政治上統一，文化及語言都如一塊巨石，通體質料單一，在歷史長河中，堅硬、打不碎、變化少，是文明發展的特例。

國學大師錢穆於《國史大綱》言：「西洋史如一本劇，一本劇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變換」，中國史如詩，「詩則只在和諧節奏中轉移到新階段」。西方學者觀歐洲與近東，帝國興亡波濤起

伏，再觀中國，朝代更替縱是血流成河，文化承傳相對穩如磐石，自會生起疑問，再綜觀世界各地歷史軌迹，大一統與中央集權確實非常態。

當今尚存的文明古國如印度，英國人殖民統治前，大部份時間是小城邦自治，如今仍有二十二種官方承認的語言。歐洲大陸，面積如中國，有五十國家，四十多種較通用的語言；非洲大陸也沒有統一大國，南非有十一種官方語言；南太平洋巴布亞新幾內亞，山地原住民居於深谷，與世隔絕，部落之間老死不相往來，一個大島，竟演化出八百多種語言。回頭看中國，「頑石一塊」的形象確有深究的需要。

西方早以「東方專制主義」解釋，因灌溉與治水等大規模工程的需要，「中央集權」的管治方式有優勢。久而久之，民眾於亂離之中，渴望安穩生活，自會把夢想投射到統一與皇權之中。美國學者戴雅蒙則還原到「地理決定論」。中國有一塊異常大的腹地，黃河與長江流域，交通便利，平原廣闊，有利原始社會部落文化的融合。歐洲大陸則有眾多半島或大島，中有山脈海峽阻隔，歐洲大陸河流較小，流域又不廣，故各民族溝通較少，文化多元（Guns, Germs and Steel, Jared Diamond）。

研究中國大一統這文明「特例」，還有一個很多人忽略的重要元素：有甚麼東西是中華文明獨有，而且流傳千古，至今未變？正是方塊字。

我們常讀到某些西方名人，形容他才高八斗，「精通八國語言」之類，心想怎麼可能？而且為何總是歐洲人才有這種語言天份？

語言會演化，大家都知道歐洲多國語文頗為相似，意大利、法國、西班牙、葡萄牙等語言，千多年從拉丁語演化而來。歐洲語文分支速度快，乃因為是拼音文字，一旦方言出現，每種方言都能拼出自己的書寫文字。有語言學家估計，語言每一千年，有兩成詞彙會演變得完全不能辨識。即是說，今天的法國人如果在時光旅行中遇上一千年前的法國人，有兩成字眼有如雞同鴨講。

語言各自演變，同一語言會有不同口音；地域差距與阻隔，繼而令不同口音發展成方言，當方言以拼音文字作紀錄，發展成書寫文字，一般會被視為新的「語言」。地球上絕大多數通用的書寫系統皆屬拼音文字，中國人的方塊字是特例。

然而，單從發音來說，西班牙語和葡萄牙語甚為相似，兩國人民大致可猜度對方說甚麼，粗略判斷，相似程度較潮州話與廣東話

更接近，又如瑞典語及挪威語，發音相近，但我們不會說誰是誰的方言，因為它們有各自的拼音書寫系統。我們可以想像，如果漢字是拼音文字，早就不存在着一種統一的「漢語」，每個地方會根據自己的方言，發展成不同的書寫文字，變得不能溝通，語文隔閡增大，地域意識亦會加重。但中國傳統是象形方塊字，字的寫法不可能隨發音而變，所以縱使方言出現，也難反過來創造新的方塊字。

一個潮州人來到香港，他懂粵語、懂普通話，也聽得懂閩南話，又懂說英語，語言能力按理應接近歐洲人所謂「精通五種語言」的水平。中國方言差別極大，廣東人、四川人與上海人，基本上不能以方言交談，全賴頑固少變的方塊字，不單令十三億人能溝通，數千年文化一脈相傳，到今天我等南蠻，仍能以粵語誦讀唐宋詩辭，細味古人的溫情暖意，感受千古絕唱之鏗鏘聲韻。中國人的文化認同感千年未變，大一統思想根深柢固，中華獨有的方塊字是主因。

所以，那些連廣東話上海話也看不順眼，擔心地方意識抬頭，甚至害怕「分離主義」的權貴們，請不必憂心，一天我們仍用方塊字，大一統的向心力會延續，放心。

港人捍衛粵語理所當然

黃世澤（時事評論員）

有眼利的高登網民發現教育局網站一篇文章〈語文學習支援〉竟將粵語描述成「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引發軒然大波。網民猛轟教育局故意「矮化」廣東話，發起一人一信促教育局澄清。民意壓力之下，教育局突然移除這篇文章，在「最新消息」一欄，登出一篇題為〈『兩文三語』正面睇〉的文章「道歉」，指文章當中有關「廣東話」的註釋「含糊不精準」，承諾會盡快修訂，意圖安撫民憤。

但是，公眾是不會對教育局的所謂聲明收貨的，因為教育局都沒有採取實際措施確保粵語在香港的法定地位。

最具爭議性的就是普教中政策。明明大部份香港人的母語是字音系統與普通話不同，保留較多的古漢語成份與唐詩古文相近的粵語，但特區政府偏要香港人用平常家中不用的普通話來學中文，聲稱這樣才能提高中文水平。這種混賬政策，連小時候家中用普通話

的筆者都看得出與西藏實行的消滅藏文政策源出一轍（筆者是居港華裔印尼人）。既然教育局沒有廢除普教中政策，那麼市民怎能相信教育局網站上那篇文章只是含糊不精準，而非有意為之呢？

在英治年代，《法定語文條例》以至日常學校教學都沒有訂明中文即為粵語，市民普遍都接受。皆因為英國人在普通法傳統下，一般尊重成例，除了法律條文本身外，亦會參照當地的風俗習慣執行法律。因此在英治年代，香港沒有人會懷疑中文的具體定義。

但中國既沒有尊重成例的傳統，更有在其他省市消滅當地語文的前科。除了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上海話也是被中共有系統地在上海政府和學校體制內消滅。因此，如果沒有具體措施保障粵語在香港地位，香港人是不會感到安心的。

如果中央，以至梁振英政權，有誠意向港人保證粵語法定地位的話，應該立即廢除現在學校推行的普教中政策，以及修改《法定語文條例》，明確訂明香港的法定語文，除英文外，便是以粵語為基礎的口語以及書面語，普通話在香港不具備法定語文地位。

這樣的保證是在測試中國是否有誠意真的履行一國兩制，保留香港的既有生活方式。如果中央和港府堅持普教中政策，以及堅拒對《法定語文條例》內中文的定義作出澄清，今天粵語消失，後天

可能不能跳舞跑馬。習近平對意識形態的管治越加嚴格，春晚大唱革命歌曲更是令經歷文革的人不寒而慄。這種情況下，難道大家真相信香港能獨善其身，馬照跑、舞照跳麼？

當然，筆者不相信梁振英會廢除普教中，以及澄清《法定語文條例》。林鄭月娥的新年願望竟然是香港人會對中國感恩，港府內爭着上位的人只會出賣港人利益和意願求榮。

因此，香港人為捍衞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必須拋棄幻想，準備鬥爭。沒有任何權利和自由是上天掉下來，包括香港人講粵語等看來理所當然的權利。

可以去到幾盡的粵語

陳心遙（創作人）

早前教育局有文章指：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引起全城嘩然，更延伸至普教中的爭論。

當然，每次社會出現議論，總有人走出來各打五十大板，然後語重心長地說：一人少句，以和為貴。筆者認為：讓子彈多飛一會吧！

二〇一四年一月，中國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要求中國大陸所有廣播電視節目規範使用通用語言文字，不得模仿「地域發音方式」、不得運用「對規範語言有損害的俚語俗詞」等，此禁令特別針對綜藝節目，不單止對節目主持人有效，主持人更有責任「糾正」嘉賓說的方言俚語。據知首當其衝的就是一眾在地方廣受歡迎的節目：譬如浙江電視全程用方言播出的《噶是噶非》、或只是偶然講兩句方言搞搞氣氛的，如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等，也將會受到影響。一鎚定音，乜都唔使拗，好嗎？

何為政治正確

語言是空氣，一直在你和我之間，不停流動和變化。當然空氣也有「清新」和「污濁」之分。問題是：有沒有人暗地裏操控我們「呼吸甚麼」、「要怎樣呼吸」？做過電台電視台的朋友都應該知道，九七之後，為了「政治正確」，我們的媒體都把慣用的「中國大陸」改為「中國內地」，後來推而廣之，悄悄地用大量普譯來取代行之有效的粵譯，這就已經不是爭拗「維珍尼亞」好還是「弗吉尼亞」正的時候，而是該討論：為甚麼有人替我們越過用語與用語之間競爭和淘汰的自然過程，而把結果定於一尊了？

二〇一三年，日本就有人因為日本放送協會（即NHK，日本公共廣播機構）的主持大量使用直接音譯的「外來語」，令他完全聽不懂而告上法庭，要求NHK賠償一百四十萬日圓的精神損失。此案其實是出於部份日本人對於國家濫用外來語的強烈反感。日本出於翻譯新科技新概念的需要，大量新造以片假名寫成的用語，而且大部份都是名詞。但是近年很多媒體和廣告商只是出於「潮流」和聽上去比較「有型」的原因，無必要地大量用英、法詞語拼成片假名，甚至有取代原有日語動詞、形容詞的傾向，情形就如現在TVB加Facebook加高登一齊夾手夾腳用音譯「攣啦扭耳」來取替

「農曆新年」和「春節」，或者用「揮停」代「打交」、「打架」，相信香港很多成人都聽到想「扭埋隻耳」吧。

不過，這正正係我們粵語的最大特色。香港語言文化一直就夾在中、英、台、日之間，兼容並包，從未間斷，是故我們有「史力加」（戴綠帽的意思）又有「劈腿」；有「部飛」又有「放題」。雖然出於個人選擇，我並不喜歡「杯具」、「給力」等大陸網絡詞語，但也不反對，要禁絕別人使用而後快。因為封閉，從來不是香港人粵語的本質。

文白粵靈活用

話說回來，針對日本外來語泛濫的現象，能講流利英文的小泉純一郎也都批評過。他曾在一個電視節目中表示：「學英語固然重要，但並不意味要讓自己的母語受到侵蝕。日語讓我說話輕鬆自如，更重要的是，日語是我這一生第一種學會的語言。」

為電影做國語配音的時候，為了一句我寫的對白：「為了跳舞，你可以去到幾盡？」我和國語領班討論了幾天，他說：「我們大陸人不明白，普通話會叫做：「為了跳舞，你願意犧牲多少？」」當下我微笑了：「我哋香港人，都完全可以咁樣講呀！」香港人，

至少我這一代，學的中文就是集文言文＋五四後白話文＋香港口語之大成，寫文寫詞，一直相安無事。ETV／TVB兒童節目／中小學的普通話課程等，現在硬說「簷蛇」係「廣東話」，係錯嘅，普通話要講「壁虎」。廣東話「正話」，錯嘅，普通話要講「剛才」，還有「班房VS課室」、「打卜成VS拳擊」……例子太多不能盡錄。係咪有病呢？幾時「壁虎」、「剛才」、「課室」、「拳擊」等詞統統都變成唔係「廣東話」呢？

明明香港人嘅字典入面就係文白粵可以靈活運用，視乎對象、視乎需要自由變化。現在硬要將粵普對立，然後將非普通話體系的詞語／句法，從孩子的字典中抹走。普教中可以提升中文水平，究竟從何說起呢？

粵音漢字是完整語文

劉嘉鴻（人民力量前主席）

因為教育局在網頁中誤指廣東話非法定語言，再次把「普教中」這個議題炒熱成全城話題。我是廣東文化的擁護者，堅決反對「普教中」自是不在話下。

粵語是否方言呢？在語言學上，對於不同語言之間的分類，最決定性的條件是在於語言間能否溝通。互通程度（mutual intelligibility）太低，即不能互相溝通者，會被視為兩種語言。以歐洲為例，三大語系都屬印歐語系的一支。它們分別為羅曼語系（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等）、日耳曼語系（德語、荷蘭語等）、斯拉夫語系（俄羅斯語、捷克語、波蘭語等）。每個語系中，語言之間的互通度其實是不低的，例如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能大致了解對方、德語與荷蘭語之間也是，捷克語和波蘭語亦然。但即使如此，他們也被分類為不同語言。

中文是漢藏語系，一般來說可再細分成南方話與北方話。南方話包括閩南語系（閩南話，潮州話）、閩東、閩北語系（福州話）、

吳語系（寧波話、上海話）、客語系（客家話）、湘語系（湖南話）等等。粵語自然也是南方話的一種。而長江以北，一般可統稱為北方語系。雖則說四川話、河南話、山東話、北京話都不一樣，但總算是同一個語系，基本是能聽懂對方的。

有了以上的背景，便容易分辨了。粵語和以北京話讀音為基礎的普通話，他們之間的互通度，其實要比譬如同屬羅曼語系的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之間的互通度要低得多。母語為北京話的人，若沒有學或接觸過粵語，根本不會明白廣東人說甚麼。反而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互相用母語談話，還算可以勉強理解。難道西班牙語是意大利語的方言？這當然是笑話。所以在語言學上，粵語和普通話是兩套獨立的語言系統，而不能說互相是對方一種方言。

有人指方言與否，要看官方語言為何。既然普通話是中國唯一官方語言，其他地方的非官方語言自然是「方言」了。這簡直是荒謬。首先香港不受這套所謂官方語言所限（教育局已就文首的錯誤道歉）。何況，政治上的劃分，絕對不能凌駕語言學的邏輯。德國的官方語言是德文，但在德法邊境，有小部份德國人是說法文的。難道法文變成了德文的方言？同樣在美國，難道因為有說西班牙文的拉丁裔美國人，所以西班牙文變成了英文的方言？

不過解決了方言的迷思後，仍然有人說因為粵語和普通話都同樣採用白話文為標準書面語，而白話文的語文習慣主要由北京話而來的，所以用普通話學中文會較好。這看法有兩點問題。

第一，所謂白話文的語文習慣從北京話而來這說法，只是限於某種現代語序及語法而已。但如果我們回到明清時期，看看當時的小說或文言文的語法，其實不少是更接近粵語的。事實上很多操粵語的人會發現，寫文章時若滲入一些粵語語法，會表達得更流暢、更古雅。這是因為古漢語和粵語更接近，用字十分精簡。反而現行的所謂「現代漢語」，已嚴重受普通話、滿洲語所影響，兒化音多，行文很多時候都見累贅，並非傳統中文。因此，說學習普通話語文習慣便能寫更好更清通的中文，其實非常偏頗。

第二點則是整個討論的關鍵所在，牽涉中文的特性。中文與西方語文最大的不同是，漢字是圖象文字，而西方語言是拼音文字。中文不論是以哪種形式去讀，都不影響漢字本身的意思。就算把漢字換成簡體字，同樣也是能以粵語、普通話、或其他中國語言讀出來的，因為大家看中文的字型就能理解了。但一個字怎樣讀，卻從無正統的讀法可以定於一尊的。舉一個極端的例子，大家便會明白。「金城武」這個人名，請問哪一個是正統的讀法？大陸和台灣

人都會以國語來讀這三個字。粵語區的人則會用廣東話讀出。但其實嚴格來說，這三個字是應該讀作 Kaneshiro Takeshi！這就是漢字的性質，本身完全無拼音的內在邏輯，每一個漢字，理論上都可以任意賦予讀音的。

以上剛好說明，既然中文字根本無定於一尊的讀音的，那又怎會出現一定要用某種地方的讀法（如普通話的讀法），才能學好中文這個道理呢？事實上，現在各位在讀的這篇文章，通篇是以白話文寫成，但同時整篇文章都可以用粵語發音讀出，所有操粵語的人皆會完全明白！如果說上中文課時，要講與寫一致才會令學生的中文寫作水平提升的話，那我們應該只要強制要求老師於課堂上以書面語形式讀出中文便可，根本不必以普通話教學。

但為何那麼多人會普遍認同普通話的正統地位呢？除了政治歷史因素，主要是南方語言並沒有做到讀與寫的配對。例如同一篇白話文章，我們能以粵語和普通話完整讀出來，但原來閩南話是不可以的。有些詞彙（尤其是近代的詞）沒有閩南話的對應讀法，要以其他語言才能發音。例如換成普通話讀，或者講成意思相近的閩南話口語。台灣人很多時候即使整個對話以閩南話進行，某些詞彙也會突然換成普通話，因為閩南話沒有對應這個意思的講法。這感覺

就好像我們香港人明明在講一大段廣東話時，會突然加插一兩個英文字一樣，非以英文表達不了。雖然理論上所有漢字都可以用閩南話讀出，但實際上如果把一整篇書面語文章以閩南話讀出來，閩南人也未必聽得明白，因為這樣已脫離了閩南話的語法。相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上海話和其他南方語系身上。所以上海話閩南話這些語言，面對着普通話，就欠缺了能讀能寫白話文章的優勢，自貶為方言了。

粵語沒有這個弱點。我們從來不會一直用廣州話對話時，突然有些詞語要換成普通話去讀的。這是因為粵語已經是一套完整的、經過書面化的語言系統。以粵語讀一篇文章，不會有香港人聽不懂的。這就是為甚麼我們說粵語的人，從來不認為普通話是正統的原因。因為根本不是。中文從來都沒有所謂正統讀音的。

因此，既然所有漢字都能找到對應的粵語讀音，漢字配上粵音便是一個完整的語文體系，為何我們香港人要以非母語的讀音來學習中文呢？若實行「普教中」，教的老師說不好，聽的學生聽不懂，學生的中文如何會好呢？相比之下，難道以老師熟悉的語言來教熟悉這種語言的學生，就會越教越差嗎？如果是，那一定不是教學語言的問題，而是其他問題。

若你看了這篇文章後，還支持「普教中」，咁唔該你過主。

無硝煙的攻伐

范克（自由撰稿人）

早前，教育局網站文章指廣東話「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被網民炮轟，經傳媒報道後馬上跳出來撲火道歉。但道歉不代表事件完結，網上就不斷流傳納粹元首希特拉的一句名言：要消滅一個民族，首先瓦解它的文化；要瓦解它的文化，首先先消滅承載它的語言；要消滅這種語言，首先先從他們的學校裏下手。由教育局開先例，為香港粵語作出定義，難免令人聯想起「推普廢粵」會從學校着手，兩文三語終成兩文兩語。

為甚麼中國的法定語言會是普通話，其他存在於中國的語言，例如吳語、粵語會變成方言？網民的擔憂，亦胎合語言學家 Max Weinreich 的看法：語言就是擁有軍隊和海軍的方言。伴隨普通話的正是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力量，或者說普通話本身就同一支軍隊一樣。如果推普在香港進行，一場無硝煙的攻伐不免會發生。

語言的存在，除了用作溝通和書寫外，更會影響人的思考和理

解方式。一種語言的興衰代表一個民族的興衰，語言的存亡代表民族的存亡。深明此道的統治者為了要令人臣服於政權，控制人民的語言就控制他們的思考，控制思考就可以消滅文化和歷史，令失去根的人無法對政權作出反抗。

普通話和簡體字成為現今中國的主流，不只令大部份中國人失去了他們原有的文化，無法將自己族群的語言傳承至下一代，同時令大部份中國人失去了族群的集體記憶。在強推普通話成為單一、強勢語言下，其他語言紛紛覆亡，其害遠比滿清入關強令剃髮易服更甚。

強令剃髮易服，雖令關內漢人改變風俗，然而關內各族溝通語言不變，代表他們的思想能夠繼續傳承，所以滿清入關後未能徹底去除異見者，反而激起頑強抵抗。面對關內反清勢力的抵抗，滿清以屠城方式應對，然而，不論滿清採取多少手段鎮壓平亂，不消滅語言就無可能徹底消滅關內的反清意識。滿清一六四四年入關，二百多年後的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都是打着反清旗號，可見不將一個地區語言和文化徹底摧毀和滅絕，統治時間再長都會落得亡國收場。

自中共立國，六十多年來推行普通話和簡體字至今，我們知道

反右、大躍進、文革……但除了新疆、西藏外，我們從未聽到激烈、頑強和有組織的武力抗爭。就算六四事件中示威的學生，所採取的方式都只是集會、絕食，期望共產黨會理解他們的訴求，改革政制，根治腐敗。

摧毀文化和語言的統治方式，遠比武力鎮壓來得更有效益。如何能夠在征服一個國家或者一個地區後，得以長治久安？西方政治哲學家 Machiavelli 的著作《君主論》，當中就有幾項要點值得注意：「對於已經習慣在自己的法律下自由生活的國家，征服之後可以有三種不同的方式維持既有的成果：一是毀滅；二是征服者親自坐鎮；三是容許他們活於自己的法律下，但強迫他們納貢，並扶植對你親善的政權。」Machiavelli 引用斯巴達和羅馬在征服一些地區後的處理手法，以證明何種方式最為高明：「斯巴達人……扶持由少數人組成的政府，終究失去控制權。羅馬人為了保有……徹底加以摧毀……事實上，除了加以摧毀，根本沒有穩當方式保有既得成果。」

西方歷史上，如果一個政府或者君主要鞏固既得成果，即保有佔領的區域和版圖，惟有摧毀方式最為見效；而 Machiavelli 就從歷史的角度去證明這一點。

中共強行迫使中國人以普通話為母語，作日常交流和應用，只要推行普通話的方針不變，相信新疆、西藏不久的一代都會不自覺地遺忘自己的語言、文化和歷史，如同其他發展較為蓬勃的地區，如上海一樣，上海話的消失可能已經暗示了疆、藏兩地的將來。早年廣州曾經發生一件激起民憤的事，廣東省政府下令政府官員、學校、會議和集體活動、廣播電台、電視台和網絡音視頻節目等均須採用普通話，以便「推廣普通話和推行規範漢字（即簡體字）」，可以看出政權魔手已經伸到廣州，「推普廢粵，棄繁從簡」早晚會令粵語在大陸消失殆盡。

那教育局是要「推普廢粵」？若然問這個問題的人不是香港人，而是統治者，Machiavelli 大概會這樣回答：「任誰佔領習慣於自由生活的城邦卻不予以摧毀，早晚會被那個城邦給摧毀，因為那樣的城邦總是會以自由的精神和傳統制度為名起義，時間流逝或施以恩惠都無法消除他們的集體記憶。不論怎麼防範，只要他們仍聚居一起就不會忘懷那種精神和那種制度，一旦有機可乘就會像比薩一樣，臣服於佛羅倫斯人一百年照樣逮到機會尋求獨立。」

廣東話有法定地位？

王慧麟（時事評論員）

我城一個「普教中」，弄得滿城風雨。我上世紀七十年代讀小學，那所學校是當時香港少數用國語作為授課語言的學校，除了英文科是西人教英語外，所有學科都是用國語（注音符號）教學，但同學們在課堂外都是用廣東話交談。後來升上中學，回歸主流教育系統，才發覺廣東話才是教學主流，中學時代，那所中學沒有普通話班。直到現在，步入中年，兩種語言都勉強可以使用，幸運也。

自懂事起，都知道廣東話是香港社會之主流語言。八十年代起更興起了母語教學的政策討論。所謂母語教學，實際上就是廣東話教學。在九七年後的教育改革，兩文三語是政策目標，同樣標榜的是所謂「母語教學」。既然是母語，也主要是指廣東話，從沒有說以普通話作為母語教育的語言。

於是，我們要問：這是否代表，廣東話是香港官方語言呢？法律上沒有這樣說。

在英國（這裏主要是指英格蘭及威爾斯），其立法語言固然是英語，但在英國不同地區的人士，如威爾斯，亦有其語言及文字。不過，在法律上，卻沒有所謂英語是英國官方語言的訂立。一直到二〇一二年，威爾斯議會立法，才訂立威爾斯語與英語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為何威爾斯要專門訂立一條法例將兩種語言成為法定語言呢？因為英國之前沒有法律訂立其官方語言為英語，而由於威爾斯議會想將威爾斯語定為法定語言，於是在立法之時，就將兩種語言定為法定語言，亦變相是英國境內第一條將英語訂為官方語言的法律。

然而，訂立官方語言的舉措，是政治問題多於法律問題。九七年前，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人在香港訂立法律，理論上無須理會香港人的感受。既然是英國殖民地，法律語言自然是英語，英人無須因為要遷就香港人，而以中文立法。因此，中文成為法定語言，是因應六、七年代之中文運動而迫出來的。當中的政治考量，包括在六七暴動之時，港英政府在華人社區之輿論上，往往輸給利用中文宣傳的親中傳媒，所以希望借使用多點中文，以安撫一般市民（見當時《工商日報》的社論：http://1967riot.wordpress.com/2012/10/19/ksyp-19671019/）。在香港社會壓力之下，港英最後決定把中文提升至法定語言之地位，以達至政通人和的效果。

網上有文章討論香港《法定語文條例》的一些立法背景，大抵亦說出了當時行政當局及立法局議員之立法思路（見 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20786）。但是，從暴動後的發展軌迹來說，有幾點觀察：

其一，當時社會輿情所提及的中文運動，其中一個重要爭取目標是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而不是廣東話成為法定語言。假如廣東話是港英政府當年指定的「中文」語言，理應在條例中寫明是廣東話（或粵語）。對比新加坡政府，在一九六五年的有關新加坡獨立的憲法文件（Republic of Singapore Independent Act, 1965）第七條指出，新加坡的官方語言（official language）是馬拉（Malay）、國語（Mandarin）、泰米爾語（Tamil）以及英語（English），而現行的新加坡憲法第一五三A條亦重複上述條文。相信新加坡在考慮中文成為官方語言的時候，最終決定以 Mandarin 而不用 Chinese，是經過細心考量的，因為同樣是指涉「中文」，Mandarin 一詞就是指國語（或普通話），而不是其他中文語言，在法律上，這樣就非常清晰。

其二，香港之法定語言所提及的中文，明顯是針對書寫的中文，例如政府公文、法律條文等。至於社會上日常使用的廣東話，

以及部份南來移民的中國人之其他語言如上海話、福建話等，也沒有以立法之。當然，這也是英國人聰明之處：既然社會輿論是提出「中文運動」而不是「粵語運動」，那麼港英政府亦不會糾纏於不同地方語言的問題。一個「Chinese language」就已滿足了社會的訴求。當時港英政府亦不會考慮到，五十年後之今天，香港居然會就 Chinese language 之詞有爭拗。事實上，假如，又假如港英用廣東話成為官方語言，香港人又怎樣可以利用廣東話作日常書寫溝通呢？香港與其他華文地區的法律文書交流，也好難用廣東話直接書寫法律文件吧？

其三，中文成為香港法定語言達四十年，《基本法》第九條將使用中文定為特區正式語文。因此，要把廣東話成為官方語言，就要從多方面入手，除了修改法定語文條例外，也牽涉修改《基本法》，根本上是不可能的任務。

但是，與其修法費時失事，不如在民間推動一場廣東話運動，將廣東話繼續有機地在方方面面生根，讓管治者無法借任何機會將之連根拔起。假如有心維護廣東話，除了講，還要寫，將廣東話透過語言以及文字發揚光大。親愛的讀者們：你有幾耐冇用廣東話寫作呢？

四、附錄

廣東新語・文言・方言

屈大均

導讀

屈大均（一六三〇至一六九六，明崇禎三年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字翁山，廣東番禺人，明末清初詩人、學者。因曾參與南明抗清，其著作被清廷列為禁書，多毀於雍正、乾隆年間。其所著《廣東新語》，紀錄在廣東各地所見所聞，以補《廣東通志》的不足。本篇〈方言〉，出自該書卷十一〈文言〉，介紹廣州及附近各縣方言詞的差異，對今天漢語方言學之中，粵方言及粵方言詞本字等研究均有參考價值。

篇中所論，多能反映粵方言的古雅。如今日廣府話稱曾孫為「塞」，即為「息孫」之「息」音轉而成。又如「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可是本篇編排稍嫌雜亂，並無系統。又不着重注音，如「謂淫曰姣，姣音豪。」不確。「姣」，解作美好時，讀「皎」（gaau2，咆哮韻，陰上聲）；解作淫蕩時，讀「haau4」（咆哮韻，陽平聲）。「豪」則讀「hou4」（勞高韻，陽平聲）。

正文

廣州謂平人曰佬，亦曰獠，賤稱也。《北史》：周文帝討諸獠，以其生口為賤隸，謂之壓獠，威壓之也。謂平人之妻曰夫娘，夫娘之稱頗古，劉宋、蕭齊，崇尚佛法，閨內夫娘令持戒，夫娘謂夫人娘子也，廣州則以為有夫之娘也。東莞女子，未字者稱曰大娘，已字稱小娘，眾中有已字、未字，則合稱曰大小娘。廣州謂新婦曰心抱，謂婦人娠者曰有歡喜，免俋而未彌月曰坐月，亦曰受月，謂子曰崽。《水經注》：「弱年崽子。」是也。謂雲孫曰黴，玄孫曰塞，息訛為塞也。謂父曰爸，曰爹。《南史》：「湘東王，人之爹。」是也。陽春謂外祖父曰翁爹，外祖母曰婆爹，自稱則曰儂。高明謂外祖父曰公低，外祖母曰婆低。東莞謂曾祖曰白公，曾祖母曰白婆，或止稱曰阿白。廣州謂母曰嫲，亦曰媽，媽者，母之轉聲，即母也，亦曰靶。凡雌物皆曰靶，謂西北風亦曰靶，蓋颶與瘴皆名母，故西北風亦曰靶也。婦謂舅姑曰大人公、大人婆，亦曰家公、家婆。賈誼曰：「與公併倨」，《列子》曰：「家公執席」，是也。子女謂其祖父曰亞公，祖母曰亞婆，母之父曰外公，母之母曰外婆，母之兄弟曰舅父，母之兄弟妻曰妗母，母之叔伯父母曰叔公，曰叔婆。孫謂祖母之兄弟及妻曰舅公，曰妗婆，謂從嫁老婦曰大妗。醮子之夕，其親戚送花於新郎房中者，男曰花公，女曰花婆，子初生

者曰大孫頭，子女末生者多名曰穉。新會則曰長仔，或曰屘。奴僕曰種仔，惠州曰賴子，言主人所賴者也。廣州凡物小者皆曰仔，良家子曰亞官仔，耕庸曰耕仔，小販曰販仔，遊手者曰散仔，船中司爨者曰火仔，㪚賴曰打仔，大奴曰大獠，嶺北人曰外江獠。小奴曰細仔，小婢媵曰妹仔，奴之子曰家生仔。螟蛉子曰養仔，盟好之子曰契仔。姻婭之使役曰親家郎。東莞稱無賴者曰趲子，又多以屎為兒女乳名，賤之所以貴之。男曰屎哥，女曰屎妹。謂賃田者曰佃丁，曰田客，賃地者曰地丁，曰地客。傢屋曰房客，巫曰師公、師婆。覩之夫曰覩公，瓊女賣檳榔者曰山子，徭之雋者亦曰山子。廣州謂橫恣者曰蠻，又曰蠻澄鋹。鋹，劉鋹。澄，龔澄樞也。言其不循法度，若此二人也。謂外省人曰蠻果，興寧、長樂人曰哎子，海外諸巨曰番鬼，司柁者曰柁公、梢公，在船頭者曰頭公。二人為舟司命，故公之，即三老也。搖櫓者曰事頭，《宋書》：「蕭惠開有舫十餘，事力二三百人。」事頭者，事力之首也。大桅斗者曰班首，司篙者曰駕長，打牽曰牽夫。香山謂佃而服役者曰入倩，謂田主曰使頭，其後反以佃戶之首為使頭。廣州謂美曰靚，顛者曰廢，鯁直曰硬頸，迂腐曰古氣，壯健曰筋節，輕捷曰轆力，言其力如車之轆也。角勝曰鬬，轉曰翻，飲食曰喫，遊戲曰則劇，雜劇也，訛雜為則也。謂淫曰姣，姣音豪，又曰嫪毐。謂聰明曰乖，謂不曰

吾，問何如曰點樣，來曰釐，溺人曰碇。走曰趯，取《詩》「趯趯阜螽」之義。攻治金鐵之器曰打，為醮事曰打醮，取事物曰邏，罵人曰鬧，挈曰扱起。東莞謂事訖曰效，遊戲曰瞭。順德曰仙，曰欣。新會曰流，指何處曰蓬蓬。順德謂欺曰到，《史記》：「張儀曰：不如出兵以到之。」《索隱》曰：「到，欺也。」猶俗云張到，謂張網得禽獸也。到，得也，張儀善欺，故謂欺人者曰張到也。以言託人曰訣，一作吙。謂猥猿者曰魁摧，出賈誼《哀時命》篇，即《詩》之虺隤也。縫衣曰敥。《書》曰：「敥乃甲胄」。凡細者曰縫，粗曰敥。著裏曰縫，著邊曰敥也。東莞謂光曰皎，皎音效，美好曰灑，持物曰的，肥曰凹，肉熟曰肧。《禮記》曰：「腥肆爓膮祭」，註曰：「膮，熟也。」爓或為腤也，廣州謂烹物曰腤，亦曰炯也。謂港曰涌，涌，衝也，音沖。凡池沼皆曰塘，其在江中者亦曰塘，若白蜆塘、蟠塘、菱角塘是也，猶合浦海中之珠池也。凡水皆曰海，所見無非海也。出洋謂之下海，入江謂之上海也。出洋曰開洋，亦曰飄洋。謂潮曰水，潮起則曰水大，潮落則曰水乾。廉、欽州謂潮以朔望而大者曰老水，日止一潮者曰子水。謂水通舟筏者曰江，不通舟筏者曰水，二水相通處曰滘。稱山之有林木曰山，無者曰嶺。廣州謂門橫關曰閂，謂帆曰帗，絙索曰纜，旁出者曰纜枝，小舟曰艇，泅水曰游。《南州異物志》贊：「合浦之人，習水善游」。芟

艸曰薅艸，亦曰勞。諺曰：「耕而不勞，不如作暴。」樹槮水中以掛罾曰罾戚，亦曰罾門。西寧謂魚種曰魚口，小豬曰豬口。廣州謂卵曰春，曰魚春，曰蝦春，曰鶩春，曰雞春、鴨春。數食籮曰幾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是也。數檳榔曰幾口，陸俙謝安成王賜檳榔一千口是也，亦曰幾子。陳少主嘗敕施僧智顗檳榔二千子是也。數蕉子曰幾梳，蘇軾詩：「西鄰蕉子熟，時致一梳黃」。謂衣一套曰一沓，沓，襲也，訛襲為沓也。楮錢一片曰一佰，線縷一綹曰一子，一家曰一主，一熟曰一造。擲骰子者一擲曰一手。禽之窠曰鬬，雌雞伏卵曰哺鬬。石湖云，雌雄曰一鬬，十雞併種，當得六鬬，是也。瓊州數尚六，禾六束曰一把，錢六百孔曰一貫，物六十觔曰一擔，萬州則以禾十二把為一擔，潮陽以錢八十為一佰，曰東錢。築墻縱橫一丈曰一井，化州石城間，貧者欲避火，門於野外，搆茅以棲，名曰芧。雷州有芧村，有蒲芧，有新芧島，吳川有芷芧鎮，瓊有芒芧港，儋有郎芧墟，定安有坡芧市，萬有黎芧都，樂會有薄芧【氵郎】陂，會同有李芧塘，文昌有罟芧墩，黎峒有岑芧、黑芧、居芧、陳婆芧。自陽春至高、雷、廉、瓊地名，多曰那某、羅某、多某、扶某、過某、牙某、裓某、陀某、打某。黎岐人姓名，亦多曰那某、抱某、扶某。地名多曰那某、浦某、婆某、可某、曹某、爹某、落某、番某。其近漢者多曰妳某，妳音不。香山

中秋夕，劇飲月下曰餉中秋，發引之日，役夫蹋路歌以娛尸，曰踏鷓鴣。海豐方言，其濱海者，大約與潮相近，如髻曰莊，鼻曰鄙，耳曰繫，鬚曰秋，鴨曰啞，牛曰悟之類。其屬於山者，語又不同，謂無曰冒，我曰碍，溪曰階，嶺曰諒。其蛋人則謂飯曰邁，筋曰梯，碗曰愛瓦，盆曰把浪，拿網曰今網。狼人謂父曰扶，我曰留，彼曰往。女謂男曰友友，又曰友二。男謂女曰有助，謂娶曰換。野郎曰苦郎，那家曰扶閭，有心有意曰眉心眉意。扁擔曰閑，木曰肺，以榕木擔相贈曰送條閑肺榕，頭曰圖，有歌曰：「三十六圖羊，四十雙圖雞。」獞謂花瓣曰花脈，花朵曰花桃。猺謂魚曰牛，不曰陷。有歌曰：「牛大陷到石頭邊。」謂兄曰表，來曰大。有歌曰：「表大便到木橫底，娘大便到木橫枝。」崔人謂火曰桃花溜溜，謂飯曰拐儂。瓊語有數種，曰東語，又曰客語，似閩音。有西江黎語，有土軍語，地黎語。地黎稱峒名有三字者，如那父爹、陀橫大、陀橫小之類。有四字者，如曹奴那紐、曹奴那勸、曹奴那累之類。有六字者，如從加重伯那針、從加重伯那六、從加重伯那撐之類。有七字者，如從加重伯那白吾之類。其山多曰鷓鴣啼，村多曰荔枝。廣州語多與吳趨相近，如鬚同蘇，逃同徒，豪同塗，酒同走，毛同無，早同祖，皆有字有音。潮州或無字有音，德慶亦然。新會音多以平仄相易，如通作痛，痛作通。東莞則謂東曰凍，以

平為去，謂莞曰官，以上為平。香山謂人曰能，番禺謂人曰寅，東莞之南頭謂刀曰多，增城謂屋曰竄，廣州謂父又曰爸，母曰嫲。或以阿先之，亦曰亞。兒女排行亦先之以亞，謂視不正曰乜斜，乜音咩。射覆曰估，以刀削物曰剉，音批。細切物曰剿，音速。削去物曰勞，音撇。食飽曰飽，音救。以鼻審物曰嗅，許用切。謂多曰够，少曰不够，音遘。謂無尾曰屘，音掘，謂人無情義者亦曰屘。謂腿曰膇，音彼，髀也。以手搓物曰挪，音儺。以手按物曰捺，難入聲。以拳加物曰摋，音釵。以手覆物曰掊，庵上聲。以指爬物曰搔，烏寡切。般運曰摙，連上聲。積腐穢曰攦撦，漱口曰敕口，敕音朔。謂人愚曰殢殗，怒目視人曰瞶，音利。謂田多少曰幾【田令】，肉動曰胹，音徹。瘡腫起曰腎，輿去聲。以足移物曰蹳，裸體曰躶靂。音赤歷。不謹事曰邋遢，鼻塞曰鼻鼈，音甕。露大齒曰齙牙。新婦入門，使親屬老婦迎之曰檯步。是夕夫婦同牢食，曰煖房飯。次早見舅姑親屬，獻幣、帛、帨、履，曰荷惠。冬至圍爐而食，曰打邊爐。元夕黏詩藏謎，以示博物通微，曰打燈。以鴿翎貫皮錢踢之，曰踢毽，毽亦曰燕。謂雲腳疎直曰風路。不知人之來歷，曰不知風路。龍門謂娶婦時置酒延賓以迎之，曰接路，高要人謂壻曰郎家，女巫曰鬼【先母】。

廣州音說

陳澧

導讀

陳澧（一八一〇至一八八二，清嘉慶十五年至光緒八年），字蘭甫，號東塾，廣東番禺人，晚清著名學者，以博學見稱，所著《切韻考》反映其在音韻學方面的成就。本文指出廣州方音有五大優點，前四個需要稍解釋。

第一優點，是四聲各有清濁。「清濁」之分，亦有稱為「陰陽」或「上下」。清聲在廣州話絕大多數演變為音階較高的陰聲，濁聲則變為陽聲，但並非絕對。現時廣州方音四聲都分陰陽，於是有陰平、陰上、陰去、陰入、陽平、陽上、陽去、陽入共八聲；再加中入聲（音階介乎陰入和陽入之間）合共九聲。比起普通話（以北京方言）只有四聲，聲調豐富得多。普通話因為只平聲可分陰陽，上、去二聲不分陰陽，入聲則亡失而派入平、上、去三部，所以只有陰平、陽平、上、去四聲。事實上，廣州話還有所謂「第十聲」

（王力《廣州話淺說》有詳細說明），即是入聲字在多字名詞最後文字時常見的變調。如「蝴蝶」的「蝶」，「打齋鶴」的「鶴」，在口語的實際音階，比陰入聲還要高。

第二優點，是保留陽上聲。在其他方言常有「陽上作去」的情況，即古代陽上聲的字，轉讀為去聲。如「孝弟」的「弟」，過去廣府話讀如「娣」（tai5，雞啼韻，陽上聲），現在一般讀如「第」（dai6，雞啼韻，陽去聲）。「娣」字則仍保留陽上聲。民俗，妻子若先生女而夫渴望得子，女名多用這娣字，如「帶娣」、「招娣」、「來娣」之類，即為帶來一個弟弟之意。「輕重」之「重」，今讀「cung5」（農工韻，陽上聲）。

第三大優點，是保留「合脣音」，即「-m」韻尾。常用字如「心」（sam1，琴心韻，陰平聲）、「林」（lam4，琴心韻，陽平聲）等，普通話現無合脣音，「-m」韻尾都轉讀「-n」韻尾。

第四優點是庚（gang1，能登韻，陰平聲）、耕（gaang1，棚撐韻，陰平聲）、清（cing1，英明韻，陰平聲）、青（廣州音同清）等字，會與「東冬韻」（-ung，即農工韻）不相混。

正文

廣州方音合於隋唐韻書切語，為他方所不及者，約有數端。余廣州人也，請略言之。

平上去入四聲各有一清一濁，他方之音多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如平聲「邕」（《廣韻》於容切）、「容」（餘封切），一清一濁，處處能分；上聲「擁」（於隴切）、「勇」（余隴切）；去聲「雍」（此雍州之雍，於用切）、「用」（余頌切）；入聲「郁」（於六切）、「育」（余六切），亦皆一清一濁，則多不能分者（福建人能分去入清濁，而上聲清濁則似不分），而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截然不溷，其善一也。

上聲之濁音，他方多誤讀為去聲，惟廣音不誤。如「棒」（三講）「似」「市」「恃」（六止）「佇」「墅」「拒」（八語）「柱」（九麌）「倍」「殆」「怠」（十五海）「旱」（二十三旱）「踐」（二十八獮）「抱」（三十二皓）「婦」「舅」（四十四有）「斂」（五十琰）等字是也。又如孝弟之弟，去聲（十二霽）、兄弟之弟，上聲濁音（十二薺）；鄭重之重，去聲（三用）、輕重之重，上聲濁音（二腫）。他方則兄弟之弟、輕重之重亦皆去聲，無所分別，惟廣音不溷，其善二也。（李登《書文音義便考私編》云：「弟子之弟上聲，孝弟之弟去聲，輕重之重上聲，鄭重之重去聲。愚積疑有年，遇四方之人亦甚夥矣，

曾有呼弟重等字為上聲者乎？未有也。」案：李登蓋未遇廣州之人而審其音耳。）

「侵、覃、談、鹽、添、咸、銜、嚴、凡」九韻皆合脣音（上去入聲倣此），他方多誤讀，與「真、諄、臻、文、殷、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十四韻無別。如「侵」讀若「親」，「覃」「談」讀若「壇」，「鹽」讀若「延」，「添」讀若「天」，「咸」「銜」讀若「閑」，「嚴」讀若「妍」（《御定曲譜》於「侵」「覃」諸韻之字，皆加圈於字旁以識之，正以此諸韻字人皆誤讀也）。廣音則此諸韻皆合脣，與「真」「諄」諸韻不溷，其善三也。（廣音亦有數字誤讀者，如「凡」、「范」、「梵」、「乏」等字皆不合脣，然但數字耳，不似他方字字皆誤也。）

「庚、耕、清、青」諸韻合口呼之字，他方多誤讀為「東冬」韻。如「觥」讀若「公」，「瓊」讀若「窮」，「榮、縈、熒」並讀若「容」，「兄」讀若「凶」，「轟」讀若「烘」，廣音則皆「庚青」韻，其善四也。

《廣韻》每卷後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如「眉，武悲切」，改為「目悲切」，「緜，武延切」，改為「名延切」，此因字母有明微二母之不同。而陸法言《切韻》、孫愐《唐韻》則不分，故改之耳。然字母出於唐季而盛行於宋代，不合隋及唐初之音也。廣音則明微二

母不分，「武悲」正切「眉」字，「武延」正切「緜」字，此直超越乎唐季宋代之音，而上合乎《切韻》、《唐韻》，其善五也。

五者之中又以四聲皆分清濁為最善，蓋能分四聲清濁，然後能讀古書切語而識其音也。切語古法：上一字定清濁而不論四聲，下一字定四聲而不論清濁。若不能分上去入之清濁，則遇切語上一字上去入聲者，不知其為清音為濁音矣。（如：「東，德紅切」，不知德字清音，必疑德紅切未善矣。「魚，語居切」，不知語字濁音，必疑語居切未善矣。自明以來，韻書多改古切語者，以此故也。）

廣音四聲皆分清濁，故讀古書切語瞭然無疑也。余考古韻書切語有年，而知廣州方音之善，故特舉而論之，非自私其鄉也。他方之人，宦游廣州者甚多，能為廣州語者亦不少，試取古韻書切語核之，則知余言之不謬也。朱子云：「四方聲音多訛，卻是廣中人說得聲音尚好。」（《語類》卷一百三十八）此論自朱子發之，又非余今日之創論也。至廣中人聲音之所以善者，蓋千餘年來，中原之人徙居廣中，今之廣音實隋唐時中原之音，故以隋唐韻書切語核之，而密合如此也。請以質之海內審音者。

（《東塾集》卷一）

《廣東俗語考》自序

孔仲南

導讀

孔仲南，生平不詳，廣東高要（要，在此讀「邀」）人，前清秀才。所著《廣東俗語考》（上世紀三十年代刊行）為粵方言詞本字研究的力作。

序言簡介歷史上三次由中原到嶺南的大規模移民潮，「中土正音」由是傳入珠江流域。第一次是秦代平百越之後，派五十萬軍民南移（因男兵多，朝廷派來婦女，專門負責為官兵縫補衣服）。第二次為西晉經歷五胡亂華，中央政府由黃河流域（今陝西西安、河南洛陽）遷移到長江流域（今江蘇南京）。長江流域未足以安置南來中原人士，於是有部份繼續向南，落籍嶺南。第三次為元滅南宋，原在浙江杭州的中央政府連同數十萬官兵及其家眷流亡入廣東。宋代最後一任皇帝趙昺，曾到香港，後在新會厓門蹈海殉國。

常人以為粵方言經常「有聲無字」，實因「語音」（即「白讀」）

和「讀音」（即「文讀」）的差異，因「無從下筆。於是而生安白造俗字出焉。」

「無」，文讀如「毛」（mou4，陽平聲），白讀如「武」（mou5，陽上聲），後來造出「冇」字，即以「有」字挖去中心兩橫，用「六書」中「會意」之理造字。

「合」，文讀如「盒」（hap9，陽入聲），白讀如「憾」（ham6，陽去聲），後來造出「冚」字。如常用咒罵人俗語「冚家剷」，本字為「合家剷」（合與闔通），即咒罵對方全家死亡。後來有改「冚家富貴」，省文為「冚家富」，同義。

「返」，文讀如「反」（faan2，陰上聲），白讀如「翻」（faan1，陰平聲）。約定俗成習慣是「往返」用文讀，「返工」、「返學」用白讀。

「勿」，文讀如「襪」，白讀如「米」，後來借用音近字「咪」。用「六書」中「形聲」之法造字。如「咪拘」、「咪攪」、「咪住」等等。

「來」，口語有「離」音，亦有「黎」音。於是又造出「嚟」、「嘩」兩字（亦形聲，近世粵方言造字，多用形聲符加口字旁）。現時香港人較多用「嚟」而少用「嘩」。

至於「鷄伏卵謂之哺門。不知有菢蔟字」，則為糾正屈大均

《廣東新語》之説。附帶一提，「伏卵」當讀如「僕春」。「菢」讀如「捕」。

香港新界有地名曰「鶴藪」，鄉民讀「藪」如「門」，字書無載。即是有音而不知字，假借義近字為用。「藪」本讀「手」（sau2，優遊韻，陰上聲），異讀「素」（sou3，勞高韻，陰去聲）。「藪」借讀為「門」（dau3，優遊韻，陰上聲），當為香港地區獨有。

正文

粵處中國之南方。其語言與各省不通。人幾疑為南蠻鴃舌。不知秦主中夏。畧定揚越。置郡後。以譎徙民五十萬人戍五嶺。與越雜處。直不啻為越地原民。厥後五胡亂華。中國民族播遷南省。迨宋南渡時。諸朝臣從駕入嶺。不知幾萬家。宋末。陸丞相奉幼帝至厓門。兵數十萬。皆從中原來也。故粵俗語言。本中土正音。非方言比。而何以其語言殊異。不能與各省通。則知黃農世胄之子孫。其式微也久矣。夫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故按其語言。而考證文字。即知其民族之根源。吾粵語言。多有合於古音古義者。如身體中之頭面頸喉大髀。與夫日頭月光。若粥若飯。其

名稱皆本於五經。非同呼腦袋。臉子。嗓子。腿子。太陽。月亮。稀飯乾飯。之外省話。悉本方言土音之可比也。然粵語之名物雖正。而亦多有求其聲而無其字者。何哉。則以語音與讀音分而為二之故。於是輕重清濁之間而音變矣。無呼作母。合呼作憾。返呼作翻。勿呼作米。尋聲者無從下筆。於是而生安白造之俗字出焉。此外省人所以謂廣東多白字者也。不獨外省人云然。即以屈翁山之博學。其所著廣東新語。於土言一則。亦訛悞甚多。書中生造之字。亦復不少。又如來有離音。卵有春音。而不之引正。鷄伏卵謂之哺鬥。不知有菢族字。似此紕繆。不一而足。文學大家且如此。矧俗人乎。著者不敏。謹將平日考得粵語之字。分類而著之篇。名曰廣東俗語考。是亦講求廣東言語學者所不廢也。尤望博雅君子。匡其不逮。有厚幸焉。

民國二十二年癸酉夏五月孔仲南序於四未能齋

參考書目

《紅樓夢辭典》，楊為珍、郭榮光，山東文藝出版社，一九八七年
《廣州音字典》，饒秉才，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中國戲曲曲藝詞典》，湯草元、陶雄，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廣州話方言詞典》，饒秉才、歐陽覺亞、周無忌，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一年
《滬諺外編》，胡祖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漢語外來詞詞典》，劉正琰，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俗語典故精選》，仁赫，北京農村讀物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中國俗語大辭典》，溫端正，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簡明香港方言詞典》，吳開斌，廣東花城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現代粵語》，趙榮光，雲華語文學苑，一九七二年
《方言與中國文化》，周振鶴、游汝杰，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哭喪歌》，上海南匯縣文化所、上海民間文藝家協會，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丁世良、趙放，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方言等號》，中華民俗方言文獻，文海出版，一九八五年

《中國地方歌謠集成》，舒蘭，渤海堂文化公司，一九八九年
《諺語》，武占坤、馬國凡，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古今俗語集成》，王樹山、尚恆元，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中國民俗方言謠諺叢刊初編》，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九年
《中國俗語》，王捷、徐建華，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講客話》，羅肇錦，自立晚報社，一九九〇年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張洪年，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二年
《廣東話指南》，莊世光，文史哲出版社
《俗語考原》，李鑑堂，文海出版社，一九三七年
《上海文化源流辭典》，馬學新、曹均偉，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方志所錄方言匯編》，波多野太郎，橫濱市立大學，昭和四十七年
《小說詞語匯釋》，陸澹安，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一年
《金瓶梅詞典》，王利器，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金瓶梅覽賞辭典》，上海市紅樓夢學會、師範大學文學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〇年
《中國俗語大辭典》，溫瑞政，上海辭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切口大詞典》，吳漢癡，上海東陸圖書公司，一九二四年
《江湖隱語行語的神秘世界》，曲彥斌，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水滸詞典》，胡竹安，漢語大詞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人稱稱謂詞匯釋》，張龍虎，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廣東俗語考》，孔仲南，南方扶輪社，一九三三年
《古今稱謂語詞典》，張孝忠、閻德年，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一九八八年
《熟語淺説》，劉廣和，中國物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俏皮話精選》，尚英時，常春樹書坊，一九八〇年
《風趣俗語6000條》，富宗，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歇後語》，馬國凡、高歌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
《歇後語新編》，譚永祥，山東教育，一九八四年
《歇後語8000條》，張平，中州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古今歇後語選釋》，寧榘，湖北教育出版社，一九八二年
《歇後語例釋》，施寶義、盧堯逸，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
《歇後語大全》，閔彥文，甘肅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歇後語2000條》，鄭世忠，中國城市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中國語文通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吳多泰中國語文研究中心，一九八九年
A Glossary Of Reference On Subjects Connected With The Far East, Herbert A.Giles, Kelly And Walsh, 18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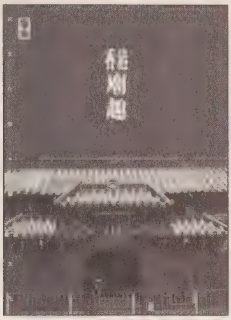
《廣東新語》，屈大均，中華書局，一九七四年
《粵東筆記》，李洞兄，上海今文堂，一九一五年
《粵東筆記》，李調元，上海文堂書局，一九二八年
《廣東通誌》，陳昌齊，清道光二年
《廣州音說及字義舉例》，陳澧、岑麒祥、詹憲慈，崇文書店，一九七一年
《第一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單周堯（主編），現代教育研究社有限公司，一九九四年
《廣州話研究與教學》，鄭定歐（主編），中山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廣東地區社會語言文字應用問題調查研究》，詹伯慧（主編），暨南大學出版社，二〇〇〇年
《分韻撮要》，周冠山，香港五桂堂，清末
《粵語同音字典》，馮田獵，東聯學供社，一九七四年
《新編廣東省城白話》，許雪航，文化鑄字印刷公司，民國
《粵語國語好雙語》（甲、乙、丙篇），容若，次文化堂，二〇〇一年
《港台語詞詞典》，黃麗麗、周樹民等，黃山書社，一九九〇年
《粵語古趣談》（正／續編），黃氏，文星圖書公司，一九九三／一九九七年
《香港三字經●本土順口溜解讀》，黎文卓，次文化堂，一九九七年
《實用廣州音字典》，蘇翰翀，中山大學，一九九四年

《粵港俗語諺語歇後語詞典》，魏偉新，廣州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麥耘、譚步雲，廣東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七年
《粵語鉤沉》，楊子靜，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廣東話趣譚》，石人（梁小中），博益出版社，一九八三年
《廣東話再譚》，石人（梁小中），博益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廣州話本字》，詹憲慈，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五年
《由民間來的藝術》、《藝風》月刊，有麟，嚶嚶書屋，一九三三年
《廣州話、普通話口語詞對譯手冊》，曾子凡，一九八二年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文若雅（陳雅），一九九二年
《廣州方言古語選釋●續篇》，文若雅，一九九三年
《李氏中文字典》，李卓敏，中文大學出版社，一九八〇年
《廣州話口語詞的研究》，喬硯農，華僑語文出版社，一九六六年
《廣東番禺縣志》，詹憲慈
《俗語故事薈萃》，姚寶清等，浙江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俗語故事365》，徐昶、趙衡、費玉珍合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一九九一年
《詞義古今談》，王均裕、張叔珉、周宇合著，四川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北京方言詞典》，陳剛，商務印書館，一九八五年
《香港指南》，東南書局，一九五七年

《漢字演變五百例》，李樂毅，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考源蒐珍》，戴敬人，水芙蓉出版社，一九七四年
《廣州俗語意譯》，蔣愛民，蔣愛民出版社，一九七一年
《英譯廣東口語詞典》，關傑才，商務印書館，一九九〇年
《方語詞例釋》，傅朝陽，通俗讀物出版社
《俗語拾趣》，宋郁文，博益出版集團，一九九五年
《香港掌故》，魯言，廣角鏡出版社，一九七七年
《客方言》，羅翽雲，國立中山大學，一九二二年
《廣州音說》，陳澧，東塾集，一九四〇年
《俚語證古》，丁惟汾，詁雅堂，一九四二年
《中國慣用語》，陳光磊，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中國民間秘密語》，曲彥斌，上海三聯書店，一九九〇年
《上海方言詞匯》，許寶華、湯珍珠，上海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一年
《粵語查音識字字典》，陳岫山，大江書店，一九八五年
《語言與文化》，羅常培，語文出版社，一九八九年
《潮汕方言熟語辭典》，林倫倫，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新編廣東省城白話》，許雪航
《當代中國流行語辭典》，熊忠武，吉林文史出版社，一九九二年

《唐字音英語》，莫文暢，一九二〇年
《羊城舊語》，黃小娵，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廣州軼聞》，楊萬翔，廣東人民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廣州地區粵方言學》，陳衛強，暨南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一年
《談文字説古今》，冼為鏗，澳門出版協會，二〇〇九年
《廣府方言》，詹伯慧、甘于恩，暨南大學出版社，二〇一二年
《港式廣府話研究》（I、II、III），吳昊，次文化堂，二〇〇六／二〇一〇年
《正字正音》，潘國森，次文化堂，二〇〇七年
《甲級中文》，潘國森，次文化堂，二〇一一年
《基本中文》，潘國森，次文化堂，二〇一二年
《進階中文》，潘國森，次文化堂，二〇一四年
《正字正確》，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〇六年
《正字審查》，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〇七年
《小狗懶擦鞋》，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〇八年
《旺角詞話》，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〇九年
《廣東俗語正字考》，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〇九年
《次文化語言》，彭志銘，次文化堂，二〇一〇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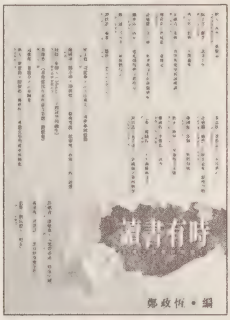
本土文化論述



《香港廟趣》
魯金◎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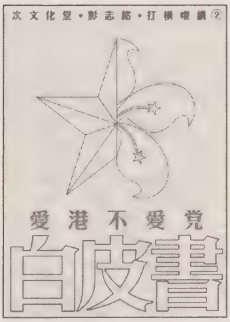
《拾香紀》
陳慧◎著

《九評政府黨》
陳雲、王慧麟◎編



《讀書有時》
鄭政恆◎著

《香港抗爭運動史》
林匡正◎著



《愛港不愛党白皮書》
彭志銘◎著

《六四二〇》
陳潤芝◎著

《戀我危城》
毛孟靜◎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香港廟趣》 ___本（每本港幣44元） 《香港抗爭運動史》 ___本（每本港幣94元）
《拾香紀》 ___本（每本港幣48元） 《愛港不愛党白皮書》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九評政府黨》 ___本（每本港幣86元） 《六四二〇》 ___本（每本港幣94元）
《讀書有時》 ___本（每本港幣52元） 《戀我危城》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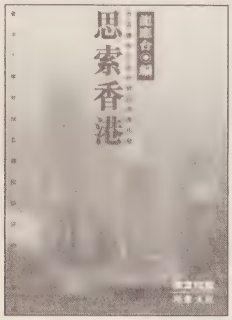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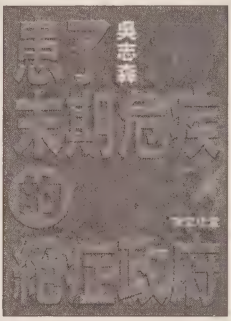
我們的香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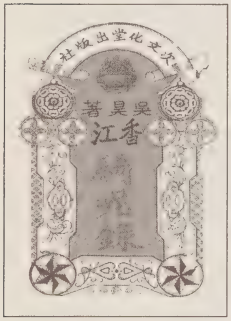
《思索香港》
龍應台◎編

《掌故筆記》
韋基舜◎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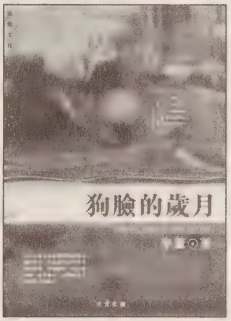
《身土不二》
陳雲◎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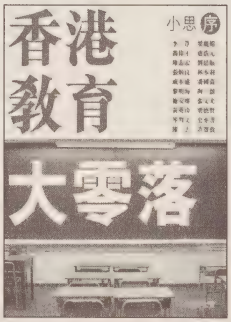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吳志森◎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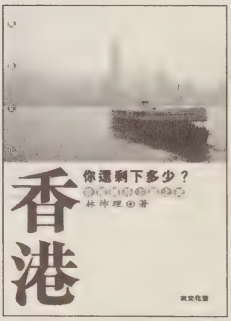
《香江騎呢錄》
吳昊◎著



《狗臉的歲月》
李葦◎著



《香港教育大零落》
彭志銘◎編



《香港，你還剩下多少？》
林沛理◎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填寫

本人現購買 《思索香港》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香江騎呢錄》 ___本（每本港幣48元）
《掌故筆記》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狗臉的歲月》 ___本（每本港幣56元）
《身土不二》 ___本（每本港幣102元） 《香港教育大零落》 ___本（每本港幣86元）
《謊言治港》 ___本（每本港幣62元） 《患了末期危疾的絕症政府》 ___本（每本港幣70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語言研究系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吳昊◎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吳昊◎著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吳昊◎著

《甲級中文》
潘國森◎著

《基本中文》
潘國森◎著

《進階中文》
潘國森◎著

《粵語國語好雙語》(甲編)
容若◎著

《粵語國語好雙語》(乙編)
容若◎著

《粵語國語好雙語》(丙編)
容若◎著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港式廣府話研究》①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甲級中文》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②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基本中文》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港式廣府話研究》③ _____ 本（每本港幣48元）	《進階中文》 _____ 本（每本港幣78元）	
《粵語國語好雙語》(甲編)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粵語國語好雙語》(乙編)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粵語國語好雙語》(丙編) _____ 本（每本港幣40元）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上述訂價已連郵費計算，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彌敦道 612 號好望角大廈 1009 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補購

彭志銘語言研究

《正字正確》

《正字審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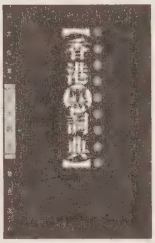
《香港潮語話齋》

《小狗懶擦鞋》

《廣東俗語正字考》

《旺角詞話》

《次文化語言》



《香港黑詞典》

補購表格（愛護書本，請用影印）

本人現購買
《正字正確》 ___ 本（每本港幣40元）（連郵費）
《正字審查》 ___ 本（每本港幣44元）（連郵費）
《香港潮語話齋》 ___ 本（每本港幣44元）（連郵費）
《小狗懶擦鞋》 ___ 本（每本港幣48元）（連郵費）
《廣東俗語正字考》 ___ 本（每本港幣52元）（連郵費）
《旺角詞話》 ___ 本（每本港幣44元）（連郵費）
《次文化語言》 ___ 本（每本港幣64元）（連郵費）
《香港黑詞典》 ___ 本（每本港幣56元）（連郵費）

姓名：_____

地址：（只接受本港地區）_____

_____

請連同劃線支票
寄香港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 訂購部收
支票抬頭：**次文化有限公司**

次文化堂

讀者服務卡

✢ 謝謝您購買次文化堂的書，請您詳細填寫本卡各欄寄回給我們，以便我們有為您服務的機會。

您購買的書名：香港粵語頂硬上

購買地點：..... **區**..... **書店**

您習慣以何種方式購書？

□①逛書店 □②郵購 □③電話訂購 □④傳真訂購
□⑤團體訂購 □⑥銷售人員推薦 □⑦其他_____

您從哪裏得知本書消息？

□①逛書店 □②報紙廣告 □③親友介紹 □④圖書館
□⑤廣播節目 □⑥書刊 □⑦書評推薦 □⑧其他_____

姓名：_____ **年齡：**_____

性別：□ 男 □ 女 **婚姻：**□ 已婚 □ 單身

地址：_____

職業：_____

教育程度：□①小學 □②中學 □③大專或以上

您對本書的意見：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可另紙書寫）

地址：九龍旺角彌敦道612號好望角大廈1009室
次文化堂編輯室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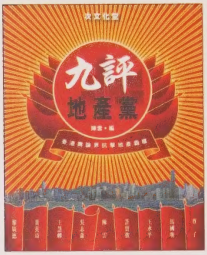
＊凡來信者，可獲本社禮品答謝（請附回郵信封）。

＊請勿撕毀此書，煩用影印本寄來。

次文化堂

次文化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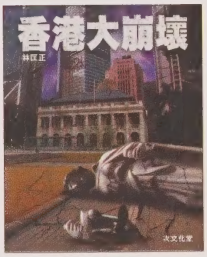
香港人的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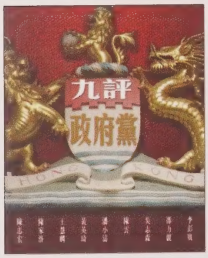
《九評地產黨》

《大仇富》

《香港教育大零落》



《香港大崩壞》



《九評政府黨》

《香港保衛戰》

這本書，是我的珍藏

藏書人：

收藏日期：

捍衛嶺南文化價值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3 1761 09954602 0

容[illegible]人）• 吳昊（香港掌故學者）• 葉輝（文化人、傳媒人、作家）• 曾曉華（香港科技大學講師）
湜[illegible]門理工學院語言暨翻譯高等學校副教授）• 鄧昭祺（明德學院教授兼中國研究課程統籌主任）
黃[illegible]珍樹仁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副教授）• 鄭政恆（書評人）• 陳雲（嶺南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陳[illegible]師）• 韓連山（退休教師）• 葉建源（主法會議員〔教育界〕）• 施安娜（中學教師）
潘[illegible]保育協會會長）• 陳惜姿（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高級講師）• 陳智德（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助理教授）
張婉雯（寫小說，參與動物保護的大學語文導師）• 鄧力行（普教中學生關注組發言人）
謝西嘉（流落於阿美利堅鄉郊的城市港女）• 牢騷齋主（教師）• 陳樂施（二〇一三年度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專題編輯）
陳仲明（自由撰稿人）• 趙善軒（明愛專上學院通識教育及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桑普（政治評論人）
木子（普教中學生關注組召集人）• 陶傑（專欄作家）• 彭志銘（出版社社長）• 毛孟靜（立法會議員）
劉天賜（資深傳媒工作者）• 文潔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教授）• 朱耀偉（香港大學現代語言及文化學院教授及香港研究課程主任）
鄧小樺（香港文學生活館理事會召集人）• 陳寧（香港作家）• 區家麟（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兼任講師）
黃世澤（時事評論員）• 陳心遙（創作人）• 劉嘉鴻（人民力量前主席）• 范克（自由撰稿人）• 王慧麟（時事評論員）

承傳華夏民族遺風

封面設計：原秋白

ISBN 978-962992352-5
12800
9 789629 923525
www.subculture.com.hk
www • 次文化 • 香港

次文化
現象文化
時代見証

SCB 614 $128
ISBN : 978-962-992-352-5
Printed in Hong Kong